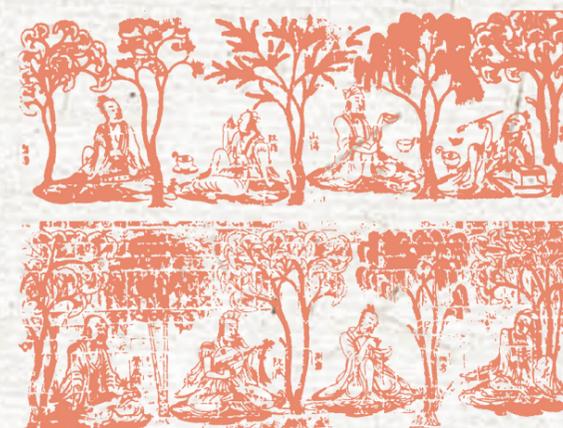


【艺术人生】  
【历史遗韵】  
【城市文脉】

# 雅集

贰拾伍

2025年第2期



赵朴初与江苏宗教

守望这一方蓝白

阳光普照

客之道

逝者三题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 S(2025)0000295

【人物纪实】  
【文苑纪事】  
【文化笔记】

雅集

贰拾伍

2025年第2期

搭建文化平台

汇聚各方英才



沟通海内外

共襄创新发展

潔白本無匹  
 衆芳花能紅  
 霞白且  
 共冷時香  
 縞袂清  
 染冰姿淡  
 不妝但  
 清露底萬  
 顆玉毫  
 壬寅秋管峻又題



王法  
 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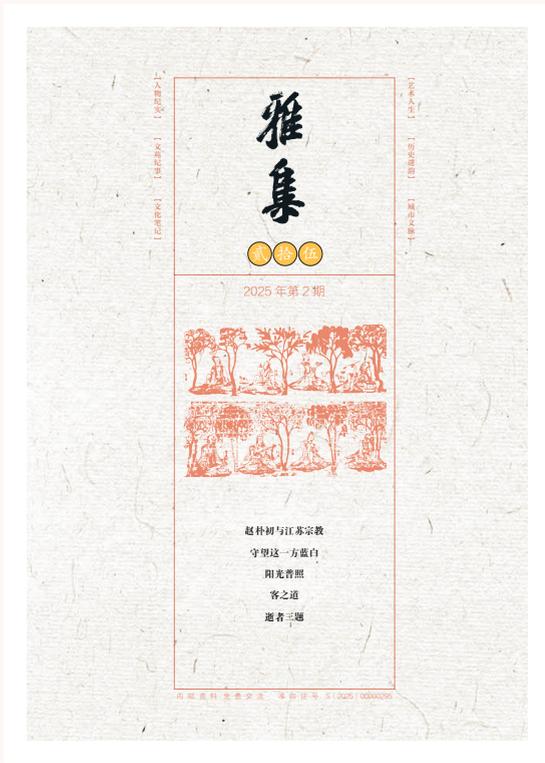
张正吟《十分春色》(《和园艺苑》院藏作品选)

# 雅集

贰拾伍

2025年第2期

责任编辑	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	主编		副总编	顾问	名誉总编	总编
宋好 郭东升 张蕊 王如意	王芳	李业	魏晓蕾	钱照亮 魏晓蕾	陈锋 朱杰 夏涛	贾梦玮 赵翼如	周和平	潘漫



主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中华文化学院

编辑：《雅集》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210007

电子邮箱：yajij@s163.com

电话：025—84287263

封面题字：徐邦达

装帧设计：朱赢椿

印刷：南京璇坤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5 年 12 月 30 日

印数：5000 册

发送对象：统战系统

## 人物纪实

赵朴初与江苏宗教 / 周加才 / 001

守望这一方蓝白 / 黄跃平 黄正平 / 005

他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中国生物化工的“开山者”欧阳平凯院士 / 龙海秋 / 011

## 文苑纪事

客之道 / 贾梦玮 / 016

在蒲黄榆见汪曾祺先生 / 胡丹娃 / 022

吾友海歌 / 周世青 / 025

## 文化笔记

阳光普照 / 黄蓓佳 / 028

墨痕寄沧海 片纸映晚清——读《片墨寄沧海：晚清明信片绘事》 / 沙 洲 / 031

以史为鉴，烛照未来 / 李风宇 / 037

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自己的生命——《观演记》创作谈 / 冯秋红 / 039

读《名山诗话》 / 薛金炜 / 041

## 艺术人生

《海上尘烟》记 / 周矩敏 / 044

江上往来人 / 黄靓靓 / 048

为了告别的聚会 / 向隆鸣 / 051

## 历史遗韵

哭向九泉添一语 / 王振羽 / 054

半世癫狂谁念我——诗人黄仲则的一生 / 周俊炜 / 061

董同龢：一位对音韵学有重要贡献的学者 / 侍建国 / 065

## 城市文脉

颐和路风情之二 / 杨应奇 / 068

文学福地“老门西” / 速泰春 / 073

园林大师远去——寻访朱有玠旧居 / 老 克 / 079

一座城市的记忆与一个时代的理想——邵力子与南京力学小学 / 邹 雷 / 082

探寻南京永利铔厂遗迹 / 朱兆华 / 085

## 往事如风

逝者三题 / 王慧骐 / 088

我世界里的第一位“大女主” / 陈全忠 / 092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之路 / 杨安翔 / 096

母亲的纪念章——记我的母亲施淑芳 / 李 辉 / 100

糖坊 / 王耀强 / 102

附中杂忆 / 清 浅 / 105

倦鸟之城 / 刘 流 / 108

城南旧事老村庄 / 张其全 / 112

狗缘 / 陈友锋 / 115

## 海外传真

加拿大散记（二） / 郑亚楠 / 117

我的记者生涯 / 董 端 / 123

编辑人语 / 128

国画 / 王 法 / 封二

国画 / 张正吟 / 封三

## 赵朴初与江苏宗教

### III 周加才

赵朴初，被誉为“新中国佛教的奠基人”“人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国际佛教交流的缔造者”，他与江苏省佛教有着特殊的因缘。自1980年起，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佛协会会长双重身份，多次到江苏考察，为宝华隆昌寺、扬州高旻寺、泰州光孝寺等的恢复重建“现场办公”，为祥符寺、寒山寺、栖霞寺、灵岩山寺等“老牌名刹”的恢复协调关系、筹集资金，并大力推动建设灵山大佛，把“江苏烟雨”升级为“世界地标”，对江苏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摘取几例以为怀念。

#### 朴老与灵山大佛

灵山大佛，坐落在无锡马山，高88米，连下面的须弥座共101.5米，观之慈祥庄严，不仅满足了佛教信众供奉的需要，也成为无锡著名的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旅游景点。灵山大佛从1994年4月选址，到1997年11月建成，仅花了三年多时间，倾注了朴老大量心血，可以说，没有朴老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有灵山大佛，没有朴老的悉心关怀，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完善和圆满。

灵山，古有小灵山之称，从唐朝起就建有寺

庙，数度兴衰，改革开放后，无锡乃至江苏省一些佛教界的高僧大德萌生了恢复祥符禅寺、建造大佛、再现灵山胜境的设想。正巧朴老1994年4月去宜兴考察途中住无锡，游太湖，察看了祥符寺旧址。朴老一见这里的环境，认为确是一方净土，当翻阅《无锡县志》和《马迹山志》后，对恢复祥符寺和建造大佛的构想表示赞成。

当建造大佛的报告得到正式批准后，朴老先后为大佛进行了“五定”：即定点、定形、定名、定位、定向。定点即确定大佛矗立的具体地点，朴老认为大佛在祥符寺后的半山上，三面环山，面对太湖，风水再好不过；定形即佛像选用释迦牟尼像，为有别于多数佛像是坐像，也考虑到建在寺庙后山上，因而选用立像；定名即大佛名字，朴老听取相关意见后说既然有小灵山的传说，就叫灵山大佛吧；定位是朴老在灵山大佛建造工程签约仪式上提出五方五佛论，把灵山大佛定位为东方大佛；定向是根据朴老一贯强调的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种文化的思想，确定灵山大佛所在的祥符寺要成为江南一大丛林，要提高佛教文化的内涵，建成全国佛教研习中心和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

朴老还亲自参加了灵山大佛建造工作中的



一系列重大活动。1994年6月26日，灵山大佛法相研讨会在无锡马山举行，北京、南京等地有关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同时，“重修祥符禅寺·建造大佛立像筹建委员会”正式成立。朴老虽不能参加，但亲笔来信一封：“顷悉召开大佛立像法相研讨会，我因病住院，佛协亦因重要事务未能参加，为歉。关于寺像建造问题，我在小灵山及在北京医院时均已与贵会同志提出了个人意见，谅荷鉴察。总之以朴素庄严为主。”

1994年7月30日朴老在北京审定“灵山大佛1米小样”。朴老亲自担任“重修祥符禅寺·建造大佛立像筹建委员会”名誉主任，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当即作诗一首，在医院用毛笔写好送赠无锡市人民政府：“太湖三万六千顷，八功德水绕灵山，如来百福庄严相，无量光明照世间。”

1994年12月24日，造佛“筹委会”与南京晨光集团就灵山大佛建设工程在北京签约，朴老应

邀参加，并作重要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五方五佛”之说。

1997年11月15日，灵山大佛开光。朴老极为重视，亲赴无锡指导开光活动，后因身体原因，朴老未到开光现场，但发表了书面讲话，再次强调“五方五佛”论说：“依建造年代的顺序，北方有云冈大佛，中原有龙门大佛，西方有乐山大佛，南方有香港天坛大佛，东方有现在建成的灵山大佛。”“建议佛教界要注意从信仰体系的高度深入理解五方五佛和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信仰的深刻意义，要保持这种信仰体系的格局。”

朴老对江苏、无锡的关爱，还表现在前前后后共写过与灵山有关的16首诗词抒发自己的情怀，现已出版为《灵山集》，朴老在北京医院亲笔签名赠我并合影留念。

### 朴老与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是杨仁山居士于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创办的，是我国著名的居士道场及刻印、流通佛教经籍的重要场所，也是蜚声海内外的我国木板雕刻、水墨印刷佛教经典的一个机构。金陵刻经处保存了我国许多佛教文化遗产，并精选刻印佛典，将之与讲学、佛学研究融为一体，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过巨大贡献。

由于战乱，金陵刻经处的业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已停顿。新中国成立后，金陵刻经处的两次恢复及整个事业的发展都依仗朴老的努力。

1951年，杨仁山居士的后人杨立生、杨雨生等向时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的赵朴老反映金陵刻经处恢复的问题。朴老与上海佛教支会联系，召开缙素会议，推动恢复工作。1952年



赵朴老与作者合影

赵朴老担任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主任，亲自关怀恢复刻经处的工作，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信，请其在经济上给刻经处以支持，特别是选派精明强干、事业心强的徐平轩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工作，直至“文革”。1954年朴老亲自题写“深柳堂”匾额。这一时期金陵刻经处的工作成绩斐然，先后开展了整理经版和经籍、恢复刻经和流通、整理和扩建房屋、设立文物展览室、收集有关城市刻经处的经版像版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中金陵刻经处遭受严重冲击和毁坏，1966年9月，金陵刻经处被“红卫兵”宣布为封建迷信单位，强行解散，职工停发工资。1973年4月，赵元任、杨步伟（杨仁山居士的孙女）夫妇从美国回国探亲。5月1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步伟向周总理提出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当即表示同意，并指示由当时在场的赵朴初会长经办。赵朴老随后陪同杨步伟夫妇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祭扫墓塔，并按周总理指示开始工作，操劳不息。第一步收回了深柳堂三间房屋，并经朴老多次向中央和地方领导呼吁，到1979年，召回原下放的几个工作人员，筹备恢复工作。1980年10月，管恩琨任刻经处主任，全面负责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其中基础性也是最难的工

作是落实刻经处在“文革”期间被占领的房产，进行维修整顿。刻经处的房产，“文革”期间被20多户占用，从1973年起到金陵刻经处得以恢复，前后十年他九次来南京向省、市领导同志做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后经省市几任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多方努力，终于完成房产的落实，并进行了维修、整理和绿化。1980年11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朴老郑重提出：“周总理生前交下来的任务，我们有决心继续在近期内完成。”朴老每次来南京，几乎都要去刻经处视察，或询问刻经处的发展情况。当1981年金陵刻经处重新刻印经书时，朴老特为此撰写了《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以志庆贺。

### 朴老与鉴真纪念堂

赵朴老曾经说过：“中日两国，地理上一衣带水，文化上脉络相通；两千年来，我们祖先有多少杰出人物，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曾作出巨大贡献。唐代鉴真和尚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以深远的识见，忘我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战胜重重困难，历12年之久才完成夙愿；不仅把佛教戒律，而且也把唐代文化精华带到了日本，广泛传播了中日民间的友谊种子。因此一直到现在，始终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鉴真和尚俗家姓淳于，公元688年生于广陵江阳县（今扬州市），14岁出家，18岁受菩萨戒，21岁受具足戒，在诸多高僧大德的指点下，旁参经籍，潜心钻研，成为一个精通律学及各方面知识的高僧。26岁由长安回到扬州讲经弘法，55岁任扬州大明寺住持。第二年受日本留学僧人普照等人邀请，东渡日本传教，先后六次历时十一年方始成功，到达日本时鉴真和尚已是66岁且双目失明的老人了。

朴老一生对鉴真大师的无我弘法精神十分推崇，故而对大师故乡扬州尤为钟爱，对纪念大师的各项举措鞠躬筹划。1963年为了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而在大明寺内兴建纪念堂，因“文革”动乱，直至1973年才建成。赵朴老亲自题写碑文，指出：“大师以中华之耆彦，弘大法于扶桑，其东行也，排众沮，冒风涛，跋涉十年，终成始愿。其施教也，体大规宏，纲目毕具，建戒坛以立僧本，启台学以开义门，伽蓝营构，雕绘工巧之外，兼及于艺文医药，此皆盛唐文化之菁华，中土千年涵育之所成就。大师孜孜矻矻，尽其形寿，一一以传播于彼邦。魏晋以来，中日人民互助友好之宿愿，乃得以圆满实现。自是厥后，两国文明互注交流，繁荣滋大，如双星并耀于东亚之太空者，垂千余年。大师辛勤辟创之遗泽，岂唯百世不斩而已哉！降及今时，人文丕变，淼漫沧海，已化康庄。”

中日邦交后，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森本长老提出希望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邓小平当即表示欢迎。1979年，日本首相访华，也赞成鉴真像来中国巡展。鉴真像是采用扬州精美的干漆夹纆造像工艺，一千多年来保存完好，被定为日本国宝，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这次回国巡展，日本专门改造了一架干湿真空的飞机来运送。

为了迎接鉴真像回国巡展，朴老不辞辛劳，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78年、1979年两次来江苏，到南京、扬州、镇江视察宗教场所，经过多方努力，先后恢复了南京灵谷寺、镇江焦山定慧寺、扬州大明寺，这是江苏省恢复宗教活动、对外开放较早的三座寺庙。全国专门成立了以朴老任欢迎委员会主任的专门班子，江苏也成立了“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

1980年4月14日，鉴真大师座像由日本奈良

唐招提寺森本长老一行护送，赵朴老陪同，从上海经镇江瓜洲古渡抵达扬州，19日上午，在大明寺举行欢迎鉴真和尚宝像的法会，一百多僧侣云集大殿参加，盛赞鉴真和尚的伟大功绩。在21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赵朴老即兴作了讲话，更为动情。他说鉴真“自从公元753年到达日本之后，经过了1227年的漫长岁月，鉴真大师第一次回到了他的故乡——扬州，回到了他的故居——大明寺。在这令人心情激动、思绪万千的时刻，我想起了日本古代诗人芭蕉的有名诗句：‘愿将一片新叶，擦干你的眼泪。’鉴真大师的思乡之情，今天可以擦干了”，并作诗词两首。

鉴真像在扬州展出7天，瞻仰者达18万人次。除江苏各地的瞻仰者，还有来自上海、天津、山西、广东、河南、安徽、辽宁、湖北、湖南等省市的，另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及港澳同胞等19个团体300余人。

5月4日至12日，鉴真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邓颖超为开幕式剪彩，邓小平和赵朴老在京会见森本长老一行。邓小平发表文章，称赞鉴真大师像回国展是一个盛举，是两国悠久历史关系的必然结果，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长存。《人民日报》也发表题为《千载一时的盛举——庆祝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社论。5月28日鉴真大师像从北京首都机场回日本，赵朴老等到机场送行。

朴老对扬州有着特殊的情怀，近十次来扬州视察，除书写了关于鉴真和尚东渡的大量诗词，还作了许多关于扬州、扬州的自然景色、扬州的历史人物的诗词。这份特殊情感，来自对鉴真和尚的崇敬，来自对大明寺悠久的历史眷恋，也来自对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欣赏。

周加才 江苏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民族宗教局原局长。

## 守望这一方蓝白

III 黄跃平 黄正平



蓝印花布纹样

蓝印花布作为民间工艺，在我国已有上千年历史，蓝是天空的主色调，蓝与白的搭配，成就了蓝印花布的美学特质。

86岁的王振兴，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南通蓝印花布，是他最初的匠心命名。

### —

王振兴，1939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身份证上却是1940年，那个年代的人多有这样的误差。1958年参加工作，翌年就到了地方国营二甲印染厂工作。这家印染厂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连续拥有五代看缸师傅传人。这在传统印染业并不多见。

刚进厂，他被安排跟着刘仲康师傅学染棉纱。这种印染用的士林染料，将烧碱和保险粉中和起来，颜料色谱不同，染色温度也不同。当时，厂里士林染料和“小青缸”（土靛缸）都有，而蓝

印花布主要用“小青缸”印染。染出来的蓝印花布颜色有三种，一种叫“一个蓝”，另一种叫“个半蓝”，还有一种叫“两个蓝”，简称老蓝、深蓝、双蓝，而花型则有梅兰竹菊等各种传统样式。土靛印染的工艺核心在于染缸，王振兴抱着极大兴趣，又跟着靛缸师傅曹金其学习看缸。

曹金其技术过硬，突出表现就是掰撬棍的绝技十分娴熟、相当漂亮，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师傅。每天，师傅曹金其就带着徒弟王振兴做三件事：第一掀棚盖，随时察看靛缸苗水的颜色；第二学转缸，用标棍搅到缸里的苗水起靛花；第三看飞杯，就是用个碗舀一小碗苗水，再用手指一点，看它上升的云片程度，就知道靛缸的状态如何了。王振兴先在师傅身旁全神贯注看着，然后师傅让他上缸手把手教他，就这样日积月累把看缸这一核心技术学会了。

善于动脑动手的王振兴，在向曹师傅“学本事”的三年内，总结出了一套看缸和维护的经验：靛缸要红得发紫，用标棍搅拌出来的靛花能像猫

眼睛一样透明，就说明这个靛缸是优质的。放石灰水和露酒，是维护“小青缸”的关键，实则就是用石灰和露酒进行酸碱中和反应，若是比例失调，就会出现“鸳鸯缸”（也即靛缸颜色出现色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染厂和其他企业一样困难重重。县里要求新进厂的工人全部下放，但可以留一个技术骨干，以保证生产工艺不断档。由于王振兴已能独当一面，在三四十个新工人中唯一被留了下来。王振兴十分珍惜这难得机会，利用午休时间继续苦练基本功，勤奋钻研各道工序的业务技能，老师傅们也手把手教他掰撬棍技术，其他工种技能研石（即踩布）、挑布、绕布、摺布等，他都一样样地躬身实践，学会练精。由此，王振兴成了印染厂里技术最全面的能手，工作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后来有了一次比试机会，厂里举办“赛苏州”技术比武活动，包括他师傅在内的八个操作能手参加，王振兴以第一名成绩胜出，被评为技术标兵。

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王振兴对传统花型板样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而在后来蓝印花布兴盛时，他更是到处搜集各地印染企业的优质板样。后来做出口创汇，第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十五漂染厂，他和师傅对质地特别好的柿漆纸花版表示出浓厚兴趣，没想到，该厂很是慷慨，一送就是50多张。比如当时编号“A427”、今天很多人眼熟的“凤凰大元”，就是被他带回厂整理出来的。

1972年，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会议室迎来了几个“乡下头人”，他们就是“异想天开”要让产品走出国门的刘仲康和王振兴等人。在公司负责外贸额度的经理好奇的目光注视下，他们忐忑不安地从帆布包里取出四匹用南通窄布“尺一五”制作的蓝印花布。一亮相，经验丰富的业

务经理顿时两眼放光。看起来土里巴叽的蓝印花布，被慧眼识珠的经理看出了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他让二甲印染厂先出个样，由进出口公司带往秋季广交会试展。这令王振兴他们喜出望外。三个月后，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来函，广交会上接到订单要出口300匹“尺一五”蓝印花布，连同送样花型还附加了几个花型。

正是从这300匹土布开始，地处长江北岸的二甲印染厂的蓝印花布正式走上出口贸易之路，出口创汇额越做越大。

## 二

蓝印花布向前发展时，二甲印染厂新增两个车间，其中一个为刮花车间，招了三十多个青年工人，制版、刻版、刮花、染色，他们在王振兴和师傅们的指导下学练技能。后来，一家实在来不及做，就由上级主管部门牵头，又在南通、启东分别创办了工艺印染厂和卫东工艺品印染厂。有一天中午，工艺印染厂厂长听说刘仲康师傅和王振兴到南通了，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可联系，就一家一家饭店挨个儿找，终于在新华饭店找到了他们。厂长急吼吼地把王振兴和师傅接到厂里，请他俩给工人们传授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讲小青缸的制作保养，发放石灰露酒的技术要领，印染时哪些工序容易出问题等，还有靠师徒俩经验积累的厂里检验产品的工艺要求和验收标准。讲完课，师徒俩现场“诊断”，找出了工艺印染厂靛缸染色深浅不一，是由于石灰投料的操作方法错误，帮他们厂解决了“鸳鸯缸”难题。

当时，在我国还没有制作蓝印花布的行业技术标准，而王振兴对于蓝印花布制作工艺、技术要领、产品成色等已熟谙于心。1980年，受南通地区经贸委和标准局委托，王振兴执笔起草

了《南通地区蓝印花土布企业技术标准》，四年后又在上级指导下，根据国家标准局文件对上述标准进行修订，1988年再一次修改后由南通市标准局批准颁布为代号DB/3206W43-88的《南通市蓝印花土布企业技术标准》，作为南通市生产和出口蓝印花布技术标准，一直沿用至今。二甲印染厂当时申报江苏省优质产品(免检)和江苏省著名商标时，有关部门就按照这个企业标准进行验收。

传统蓝印花布只有两种，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厂里优化产品结构，成立了由王振兴领衔的复色蓝印花布攻关小组。研发人员尝试在第一次刮浆后染浅蓝色，染好后将布阴干后刮第二次浆，然后再染几次色，晒干后把石灰刮掉，清洗后的布就有了浅蓝色、深蓝色、白色这三种颜色。攻关小组用了一个月时间，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复色蓝印花布制作工艺中容易发生色差、脱灰、脱版的三大难题，成功研制出复色蓝印花布。这种蓝印花布，层次更加分明，远看立体感更强，深受外商喜爱。

1994年，南通有一家专做工艺品的研究所，派员邀王振兴出任“把勺”大师傅，传授技术并管理生产一批蓝印花布产品。王振兴带着小儿子投入了紧张工作，自己负责整个生产工艺，得到父亲嫡传技术的小儿子负责调制靛缸，父子俩也把传统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所里的项目团队。

次年，王家大儿子王建烽就办起了蓝印工艺品厂，亦名“正兴染坊”。染坊跟人家借了四只大缸，又在二甲食品厂借了一个工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正巧，南通杜小建的扎染厂有一笔蓝印花布的日本订单，他们信任王振兴，把单子交给了正兴染坊加工。当时布料退浆采用的是酶退浆的方式，冬天两手冻得通红，做得也很辛

苦。那笔订单完成后拿到一万多元的加工费，一家人心里甜滋滋的。

经过连续三十年努力，如今的正兴染坊已拥有“小青缸”组、“长缸”组等蓝印花布成套生产设备，由窄布拓展为宽幅印染，将单面增加到双面印花，从单色创新为复色花布，把单一纯棉布发展到丝、麻等天然织物，生产白底蓝花、蓝底白花、复色蓝印花布、双面蓝印花布和扎染等系列民间印染工艺品。染坊先后开发了台布、门帘、壁挂、提包、鞋帽、围巾、玩具和床上用品四件套、三件套以及服装等共40多种高档工艺装饰用品和生活用品。花布的花形图案达400余种，既有古韵悠悠明末清初的传统纹样，又有简洁明快自行设计的现代花型。染料主要采用蓝草植物经发酵等传统工艺提炼制成，具有防蛀消炎解毒的功效，染成的产品色泽纯真、色牢度稳定。正兴染坊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景气指数逐年上升，销售量一路看涨。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正兴染坊也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基地。2008年，王振兴被江苏省经贸委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2年，王振兴被文化部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 三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句名言，在南通蓝印花布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王振兴说起自己传承蓝印花布生产技艺的风雨历程，尤为感慨的是这个出自南通的民族瑰宝，在国际市场不断拓展的生存空间。

其实，南通蓝印花布过去不叫这个名字，宋代被称为“药斑布”，明清时叫作“浇花布”。那时，镇上居民和乡下农民来料加工，多叫“老蓝花布”。1972年刚做出口贸易时，因为要在每匹出口的花布唛头写上名称，王振兴觉得这个名字土而拗口，就建议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根据产品工艺内涵改为“蓝印花土布”。所谓土布，就是因为当时都是手工制作的窄幅布。自此，厂里出口的花布唛头上都有“中国江苏南通蓝印花土布”字样。后来，有了机织的宽幅布，“蓝印花土布”名称中的“土”字就不适用了，成了今天的“蓝印花布”。

有一个日本客户，久保麻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拥趸，很早就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致力于两国民间工艺品的交流和贸易。久保麻纱在上海提出要南通蓝印花布出口生产厂家参观，于是，外贸公司叫王振兴带些样品去上海和日本客商洽谈。在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王振兴终于与久保麻纱女士握手了——这一握，开启了他们之间跨越世纪的合作友情。久保说，为了寻找南通蓝印花布出口的原生产厂，她和日本同行跑了南通的其他工厂，还去了浙江等地厂家，终于找到了原产厂商。

历史上，南通是著名的蓝染之乡。种蓝制靛业是通海地区乡民村妇的传统产业。据明嘉靖《通州志》记载，当时海门县的土贡蓝靛年达“一千斤”，而整个通州的土贡靛青多达“三千五百斤”。靛蓝最优者又数如皋石庄镇——因地处江岸，土质疏松，引甜水来灌溉靛田以促蓝草的生长，故而石庄出靛含色率远高他处。王振兴回忆，从石庄镇一带运抵二甲镇的蓝靛木船，20世纪50年代每年仍达十余船次，从中可窥石庄种蓝草与二甲蓝印花布之间的产业链关系。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国，真正的靛蓝一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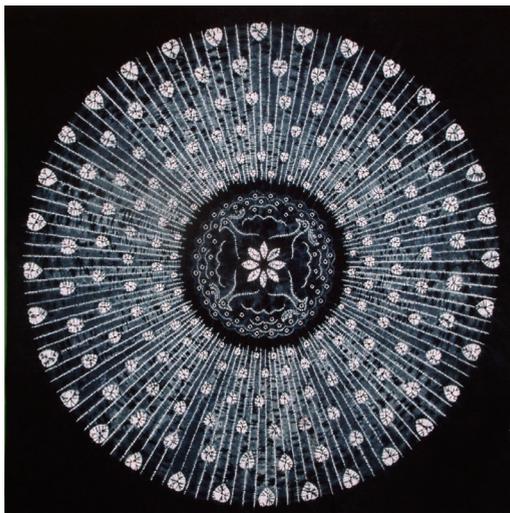
难求，连石庄镇等传统种蓝名镇也很少有人种植了。王振兴开始了艰难的寻蓝之路，终于在浙江中雁荡山山区发现了一个地块农民尚有靛田种蓝。于是，从浙江采购了这种小青缸原料，使得用蓝草植物作原料染制蓝印花布的传统工艺，在他手里得到了真正的传承。

内外销市场越来越大，产品开发力度自然也越来越强，正兴染坊先后有一大批蓝印花布珍品获得荣誉和大奖：壁挂《秋之韵》，作为国礼赠送给尼泊尔文化部部长，同时这幅画还和《龙凤》台布一起在全国农业休闲创意精品大赛上荣获金奖，又在江苏省工艺美术“艺博杯”大奖赛评比中再获金奖；复色蓝印花布壁挂《春暖》在江苏省工艺美术博览会上收获金奖；组件《春》《夏》《秋》《冬》用三套版子染四次色，染制出浅蓝、中蓝、深蓝、白色这四色，在中国农展馆展出时，荣膺最高奖；扎染台布《孔雀》在全国第八届花博会上获银奖；《重明翠逸》在法国卢浮宫展出时，因“在国际艺术运动会和展览及艺术研讨会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而被组委会授予“优秀奖”……正兴染坊，进入了金秋收获季。

#### 四

2006年，正兴染坊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展示基地，时任南通市文化局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到二甲镇，为正兴染坊颁授这块沉甸甸的铜匾。

为了让蓝印花布这朵民间工艺的奇葩得以传承和振兴，从创办正兴染坊开始，王振兴扛着这杆大旗30年艰难跋涉。家里三个儿子都四五十岁了，至今一个也没有分家，这是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从创办正兴染坊至今积累



扎染台布《孔雀》



壁挂《重明翠逸》

起来的钱，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包括建靛缸、买工房、购仓库、搭棚撬棚，盖刻版室、样品室等。

说起蓝印花布传承的艰辛，有一件事曾经给老王家带来过很大的影响，甚至说是阴影。时光退回，当时种植靛蓝草的农民越来越少，王振兴带着二儿子王建勇在江浙一带农村到处寻找，终于在浙江找到了，却在回来路上发生严重追尾事故，王振兴与王建勇都负了伤，王建勇伤势严重，花费20多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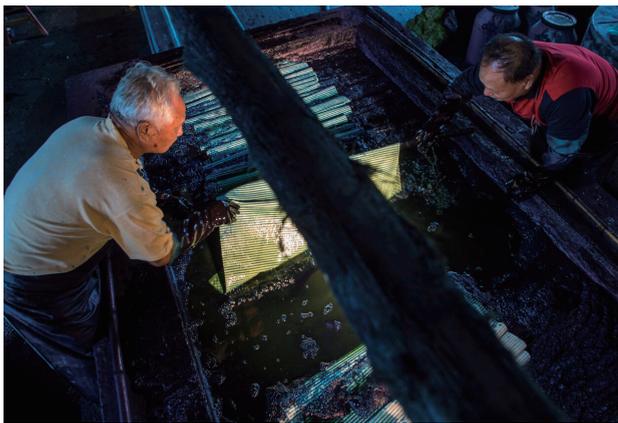
这一经历，让全家人第一次对今后还做不做蓝印花布起了激烈争议。王建勇的妻子及其父母，对做蓝印花布犹存疑惑。此时，王振兴却有不一样的想法：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传承，差不多是用父子俩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今后再怎么困难也要坚持做下去。

多年来，每当王振兴的儿子媳妇们对坚持传承这份非遗有点滴不理解时，王振兴就召集家庭成员会议，与他们反复说明事理，春风化雨一般。时间一长，儿子媳妇们都更加明白了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支持，建立了传承蓝印技艺的信心和勇气。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今，作为蓝印花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集体，全家人有了更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越干越有劲。继王振兴被命名为国家级传承人后，都已干了有30多年的三个儿子也先后成为省、市、区级传承人，三个儿媳妇也加盟了其中。尤其是已经从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小孙女，也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把爷爷和一家钟爱一生的蓝印花布技艺接力下去，当正兴染坊的新生代。这是王振兴特别欣喜的事：“我的孙女从小耳濡目染，对蓝印花布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她可以代表许多年轻人对蓝印花布的喜爱。”

王家尽心、全力传承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同时，东瀛久保家族也在同步坚守南通蓝印花布在日本的商业版图。久保把她所热爱的蓝印花布事业交到了侄女福原梨花手上。

2019年2月3日，日本首都东京。由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主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后援的“中国蓝印花布展”，正在热烈进行当中。精神矍铄的王振兴，应邀携长子王建烽一起到会。展览会上，王振兴父子自信、熟练地向到



白发青蓝间

会的日本官员、客商、大学生，讲解国内采用自然蓝草植物、延续悠久的靛缸染制蓝印花布的技法，并展示了正兴染坊生产的包括台布、衣服、杯垫、拖鞋、壁挂在内的各种蓝印花布产品。参会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踊跃选购，在大街小巷刮起一股自然清新的蓝白风尚。此情此景，给南通蓝印花布技艺第六代传承人王建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全国各地大中院校学生包括外国留学生，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工艺美术专家学者，纷至沓来。据统计，全国约有包括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在内的90所学校组织大中学生来正兴染坊研学、实习。2016年6月，第六代传承人王建烽、王建勇、王建炜兄弟仨，还一齐登上南京艺术学院第一届蓝印花布非遗培训班讲坛。

怀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各大媒体记者纷纷来到正兴染坊采写、摄制：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七套以及江苏卫视来了，对王振兴的现场访谈节目，使正兴染坊美名传遍中华大地；香港凤凰卫视来了，一部中文专题片《蓝印花布，中国南通的千年传承》，让正兴染坊蓝印花布之雅传出中国，远播世界。日本一杂志社

也来了，特派记者专赴南通，采访拍摄王振兴的染色作坊，回国后发表了通讯《中国物产蓝印花布》并附上多幅照片，题图正是王振兴家全家福。看着这一张全家福，王振兴十分自豪和骄傲，因为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三代传承人集体的合影。

2024年10月1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幕，王振兴应邀带去两大箱蓝印花布工艺品参展。开幕式刚结束，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权一行来到王振兴展位。饶副部长拉着王振兴粗糙的手，亲切地询问蓝印花布印染的工艺，尔后又让他介绍传承保护国家非遗项目经验。王振兴一一作答。饶副部长颇有兴趣地观看展位上的蓝印工艺品后，竖着大拇指连声称赞。临走时，他握紧王振兴的手：王老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一定要把这门技艺传承好！王振兴颇为感动：在有生之年，我下决心把这一民间工艺“宝贝”传承下去。虽已年迈，然而，王振兴前行力量更为强大。

未来已来，迎潮而立。满心期待凝聚着王振兴一家人心血的正兴染坊，拥有更为精彩的曼妙未来！

（文中照片由王建烽提供）

黄跃平 南通日报社原记者；黄正平 南通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 他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 ——中国生物化工的“开山者”欧阳平凯院士

III 龙海秋

在欧阳宗祠的樟木箱里，静静地躺着一部跨越千年的家谱。这部家谱记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家族的传承与变迁：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到近代工程师欧阳震，再到当代生物化工专家欧阳平凯。

在石家庄电化厂的废墟间，一个清瘦的身影正俯身拾掇残砖断瓦。1968年的冬天，欧阳平凯怀揣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以普通工人的身份站在了这片曾经硝烟弥漫的废墟上。氯碱厂的电解槽闪着微光，映照着他被化学试剂熏黄的笔记本——那里记录着一个知识分子与工业现实最初的对话。

“先从清理废墟开始。”老师傅指着满地狼藉。这个清华高才生没有犹豫，抡起铁锹加入重建的队伍。在瓦砾与梦想的交织中，他发现了比课本更深刻的方程式：每一块砖的垒砌，每根管道的铺设，都是对理论最真实的检验。

白天，他蹲在车间记录数据，指尖沾满机油与铁锈；夜晚，他借着昏黄的灯光研读文献，在笔记本上勾勒着设备改造的草图。工友们发现，这个书生不一样——他既能解读复杂的化学方程式，也能操起扳手拧紧漏气的阀门。渐渐地，



欧阳平凯(1945—2023)

“欧阳技术员”成了车间里最受欢迎的人。

最难忘的是那次电解槽改造。面对不断泄漏的氯气，欧阳平凯带着工友们用土法研制密封装置。七天七夜的坚守，他们用最简单的材料解决了技术难题。当第一股合格的氯气产出时，老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欧阳，你这书读得值！”

多年后，已成为中国生物化工领军人物的欧阳平凯院士，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工厂是我的第二所大学。它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真正的创新，必须从生产实践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对于刚入职南京化工学院的欧阳平凯来说，时钧院士的指引犹如一盏明灯。“生物化工将是未来。”这位智者的话语，在重返清华攻读研究生毕业的欧阳平凯心中生根发芽。多年后他回忆道：“时先生的手指，为我指明了国家最需要的方向。”这不是简单的学科选择，而是一位学者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战略的自觉担当。

在做出抉择的前夜，欧阳平凯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字句：“就像打仗时放弃即将攻克的阵地，转而去开辟新的战场。”经过三天三夜的深思，他最终敲开了时钧院士办公室的门，说出了那句改变一生的话：“国家需要生物化工人才，我就去学这个。”

远渡重洋，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日日夜夜，欧阳平凯经历了一场学术认知的深刻革命。他亲眼看见了西方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精密的发酵罐如同钢铁巨兽般高效运转，先进的分析仪器揭示着微观世界的奥秘。这些不仅代表着技术上的领先，更展现了一种系统化的科研思维和工程理念。在实验室的荧光灯下，这个来自东方的学者既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这段留学经历如同一座桥梁，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也连接了传统与未来。当欧阳平凯学成归国时，他带回的不仅是先进的生物化工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要将新科技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土地上，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今，我们难以想象现代生活中生物化工缺席。然而，20世纪80年代，当“生物制造”在世人眼中还只是科幻小说的遥远构想时，世界前沿

科研的热点仍集中在有机化工，而生物化工远没有成为主流研究方向。当聚谷氨酸分子结构终于清晰显现时，欧阳平凯已经发声：“真正的科学发现，是听见自然低语的时刻。”

他已经预见到：那些肉眼难见的微生物，将重塑整个化工产业的未来。欧阳平凯，这位从工厂车间走出的科学家，正带领团队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开启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

历史的转折往往始于远见。1982年，当国际学界首次实现用微生物作为“细胞工厂”生产化学品时，中国的化工产业仍在传统合成道路上艰难前行。欧阳平凯敏锐地意识到，这场由微生物引发的产业变革将改变全球格局。他从最基础的菌种选育做起，在微生物代谢调控、酶分子改造等被视作“冷门”的领域默默耕耘，坚信这些研究终将汇聚成改变产业的科技洪流。

从时钧院士的指引到滑铁卢大学的求索，从个人的学术选择到国家的战略需求，欧阳平凯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接力。这条从明灯指引到自立创新的道路，见证了一个中国科学家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的崇高追求，也预示了中国生物化工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第一部生物化学教材是怎么来的？

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物化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欧阳平凯教授发现，学生们上课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只能靠老师口述、学生记笔记。

“这样不行，得想办法弄本教材。”欧阳老师对教研室的同事们说。可那时候，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了。他们手头仅有的，是几本辗转得来的英文原版书和一些零散的国外期刊。

欧阳平凯编写《生物分离工程》教材的那些日子，用他学生的话说，“简直是在拼命”。白天要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做实验，只能利用晚

上和周末写书。

欧阳平凯教授编写的《生物分离工程》教材，开创性地把生物技术与化工原理完美结合。翻开这本教材，你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每个理论知识点后面都跟着具体的工程案例。这些案例可不是随便找来的，都是欧阳教授团队在科研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

作为中国生物化工学科的开拓者，欧阳平凯用这本教材奠定了整个领域的理论基础。从最初的油印讲义到正式出版，再到后来的多次修订，这本教材见证了中国生物化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翻开最新版的《生物分离工程》，依然能找到当年那些经典案例的影子，这正是学科传承的最好证明。

FDP(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作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特效药，曾经完全依赖进口，1149万美元的年进口额高居全国药品进口榜第六位。更令人痛心的是，进口FDP注射时会产生剧烈肌肉疼痛，患者常常痛得冷汗直流。

南京的盛夏热浪翻滚，实验室铁皮屋顶蒸腾着暑气。欧阳平凯凝视着烧杯里那团顽固的胶状物——第三批FDP溶液再次凝结成半透明的“果冻”，在玻璃壁上留下黏稠的泪痕。这是1994年的艰难时刻：进口FDP冻干粉每支售价相当于普通工人整月工资，却因杂质残留让患者注射时痛如刀割。当他的弟子应汉杰带回天津专家的评估报告，结论令人窒息：“即便专业结晶机构也无把握，需预支经费试错。”

“那就自己造条路！”欧阳平凯抓过手电筒照向胶体，光束在浑浊液体中划出朦胧光路。这道偶然的丁达尔效应，成了简陋实验室里唯一的“监测仪”。在连浊度计都匮乏的条件下，师徒二人开启了人类制药史上最原始的攻坚战：玻璃棒作搅拌桨，滤纸当离心机，烧杯里承载着中国制

药业的全部希望。

深秋的北京，欧阳平凯怀揣着海南生产的FDP样品走进国家科委会议室。当雪白的结晶粉末在投影仪下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时，全场响起惊叹。五部委联合签发的“国际级新产品”证书，成为中国生物制药领域划破夜空的启明星。此刻距离实验室里手电筒照胶体的寒夜，不过五百余个昼夜。

当“福达平”的蓝色药盒铺满药房货架时，这场突围完成了从实验室到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传递。在西部某县医院，主治医师用国产FDP注射液将心肌梗死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的瞬间，无菌车间里那些精密调控的温度参数、质检室内重复千遍的光谱分析，突然都有了超越数字的意义。6000万元的年销售额背后，是无数重新跳动的的心脏在续写生命账本。

九十年代，突破如期而至。欧阳平凯团队开发的固定化细胞技术，使酶制剂生产效率提升40%以上，不仅填补国内空白，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外同行评价道：“中国团队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生物催化的新可能。”

然而，欧阳平凯的视野远不止于此。他凝视着广袤田野上每年产生的8.2亿吨农作物秸秆——这些“甜蜜的负担”在秋收时节化作漫天青烟，每年焚烧量相当于浪费4亿吨标准煤。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便提出石破天惊的“两个替代”战略：用秸秆类生物质替代化石原料，用生物制造替代化学制造。

“我们的答案在田间秸秆里。”欧阳平凯常常手持一根玉米秆对团队说，“这简直就是‘固体石油’啊！”在他的构想中，秸秆应该经历一场“华丽变身”：纤维素变成糖，半纤维素变成醇，木质素变成新材料。这个当时近乎天方夜谭的设想，成了团队三十年如一日追逐的目标。

进入21世纪，欧阳平凯院士的愿景逐渐成为现实。在他带领下，南京工业大学建成了国际一流的生物制造研发平台，多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中，生物基材料制备技术成功实现万吨级产业化，产品远销海外；“生物质全组分利用”理念更引领了行业技术变革。

欧阳平凯的科研人生，恰如一条贯穿生命全周期的创新链。从婴幼儿营养的微藻DHA到老年健康的心血管药物，从实验室的酶催化反应到万吨级智能工厂，他的“需求导向、工程思维、产业协同”方法论，正在推动中国生物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微生物是人类最好的微型工人，”欧阳平凯常说，“它们不知疲倦，不会罢工，还特别环保。”在他眼中，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工人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世界：从药品到食品，从日化到能源，生物制造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今，当人们穿着用玉米制成的聚乳酸纤维运动服，使用着秸秆转化的生物基材料，享受着微生物带来的各种创新产品时，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生物化工的开拓者。欧阳平凯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那些曾在20世纪被视为“天方夜谭”的想法，如今正引领着中国化工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作为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南京工业大学校长欧阳平凯院士始终秉持着独特的育人理念。在他看来，工程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这一理念通过他创立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模式得以实现。他常对学生说：“我们的实验室应该延伸到工厂车间，学生的毕业论文应该写在生产线上。”这句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工程教育的深刻智慧——真正的创新必须扎根于实践的土壤。

长江水奔流不息，梧桐树年轮增长。在试管

与大地之间，在实验室与车间之间，欧阳平凯用最朴实的坚守，书写了一个科学家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诚，对土地的忠诚，对时代的忠诚。他的教育实践，犹如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始终流淌着“为国育才”的赤子之心，培养着一代代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时代新人。

南工大里传说，欧阳先生身怀两种绝学。

一是化学生物反应工程，这是写在教材里的；另一手却是金庸古龙的功夫，这是藏在弟子们笑谈中的。应汉杰总说起那个顽劣同窗——他整日躲在实验室后门看《天龙八部》，被欧阳先生撞见也不慌，反得了句“虚竹破玲珑棋局，可比你解反应方程利索”。后来该生竟把武侠小说包上《生物分离工程》的封皮，先生见了也只当不见，倒在某次组会上忽然问起：“你最近研究的‘降龙十八掌’，可是用色谱法纯化的？”满堂哄笑中，先生眼镜片后闪过一道黠光。

欧阳先生办公室抽屉里总躺着几本卷边的武侠。有回暴雨困人，见他擎着本《笑傲江湖》踱进实验室，忽然拍案道：“令狐冲这独孤九剑，讲得竟像我们的连续催化反应！”众弟子围看时，他已用红笔在书页批注起来，墨迹淋漓间，尽是一些“传质速率”“反应速率”之类的术语。后来那本书在课题组流传，成了另类教材。

在他心中，面对科研难题要像令狐冲破剑阵一样机变，也要像郭靖守襄阳一样坚守初心。在一次科研项目中，欧阳平凯带领团队将复杂的生物化工反应过程拆解成若干小步骤，用流程图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招式拆解”的方法，不仅解决了技术难题，还培养了学生的系统思维和创新能力。

从青丝到白发，他将“让中国技术不再受制于人”的初心守成了毕生的信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面对国外企业高价收购其团队核心技

术的提议，他断然拒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半个世纪的坚守，他让中国生物制造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份赤子之心，正是他生命中“忠”的基因。

在科研实践中，他创立了“三真原则”——真问题、真数据、真应用，这已成为实验室不可动摇的铁律。在核苷酸分离介质研发中，他要求团队测试327种材料组合，最终找到的理想配方，精度堪比瑞士钟表匠调校的机芯。这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他“诚”的基因。他常说：“科研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在生物反应器设计中，他对每个参数都精益求精，甚至一个阀门的材质都要反复验证。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正是对“精”的基因完美诠释。

然而，他最令人敬佩的是将科研成果书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的基因。他倡导的“三现主义”——现场、现物、现实，让一代代学子懂得：真正的学问，既要能写在论文里，更要能种在天地间。

这组忠、诚、精、实的精神基因，不仅塑造了欧阳平凯的科研人生，更成为中国工程教育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如同生物密码，在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中传承延续，汇聚成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力量，见证着一个科学家对真理、对土地、对时代最质朴的忠诚。

这一切，无不凝结着东方智慧的现代回响——紫金山的星光穿越时空，落在这方培养皿中。有一束光，见证着中国科研独有的传承：当科技征服自然时，东方智慧正教我们如何与自然共舞——就像江苏省科协主席欧阳平凯院士常说的：“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是让技术成为自然的诗笺。”

有一年的教师节，南工大的学生们送给欧阳平凯校长一个特别的礼物——将实验室三十年

的老照片与地图标记时空对应。当1988年穿着回力鞋的年轻欧阳平凯与华发学者的影像，在地图上的南京光点重合时，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这张不断生长的地图，已然成为记录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记忆，而地图前那个执着的身影，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科学家的缩影。

2023年，欧阳平凯院士的生命之火熄灭。但在他奋斗过的实验室里，超浓酸水解工艺正迭代升级；在他调研过的湖南家乡，老农数着秸秆回收的万元增收笑纹舒展；在他奠基的产业链上，全国32项核心技术使秸秆综合利用率突破72%。当米其林餐厅端出秸秆饲料养育的雪花猪肉，当国产飞机加注秸秆基航空燃油冲上云霄，他的宏愿终成现实：曾经焚烧在田间的8亿吨秸秆，如今正编织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纬。

而那些曾经被他照亮的人们，如今自己也成了发光体——像星辰般散布在各行各业，继续传递着光与热。一位在基层农技站工作的学生说：“欧阳老师教会我，科学不仅要写在论文里，更要写在大地上。”一位投身产业的企业家校友说：“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做人的准则。”

龙海秋 曾任《南京日报》专刊部负责人，《周末报》《金陵瞭望》副总编辑。

## 客之道

III 贾梦玮

请客，呈递请柬是仪式，也是请客者对客人的一份郑重。后来请柬的设计越来越别出心裁，但也逐步程式化了。质朴无华，是文明早期的特征。我最喜欢的一份请柬，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那也是眼下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请柬。这枚请柬后来被称为“悬泉浮屠简”，不仅朴素，而且饶有趣味。材质为松木，文字相对完整清晰。第一行为大字正文：“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第二行是时间地点的提示，字体较小：“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制作的时间在公元51年—公元108年间(据考古学家记载：同一具体地点出土的128件汉简中，有11件有具体纪年，最早是公元51年，最晚是公元108年)。这也被认为是敦煌最早的佛教资料。佛教将阴历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称六斋日。考古界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谭堂是邀请师父到浮屠里参加斋会(那时的斋会可以少喝一点儿?)，另一种观点认为他只是备了酒菜邀请自己的师长去吃饭。

“少酒薄乐”，乃人生不易达成的中庸境界；这四字，让我玩味思考，也让我心生欢喜。东坡说：“人间至味是清欢”，与“少酒薄乐”异曲同工。

我相信东坡没有见过这枚汉简。至少在把握人生滋味方面，苏轼先生和谭堂先生是暗合。“壶中少酒书为乐，室中无花墨生香”，是好句，但离开酒说酒，撇开花说花香，就有了少许酸味。“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黄庭坚《薄薄酒二章(其一)》)是什么就说什么，有而不多，乃可长久。我想象：主人谭堂邀请的这位客人，按照约定的时间，西入小浮屠里七门，到了谭堂家中，宾主“少酒薄乐”(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词替换)，也许会谈到刚传入的佛教与儒教的关系。言笑晏晏，微醺成就清欢，主客一定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为有这样的回忆，一定有了后续的回请与再请。如此一来来往，小浮屠里七门成为往还必经之地。迎着夕阳去，披星戴月回。乘兴往，恰兴归。多么美好的路程。我有时神思恍惚，真想考证一下这浮屠里七门究竟位于何处，我好去走上几个来回。

这枚“悬泉浮屠简”作为请柬使用的汉代，也是请客风气大变革的时代。汉乐府《陇西行》描写了一位“健妇”在家里待客的真实场景，朴实而有情感：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



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汉代还没有严格的男女大防，陇西地区又是民族杂居之地，由此才可能出现女主人出面请客之事。诗的开头描写请客的环境(主人的家居情景)，称得上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与风俗画。待客的程序很明晰：女主人微笑问平安，再请上堂，然后上酒，接着上饭，最后是送客。这些被女主人处理得如行云流水一般。当年还是米酒，没有蒸馏技术：糯米酒沉淀后，上面清澈的部分就是清酒；而糟滓未经滤出的糯米酒，呈现出白色，是浊酒，又叫“白酒”。细心的女主人事先分开了清酒和白酒，随客取用。看客人喝得差不多了，机灵的主人赶紧使眼色让厨房赶紧上饭，否则稽留久了，酒喝高了，难免弄出是非。客人们只管喝酒，女主人把握局面，她有智慧。“绿水残霞催席散，画楼初月待人归。”(唐·万齐融《三日绿潭篇》)这位女主人不一定发出过类似“少酒薄乐”的请柬，但一定知道中庸是宾主尽欢的原则。原来，“少酒薄乐”不仅关系客人，也牵涉主人：客走主人安，客人的家中人也盼着作客之人早些归来。

民间人家正式宴请，当属嫁娶生丧等场合。汉代商业还没发展，商务宴请应该很少。据专家考证，先秦时期，人们并不把结婚当作喜事，所

以也不庆贺。汉代某些时段，法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因为有法律撑腰，有些地方官为了显示自己的官威，甚至会出面干涉婚宴浮华的吃喝之风。也许是没有酒的缘故，尽管结婚的程序、礼仪非常繁杂，但婚礼的场面却很冷清。

改变这种状况的是汉宣帝。据《汉书·宣帝纪》，汉宣帝认为禁止民间办婚宴，太不接地气了，于是发布官宣：“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皇帝发话，而且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酒宴也是行礼乐的方式，民间婚宴就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结婚的人家，好像有了酒宴，才有了喜气。

汉代人请客吃饭，酒菜逐渐有了规式，所谓“觞酒豆肉”(桓宽《盐铁论·褒贤》)，一尊酒，一盘肉。整不了肉的贫寒家庭，也争取打点野味招待客人。《汉书·董仲舒传》记载，长安的水池中有不少青蛙，“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穷人家是把青蛙当作鱼来吃的。拿青蛙当鱼，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总之，为了请客，大家各尽所能，都蛮拼的。

随着饭馆的出现，除了家宴，人们也逐渐适应到酒馆饭肆请客吃饭了。据《后汉书·郭太传》记载，郭太到陈留郡时，认识了当地书生左原。此人犯了事，郭太就想劝他改邪归正。于是“设酒肴以慰之”。郭太劝他多反省自己，“责躬而已”。郭太是太原人，客居陈留郡，大概率是在陈留郡的酒馆请左原吃饭。请“坏人”吃饭是《郭太传》最重要的部分。当时就有人批评郭太接近“坏人”。而在郭太看来，一个人犯了错，如果厌恶他太甚，会让他破罐子破摔，做更多的坏

事。如果只是说教，郭太对左原可能起不了感召的效果；请在酒馆吃饭，酒过三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效果大不一样。果然，中国人的好多事都是通过“请客”弄成的。郭太出于某种“大义”，主动请一不相干的犯事之人吃饭，为“请客”这件事增添了别一样的光彩。郭太去世后，为他写碑铭的是大名鼎鼎的蔡邕蔡中郎。蔡邕感佩于郭太的仗义有情，对人名言：“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意思是他写的那些盖棺论定的颂词，只有郭太当得。蔡中郎动了感情，说了实话，不惜得罪太多的人。

比郭太稍晚出的东汉读书人仲长统，人生观不同，也决定了他的请客观。在他看来，“名不长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后汉书·仲长统传》）。请客的目的就是请客自身。“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仲长统《乐志论》），良朋、酒肴，足矣，没有其他盘算，请客就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仲长统请客的次数一定比郭太多得多，但《后汉书·仲长统传》对此只字未提。

在中华文化圈，请客乃大事，也大有玄机。请客政治、餐桌规矩，在中西方都是门大学问。本来应该是，朋友们相约，略备酒菜，花费也不多，宾主都没有负担，相谈甚欢，不失为世间美事。“酒”和“乐”的度确实不易把握，过了小则伤身、生悲，大则甚至可能亡国。请客本来是要取得宾主尽欢的效果，但把“请客”阴谋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一旦把请客弄成鸿门宴，或者像曹操请刘备做客，酒席上刀光剑影，吓得筷子都掉地上了，那就跟请客的宗旨背道而驰了。关汉卿《玉镜台》第四折：“今日府尹相公设宴请客，不知何意，须索走一遭去也呵！”无来由的请客，让被请的人心神不定。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

家的手软。哪些人参加也很重要，否则气息不对，难免不愉快。请客背后的意图，以及同席者，让人不得不防。我在中年之后，不弄清请客的这两个关键因素，一定不会赴宴。原因不言自明：年轻时因此吃过不少亏。

政治、经济、军事要请客，学者当中也有喜欢请客的。

据顾颉刚之子顾潮回忆，当年燕京大学教授有在家宴请宾客的风气。顾家当年住在北京成府蒋家胡同老三号院，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32年6月21日，燕大第十六届毕业典礼，邀请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顾颉刚的老师）来校演讲。此应是公事，燕大出资在饭店酒馆宴请，合情合理合规。也许那时也是家宴规格最高，顾颉刚选择中午在家宴客，胡适夫妇、钱玄同、容庚、商承祚、郭绍虞、顾廷龙等同席。席间不仅宾主尽欢，也有学术交流，且促成了学术成果。顾廷龙席间以自己所撰《吴宓斋先生年谱》向胡适请教。胡适不存学术私心，肯公开自己的学术资源。翌日，顾廷龙就得到胡适提供的《吴宓斋致胡守三手札》一册，为年谱增加了不少珍贵资料。胡守三乃胡适之父，当年曾与顾廷龙外叔祖王胜之同在吴宓斋（大澍）处任职。吃饭、饮酒、沟通情感、促进学术交流，这次请客、待客、做客，功莫大焉。

顾颉刚好客，也见于钱穆《师友杂忆》：“余初到校即谒颉刚……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人与家人同餐。”钱穆有时还会留下住一两个晚上。钱穆拿自己不当外人，当然是因为感受到了主人的“情厚”。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来校讲学，顾颉刚也是在家中宴请，作陪的有梅贻宝、侯仁之、雷洁琼、顾廷龙等。（顾潮《成府顾寓和禹贡学会》，《九州》第五辑）好客待宾如此，一定留下太多美好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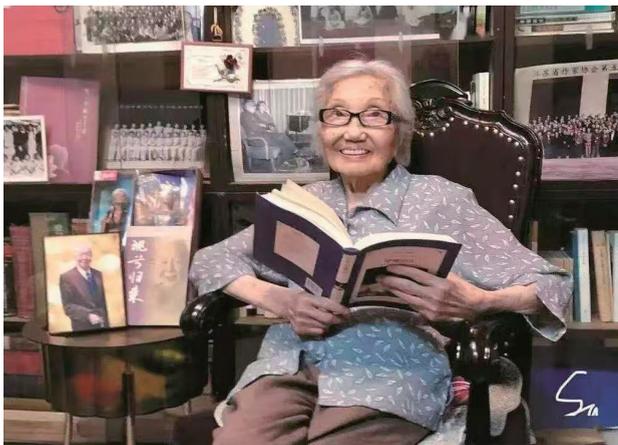
忆。我也十分赞同钱穆的观点：常常肯留宾客与家人同餐者，一定是真挚、热忱、厚道之人。没有比“情厚”更让人怀念的了。

我父母待客热忱，在我老家那一带是出了名的。亲朋好友包括我们兄弟的同学朋友当年都喜欢到我家来。那时也没有手机提前通知，经常家里突然就来了几位。而且马上就到饭点了，吃饭可是大事。父母每次只是稍事“尴尬”（主要是时间仓促，担心拿不出什么菜招待客人），但马上就从容热情起来。老夫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父母信奉的是：不管远近，不管是否志同道合，来的都是客，客为大。我母亲眨眼间已在灶台上忙活起来，拿出家里最好吃最好喝的，生怕慢待了客人。有了灶台上的烟火气，家里才有了迎客的喜庆气氛。当年物质贫乏，我也知道家中没啥好吃的。但我母亲变着花样总能端出几盘菜来，常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佩服不已。这是她的本事。我父亲不会做菜，但情商高，知道年轻人的不易，夸赞加鼓励，温暖人心，给人希望。所以多少年过去，我和我弟弟的朋友同学，来我家做过客的，最想念的人是我父母——倾其所有给他们提供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人，而不是请客的我们——无数次给父母带回各色客人、给父母添乱的人。

待客是一回事，请客又是另外一回事。主动请客，依然是父母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父亲奔九的人了，依然惧怕请客。明明约好的客人，无缘无故地说不来了；有些亲戚朋友虽然来了，主人热情招待，但不知为什么又不高兴了、生气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因而焦虑痛苦。他老人家总希望皆大欢喜，其实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皆大欢喜这回事。客人可能觉得礼节未到，或者是知道了被请的客人中有不对路的人，都可能找借口不来。来了的客人可能因为安排的席位不对而扭

头走人。为此，热情好客的父亲沮丧不已，甚至发誓不再请客。但也仅是发发誓，来了亲朋故旧，他老人家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掏心窝子。他只是不愿意正式宴请，因为那样需要平衡好各路神仙。搞平衡，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在好客这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家的家风。苏童至今只为我写过一篇短文，千字左右，其主要篇幅就是写他偶遇我的请客场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忘了为什么事，我去颐和路老房子里的作家协会，路过《钟山》杂志社，看见茶几上堆着杂乱的饭菜，还有好多啤酒瓶子，原来是贾梦玮在宴请宾客，一如那张作为餐桌的茶几，他的待友之道热情、粗犷，随遇而安。”他倒是准确描摹了当年我请客的情景。那时我是单身，刚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还没分房，也买不起商品房，主编徐兆淮老师同意我临时借住在办公室：同事们下班了，我可以相对自由地利用编辑部空间；第二天上班前一定要收拾好铺盖、餐具，打扫妥当。刚刚毕业，同学们之间情深义重，我一想念他们，当然就是请他们来编辑部聚餐——那时大家肚子里还没有什么油水，他们也经常主动要求来搓一顿，颐和路2号《钟山》编辑部就成了据点。我们那时的月工资印象中不到一千块，经常下馆子当然不现实，要请客聚餐，只能自己“料理”。因是办公室，没有煤气，也不能有明火。我置办了“三大件”：微波炉、电饭煲、小电冰箱。前两者上班时间可以迅速藏到柜子里，小的冰箱可以放在不起眼的角落，以免招人眼。所有的菜肴都只能在微波炉里烹制：鱼、肉、虾、花生米、素菜，包括烧汤。所有的微波炉里做出来的菜，味道都与传统的味道相异，我的味觉记忆至今仍能记得当年微波炉肉、微波炉鱼虾、微波炉鸡蛋、微波炉青菜的味道。当年还有一本微波炉食谱，无比丰富，按照那食谱，微波炉无所不



杨苡先生

能，似乎可以烹制天下所有美味。我至今还记得一些菜的烹制谱系：放什么佐料，用什么火，多长时间……

我相信，只要有其他条件，现在极少有人用微波炉做菜，因为那味道，嗯嗯，确实太特别！各地文学界朋友，如果他们当年到颐和路2号做过客，一定有不少人记得那特别的味道。无论如何，我会永远记得微波炉当年为我立下的汗马功劳。

那时的买菜、择菜、做菜，现在想来虽然琐碎，但还算方便。唯一一件事有点“难度”。特别是寒冬，客人们酒足饭饱，相谈甚欢，那时都年轻，很难做到“少酒薄乐”，也不怕熬夜，离开时常常到了第二天凌晨。曲终人散，难免惆怅。杯盘狼藉本也并不可怕，但那时没有暖气，所有碗碟上的油脂已经冻得发白……繁华过后，留下我一人独自面对这样一幅场景，情绪确实有点复杂。我只能顶着瞌睡，要烧上很多开水，冒着寒风到外面的洗漱间，一一将它们烫开洗净，收纳到相应的地方。没有偷懒拖延的可能，因为第二天早上同事们都要来上班，显然不能让他们看到那样的场面。这一“难度”，当年我从未跟我的客人抱怨过，因为不想让客人为美好的回忆添上

“歉疚”。

请客、待客是主动的，请客者大有讲究，否则客人会有负面感受。做客，从文字上看好像是主动的，其实兼具被动与主动。做一个客人，如何跟主人互动，也自有学问。社会人免不了有无数次做客的经历。有时是主动上门，有时是被邀出席，但都是客。对做客，我当然有发言权。我做了多年的主人，自然也就做了无数次客人，有些做客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有感动，也有愧疚。

在杨苡先生家“做客”已经成为永远的回忆。我刚做编辑那会儿，经常往杨苡先生、赵瑞蕙先生的北京西路寓所跑。先是因为工作关系去谈稿件，他们夫妇都是我的作者。后来常常就是去聊天、玩儿。记得第一次坐在他们家客厅，杨先生给我冲泡了一杯咖啡。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那时只知道有咖啡一说，但在那之前从未喝过此物。杨先生是资本家大小姐出身，当然早早知道咖啡是怎么回事。咖啡杯托盘上搁着的那把小勺，我想当然以为就是用来舀咖啡的：咖啡精贵，小勺恰当其用。所以，我全程用那只小勺仔仔细细把咖啡一勺一勺舀到嘴里，也难免发出吡溜吡溜的声音。主人大概是怕我尴尬，并没有纠正我：那把小勺只是用来搅拌的。也许在他们看来，既然开始喝咖啡了，迟早会明白此事。从此，我在他们家身心放松。

中国的老人，可爱的比例较低。杨苡先生夫妇，不仅可爱，而且可敬、可亲，要把这三者集中到一块儿，那就是天花板，我至今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而且杨苡先生是时光静止，永不改变。她生于1919年，赵瑞蕙先生生于1915年，年龄够大，但我在他们家从未感受到暮气，还有什么老人味，永远阳光温煦，清新愉快。我没大没小地跟他们聊天，他们好像也没把我当小孩，没有

居高临下，更无说教。我们说东说西、谈古论今、臧否人物，毫无顾忌。我们是老小无猜。当年在杨先生家，我曾和杨先生论过年齿，我和她都属羊，她比我大了四轮。但我还是没好意思跟她撒娇。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去他们家，都有“借口”，比如组稿、谈稿。杨先生大概有时候也用“借口”。她喜欢用《钟山》的稿纸，有时打电话给我：梦玮，稿纸用完了。于是我去府上送稿纸。后来，当然就不需要借口了，想去就去了。我喜欢待在那样的氛围里。

再后来，我就很少去了。信息社会来了，我知道很多人去了杨苡先生家，杨先生已经活成了人瑞，看望杨苡老师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有些人把杨先生家当成了网红打卡地，发朋友圈。有些人甚至是带着记者、摄像机去的，以看望老作家的名义。这好像有违做客之道，杨先生当然完全不需要报道。我不想做这样的客人。我总想着：等大家消停了，我再去不迟。但我没能多提醒自己：杨先生再长寿，总是要走的。先是赵瑞蕻先生走了，杨先生活到104岁，突然之间也走了，永远地走了。

再也没有机会去杨先生家做客。据说杨先生立了遗嘱，把她的房子捐了出来，现在是一公益文学机构。最近我本想去看看，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想体验物是人非的感觉，徒增伤悲。我突然想到，我居然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客人，只想留下我想要的那部分：我在杨家客厅体验到的美好氛围，天底下最难得的可亲可敬可爱，宾主在一块儿的老小无猜。我要让那样的时空永远静止。说起来好像有情有义，实则无情而自私。管他们那些各怀心思的客人，我本可以早点儿去看杨先生。我太顾及一己之感觉，我甚至没有考虑到主人的感受。因为自私，终成永远的

错过。我有时翻到杨先生的照片，眼泪不由自主就流下来。我特别想念她。

到贾平凹先生的工作室做客，是另一种风格，别一样的体验。记得我第一次到贾平凹先生的工作室，南京贾氏去看望西京的本家，就我们两个坐着聊天。一会儿，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梦玮，我给你吃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呢。我问：您有什么嘛？他走到一个大瓮前，揭开盖子，酒香扑鼻，原来是一缸酒！我说：那就这个嘛。于是，他找来两只海碗，用酒端子打上来酒，分别注满。我和他坐在长条凳上，对着两只酒碗，一边喝一边聊。他幽幽地说：“我父亲走得早，喜欢喝酒，但我那时候没钱给他买酒，现在……”我的一碗酒喝完了，他的才下去一点点，原来他并不爱酒。他之所以存下一缸酒，是怀念、安慰，也是纪念一种无奈的错过。

我多次跑到他那儿去，如果没其他人，他会在楼下请我吃我喜欢的羊肉泡馍，有时候也会呷几口酒。我如果没时间在他那儿吃饭，他会拉开我行李箱的拉链，往里面塞两瓶酒，说：那你带在路上喝。

有人说，人类世俗化是大趋势。我想：即使是请客，只要情义还在、只要还有人讲情义，世俗化也不可能变成没脸没皮的彻底的功利主义。无论请客、待客、做客，只要有心，就可以少一点世态炎凉。人到世上走一遭，不过就是做客一回。人世大家庭，坐的是同一张桌子。

红尘万丈，少酒薄乐。

贾梦玮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钟山》杂志主编。

## 在蒲黄榆见汪曾祺先生

### III 胡丹娃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我在百度百科查“蒲黄榆”三个字，想看看这个地名有什么典故，读到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蒲黄榆是北京地名，位于北京南城。早些年，蒲黄榆是一个典型的劳动人民集中的地方，没有什么有钱人和有名的人。只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作家。说到汪曾祺，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他写的《芦荡火种》应该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剧后来成为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

我静静地品“蒲黄榆”这个名字，发现它和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一样静谧，树影婆娑中见着四方食事、人间烟火，有着最本真的生活气息，如同汪曾祺先生一以贯之的文风。这三个字把我带回到20世纪90年代。

1993年8月，《钟山》杂志在北京召开文学颁奖会。我当时正借在《钟山》，参与了颁奖会的一些工作。会前，我们一行人跟随《钟山》时任主编刘坪先生去蒲黄榆拜访汪曾祺先生，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走到汪曾祺先生所住的塔楼时忽然就安静下来。随着他的房门打开，大家的笑声

复又响起。当时的汪曾祺先生，其影响力早已越过《芦荡火种》《沙家浜》，尽管见到他时，耳边会第一时间响起样板戏中耳熟能详的唱词。他是江苏高邮人，说话几乎没有口音，在我听来还带着一点京腔，嗓音似有共鸣，似乎马上就能来上一段“西皮导板”。他又是作家汪曾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是1978年1月创刊的《钟山》杂志的老作者。

汪曾祺先生的家不大，有着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意趣。一屋子的人说说笑笑，说的都是好玩的事，这天汪曾祺先生的夫人施松卿也在场，屋子里的气氛格外温馨。我在这样的场合有点过于安静，反倒有机会感受了汪曾祺先生。我所看到的汪曾祺是一个这样的人：心地善良，性情平和，却颇有原则性，那原则性通过他与周围人的谈话可以感觉到。我想，以后我要约他写稿，但他言语间透出的原则性又使我产生几分敬畏。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向他开口，不知他会不会给我这个小编写稿？

那天的拜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颁奖会在新华社召开，来的都是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我忙于会务，没有再见到汪曾祺先生。

不久，我为《钟山》主持一个散文栏目《大家小品》。我向汪曾祺先生约稿，他很快寄来了。我好高兴，但我知道，汪曾祺先生有一多半是冲着《钟山》来的，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我却得寸进尺，想向他再约一篇，给我那编制所在的刊物。我那供职单位是一份综合性的老年刊物，先生能看得上吗？

转眼过去一年多，1994年10月，我又去了北京。这时我已经回到原单位，是去北京组稿。想要曾祺先生的文，心中却几分怯怯。有一天，我去作家何志云先生家取稿，他知晓我的愿望后，立刻拿起电话来给汪曾祺先生去了一个电话，替我约好了上门的时间。于是，我又来到了蒲黄榆。

高高的塔楼，依然那般，让人到了跟前就想放轻脚步。

汪曾祺先生似乎已经不记得我了，但他记得《钟山》向他约“大家小品”。知道我就是那个向他约“大家小品”的人后，他点了点头。这时的我已经离开了《钟山》，如此变来变去向人约稿是最不方便的，汪曾祺先生却丝毫没有显示出哪怕是一点点不理解，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倒是我自己忍不住自嘲了两句，记不清我说了什么，先生那善良平和的注目与微笑，让我心中顿生安慰。那天，他送了我他的新出版的散文自选集《草花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

没有拍照，没有合影，唯一留下的是汪曾祺先生的手迹——“丹娃留存，1994年10月”。

那次回宁不久，我收到了汪曾祺先生寄来的稿，别提有多高兴了。而今回忆他两次写的稿，我竟一点记不起它们的标题了，只记得标题下的三个字：汪曾祺。它们应该已经收入他的作品集，可我最想做的事是找出当年刊物的年度合订本，在上面重温他的文字。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知道了他为什么那



《草花集》书影

样善良平和。先生崇尚的是冲和淡泊，这样的人发得出一种微笑，写得出抒情人道主义的美文。先生欣赏偶然之美，他在散文《琥珀》中写道：“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我十分喜欢他的这句话。写这篇文章期间，我看了纪录片《汪曾祺》，感叹先生的一生什么事都经历了。回味他的作品，我发现他将所有的不幸都化作了偶然。

他把每一个偶然都看作生活的馈赠。

今天，汪曾祺已成为被中国普通百姓提及最多、阅读最广泛的作家之一，人们念及他就好像念及自己平凡而宝贵的生活。“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人们愿意相信网络上这句被提及频率甚高的金句出自汪曾祺先生的笔下。认真读汪曾祺先生的纸书作品，会发现他的作品更以历史感、责任感、情感容量、信息含量和知识性而呈现一种聚合之美，这种聚合之美通过他闪烁着母语光华的语言表现出来。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耐烦”精神，这正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先生沈从文传授给他的做人做事的精神。“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汪曾祺先生这样解释（见汪曾祺《草

花集》)。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会看到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怎样渗透在他笔下的万物之中，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食一味，直至书页上的每一个方寸，方寸中每一种生物的呼吸方式，而他所投注的目光才是穿透人间万物的魔法之光。

写到这里，我再看“蒲黄榆”这三个字，似也有了一种藏而不露的意趣。

我与汪曾祺先生的两次见面，多少也带着一点偶然，这偶然又连着别个偶然，如人间草木，发芽是必然。汪曾祺先生过世后的某一年，我偶然进入了一个叫“汪迷部落”的博客空间，由着进入这个部落的偶然，认识了汪曾祺先生的内侄、归国华侨、上海外国语大学离休干部施行先生，后来又与施行先生成了微信朋友圈的好友。几年来，我与施行老一直未曾谋面，但我始终能感觉到他对汪曾祺先生的大爱。他创办了一份微周刊，取名《东方人文微杂志》，几乎每新出一期，他都要给我发来一份。施行老离休后曾在上外教育出版社担任过特约编辑，办刊物编杂志驾轻就熟。我在他创办的微杂志上读到他撰写的许多美文，其中有不少汪曾祺先生和夫人施松卿的故事，这些故事比之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更加生动，有些可以说是鲜为人知。施行老晚年将推介汪曾祺的作品作为己任，他编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学术工具书《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这部词典为读者提供了近距离了解汪曾祺人生轨迹和研究汪曾祺及其作品的便利，涵盖了汪曾祺作品小说、散文、戏曲、书信的主要内容，还有施行老本人对汪曾祺作品中重要的文学人物和典故的精辟介绍，包括《汪曾祺全集》中关于汪曾祺文艺创作、作家修养、语言研究等方面的重要引言，是一部研究汪曾祺作品的优秀工具书。施行老还有重要的编著《汪

曾祺诗歌》，诗篇里住着一位亦古亦今、别样柔肠的汪曾祺。

“‘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边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这首汪曾祺散文《师恩母爱——怀念王文英老师》中的题诗令我读来分外动容。王老师看到小汪曾祺手臂上戴着母亲的孝，特别心疼他，因而对他像母亲一样，这份爱被汪曾祺记了一辈子。这首诗也收入了《汪曾祺诗歌》。

汪曾祺先生是1997年去世的，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当年带我去见汪曾祺先生的刘坪先生也已经走了多年。去年岁末，施行老也走了。往事点点，怀念深深，写下这段文字，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胡丹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散文多种。

## 吾友海歌

III 周世青



《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卷二)书影

### 书缘缔金兰

海歌与我同姓，三百年前或为一家。他小我三岁，我们是挚友，这份深厚情谊，始于共同策划、编撰图书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南师大政教系毕业，先在南京铁路中学教了八年的高中政治，后调入铁路分局教育主管部门从事教研与管理。自1990年起，我应省内多家出版社之邀，经常参与编写中小學生思想教育读物。

与时任江苏美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周海歌首次合作是在2003年。我们共同策划编撰的第一本书，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永结同心——领袖和人民心连心》。此后，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编写的《小平您好》，以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民族的胜利》，相继问世，反响不俗。其中，《小平您好》荣登2004年全国少儿类十大畅销书榜单。

2005年11月的一个午后，海歌步履匆匆来到我家，告知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将随“神六”事迹报告团来苏。省委宣传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nd 凤凰传媒集团拟共同编写《飞向太空——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一书，作为全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读物和赠予航天员的

礼物之一，并邀我担任总撰稿。起初我因航天知识匮乏而犹豫，但想到与海歌合作，便有了信心。当夜，海歌办公室的案头灯火长明，我们彻夜运思，一致认为全书应坚持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交融，文字力求精准、优美、简练，并敲定了全书的灵魂、骨架和血肉。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决定先述“船”（神舟六号飞船），次溯“史”（从远古梦想到新中国航天史），再聚焦于“人”（中国航天人及江苏儿女的贡献），以《“神六”巡天河》《飞天美梦圆》《热血铸丰碑》三个篇章勾勒出华夏问天的时代史诗。紧接着，我带领两个年轻人，连霄鏖战，书稿一气呵成。该书甫一上市，便洛阳纸贵，样书亦被友人索要一空。12月中旬，“神六”报告团抵苏，海歌参与接待。事后他向我描绘盛况，其中江苏骄子费俊龙在书上欣然签名，与海歌愉悦交谈的影像，深深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经过多次的编书实践，我们深切地感悟到，以图书滋养青少年心灵，陪伴他们的成长是一项宏大精微的系统工程。由此，构建一个涵盖重大纪念活动专题教育和常规节点教育两大脉络的完整书系的构想悄然萌生，恰逢其时，社里主要领导亦有此意。2005年盛夏，在湖南路与云南路交会处的凤凰台饭店，我和海歌连续奋战两昼

夜。第三日凌晨，窗外星辰渐隐、东方既白之际，我们不仅孕育出“祖国在我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书系”的雏形，还完成了未来五年七本重大纪念图书的筋骨与魂魄。当最后一个字符落定，推窗望去，紫金山麓已勾勒出晨曦的淡影。方案经反复淬炼定稿，上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荣列《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子规划“未成年人读物出版规划”之首项。五年后，《中国新闻出版报》刊发总署出版管理司的署名文章，总结“十一五”国家重大出版成果，“祖国在我心”系列图书赫然在列，备受嘉许：“江苏美术出版社的《祖国在我心》，通过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其内容生动、通俗易懂，符合青少年的阅读特点。”书系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作为最初的拓荒者与主要策划者，海歌与我，心中唯有沉甸甸的欣慰。

### 丹心绘宏图

海歌乃金陵之子，自幼六朝文脉滋养其心。恢复高考时，已在工厂当了三年钳工的他选择报考美术专业。那个年代，美术院校寥若晨星，能“金榜题名”者更是凤毛麟角。1979年，海歌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今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系。1983年毕业，他先赴徐州玻璃厂从事产品设计两载，后调入江苏省新闻出版学校执教十年。

从出版学校调入出版社，海歌踏上了全新舞台。几年后人事更迭，海歌“一肩挑”起社长、总编的重担。

忆及初掌社印之时，海歌感慨良多，新阶段江苏美术出版社如何破浪扬帆？海歌的思虑既高远又务实。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提出的“四院两馆”的战略宏图(美院、画院、博物院、研究

院、美术馆、纪念馆，并延伸至宣传、教育、档案、党史、地方志等党政相关部门)，旨在突破单纯美术领域，向文博、大艺术及相关社会领域纵深拓展。其核心是为这些文化重镇搭建优质平台，提供最佳服务，深挖其作者、文物、成果之富矿，转化为传世出版物，进而升华其教育、展示、弘扬、研究功能，实现从“立足专业做出版”到“立足出版做专业”的华丽转身。此外，他在凝聚新一届社委会成员、大胆擢拔青年才俊方面，亦建树斐然。在2010年至2012年海歌担任社长、总编期间，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美术类出版社综合实力榜首，海歌个人也荣膺“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金牛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

虽身居社长高位，海歌从未脱离编辑一线，始终保持着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这在他责编并荣膺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巨著《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书以全新视角审视华夏古器，通过精湛的个案研究，熔古典匠心与现代设计理念于一炉，旨在构筑当代中国特色的设计艺术与教育体系。为使这部大16开艺术专著臻于至美，海歌在整体气韵、插图运用、色彩调配和纸张甄选等环节，无不精益求精。付梓前夕，为一处图标数字的色彩毫厘之差，他那揉不得一粒沙子的眼睛近乎“返工”般逐页检视，务求完美无瑕。书法大家孙晓云的《书法有法》自第五版起由江苏美术出版社承印。有次她在家中和我谈到，对海歌编辑《书法有法》的工作，尤其是宣传策划上的鼎力相助深表谢忱。修订版后记中那句肺腑之言：“我要感谢周海歌社长，他自上任就对《书法有法》鼎力支持，让我感到还是家乡好”，便是明证。海歌亦曾向我提及，为使作者签名效果至臻，连扉页用纸的肌理与吸墨性，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

## 十指奏华章

编辑常被视为“为他人作嫁衣”，而海歌视此过程为汲取、研究与升华的契机。他笃信，美术编辑首先应是美术家，当拥有自己丰饶多彩的艺术世界。他早年大学专攻陶瓷艺术，后广涉水彩、油画、水墨。在油、水、彩、墨的交融中探求意象万千的绘画境界，是他数十年不渝的求索。

2013年4月底，我去省出版大厦办事，顺道至7楼看望海歌。这或许是我唯一一次造访他社长兼总编的办公室。他刚从京华办展归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开幕式业界大咖云集，时任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先生亦亲临嘉勉。海歌踌躇满志地说，下次要争取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果然，在2016年，他年届花甲之春，夙愿得偿，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名为“超以象外”的个人艺术展。展览以海歌近年创作的水墨作品为主，兼及部分油画、水彩与陶艺。其水墨秉承“借古开今”之念，在西画写实的根基上，融贯中国画写意精神，以独特的水墨语汇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审美享受。同时，还在拓展水墨视觉印象的疆域上进行了大胆探索。

海歌拥有诸多头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陶艺委主任、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当尘嚣落定万籁俱寂的夤夜，海歌沉浸于水墨天地，孜孜以求的是那份内心的丰盈与精神的逍遥。在颇为自得的一幅水墨上，他题有自作诗：“笔含水方润，墨落气韵生。随心挥洒处，自然得精神。”诗如其人，画如其心，这正是他水墨人生的写照。

解甲归田后的海歌，从未停下在艺术丛林中的跋涉。除了在水墨天地继续深耕，他始终铭记四十余年前初入大学时振兴中华陶瓷艺术的初

心。近几年，作为江苏省美协陶瓷艺术领域的领军人，他参与组织、策划了多次全国性陶艺大展，促成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协陶艺委与凤凰集团的战略联姻，推动了出版社与母校陶瓷大学的深度合作。

谈及振兴传统陶瓷艺术，海歌最津津乐道的是“夏都陶”。山西运城乃中华古文明曙光之地，夏县更是夏朝立都之所，华夏滥觞。2018年，应夏县县委县政府之邀，海歌携两位陶大校友赴夏县考察。他们惊叹于：东下冯遗址出土的最早青瓷，穿越四千二百年时空；西阴村遗址留存着丰富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片，诉说着远古的辉煌。为再现这熔铸远古神韵与现代精神的“夏都陶”，他欣然受聘为夏都陶文化研究院院长，与团队在设计、塑形、釉色及窑火淬炼中倾注心血，终令沉寂千年的古夏陶魂浴火重生。夏都陶作品初步形成了以夏文化为根骨、融入当代创新理念的艺术风貌。在不久前举办的一次国际精品陶瓷展上，夏都陶一举摘得“大地杯”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金奖。我曾见到过海歌设计的夏都陶作品：壶身与杯身取形于西阴出土的蚕茧，壶钮、壶嘴、壶把及杯盖、杯把则巧化卧蚕与桑枝叶之态，古朴中见灵动，典雅中蕴生机，深得我心。海歌却谦逊道：“此仅发轫之始，重燃古夏陶窑火、传承薪火之路，道阻且长。”

在江苏美术界、出版界的星空里，海歌曾被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先生誉为“弹钢琴的高手”。诚哉斯言！长久以来，海歌在艺术创作（水墨、陶艺）、美术编辑、理论探索与行政管理诸领域齐头并进，宛若一位技艺超绝的钢琴大师，十指在黑白键上从容游走，奏响和谐而华美的生命交响。

周世青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 阳光普照

III 黄蓓佳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何等激荡、澎湃、兴奋和期盼交织的十年。那个时候，互联网开始织入千家万户，高速公路一条又一条运行通车，农村扶贫减税，城市改善住房，中国加入世贸，工厂机器日夜轰鸣，海量的“中国制造”流向欧洲美洲，国人有机会跟随自己引以为豪的日用产品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东张西望。那个时候，感觉太阳每天都是崭新的，生活中有无数的惊奇和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和尝试。

那个时段，我刚买下了城郊边上的一个新建小区住房(因为房价相对便宜)，房子是期房，付首期款的时候小区还是脚手架林立的脏乱工地，因为激动和兴奋，总是忍不住一趟趟地跑去工地看建房过程，从高楼封顶，到小区绿化，到拆除围挡，看一趟，心里就欢喜一遍。有点像小孩子，买样玩具，撕包装，开纸盒，直到真容露出的那一刻。快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常跑建筑工地，心理上，跟建设高楼的含辛茹苦默默干活儿的农民工们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夜幕降临晚风吹拂时，我特别喜欢看他们三三两两坐在砖瓦堆里享受晚餐的场景。一张小小的方桌，几只矮矮的小凳，桌上一瓶啤酒，

一盘猪头肉，间或添个小炒，然后是堆尖的米饭和下饭菜。方桌边对坐的，或是夫妻，或是父子，或是工友。

我很少在工地上看到孩子。孩子在老家，或者带出来了，安置在某处“城中村”里。为了孩子读书上学有个好的前程，父母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可我是为孩子写故事的人，我又特别关注孩子，看着这些面容沧桑的父母，我心里忍不住会想，此时此刻，他们的孩子会在做什么？他们能否理解父母的辛劳？到他们长大之后，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两辈人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命运？就这样，2011年，我写了一本《余宝的世界》，写一个进城务工当卡车司机的爸爸，做钟点工的妈妈，早早独立挣钱的姐姐余香和余朵，在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聪明还带点异秉的弟弟余宝，这一家人生活在城市隙缝中的故事。

那个年代，经济高速运转，整个世界都在飞速膨胀，人类前景呈现出无比的美妙，而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轰隆隆向前的车轮之下，会不会甩掉了一部分不该甩掉的人？这些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全部生命的农民工们，他们的孩子有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能不能理所当然地融入城市，

去为他们的父母实现梦想？

眨眼之间，又是十年过去，嘈杂的世界沉寂下来，科技进化到AI时代，连购物都由线下改到了线上。走出家门，再也看不到十年前遍地工地、尘土飞扬的样子，不见了农民工下班后的自在小酌和他们的妻子围住水龙头濯衣洗菜时灿烂的笑容。当年的农民工们老了，我也老了，但是我仍然惦记当年的“余宝”兄弟们，希望他们安好，希望他们体面和自在，有小酒喝，有闲钱花，有能力教育和培养他们下一代的孩子。

2021年，我跟随南京的一个支教团队去到陕西商洛，在偏僻的大山深处，看到了当地孩子们读书的场景，看到山村最好的建筑就是那些村小，看到无数的乡村教师坚守乡村学校教书育人的瘦弱身影。那一趟支教之旅，当我们坐在操场槐树下，食堂井栏边，散发出泥土气息的简陋教室里，很多泪目的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出窍和飞升，盘旋不肯离去。我又一次有了写一写乡村教育的念头。

是巧合，也是因为有心，回南京不久，我在手机上读到一篇很棒的人物专访：《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文章说的是十年前，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北京有一群雄心勃勃的教育工作者做过一个叫做“青云学子计划”的教育实验，从当年全市六十万打工子弟中挑选出最聪明的一批孩子，所谓的“超常儿童”“少年天才”，试图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因材施教的教育，让他们不浪费天分，不从体制教育中滑落，最后能够跨越父辈的阶层，走向一个更理想更广阔的天地。实验是小规模的，种种不确定的原因也让实验没有最终完成。这不是一个童话般的完美故事。但是参加实验的几年之中，这一小群流动儿童经历着内心世界的困惑和探索，经历了彼此的陪伴和激励，他们人生中的很多东西终归是被改变



《上铺的兄弟》书影

了。

想把一个人从原生的土壤中连根拔起是有多么的难啊。

这篇人物专访吻合我的口味，引出了我的很多想法。前面说过，十年之前，我经常盘桓在各地建筑工地时，已经对这个进城务工农民子弟的庞大群体有过很多的关注、打量 and 想象。他们的父辈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作出极大贡献的人，他们的孩子们理应被城市接纳和照顾。更何况我出身于一个小城教师家庭，天生对“教育”这个话题有感觉。这样，我开始动笔，写下这本《上铺的兄弟》。

从商业角度考虑，这个书名真不算好，不吸睛，也不够儿童化，但是我找不到更恰切的表达。我把我最多的爱和关切投射到这本书上，写到结尾时，我自己鼻子酸涩，五味杂陈，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还有一点幸福，难受和幸福交缠，好几天都不能平息。所以，我不想用一个小机灵的或者是不庄重的书名。

故事的开头放在2000年新世纪开始的前夜。元旦倒计时零点，一个激荡又充满希望的时代开启。钟声荡漾，鞭炮声大作，烟花此起彼落，争奇斗艳，整个天空整个世界，流光溢彩，灿烂辉煌，奇妙到如同魔幻。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就在这个寒冷又奇妙的夜晚，被一个小吃店的沉重门帘掀开，像烟花升上天空又洒落大地，覆盖了每一个人朴素的梦境一样，降临在这群流动儿童的身边。孩子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几个人：梅所长，杜老师，荣伯，石磊，他们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猝不及防闯入孩子们的生活，又蛮横有力地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轨迹。落笔必须在这个时间点。有希望有憧憬的年代，才能让一群有理想的老师们做出石破天惊又匪夷所思的大事，勇敢的大事。

故事发生的地点，我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北京。又因为作品中写的是一件小概率、非主流的事件，所以放在北京郊区一处极不起眼的拆迁工地。北京是首都，小说内容是一场教育实验，首善之地和教育革新这事儿天生匹配，如果背景不放在北京，我都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更加合适。

小说中，一群智力超常的流动儿童：邹亮、石磊、李雯、那月、张小木……被梅所长和杜老

师们从一个个民工子弟学校中挑选出来，集合在京郊一处被遗弃的破旧工房，开始了他们决绝又悲壮的成长历程。长达三年的漫长时光里，他们被教育，被鼓舞，被热心教育的企业家资助，破土向上，努力地冲向天际。在这个友善的集体当中，他们终于成长为有着相似人生观的人，他们共享对世界的判断，调和彼此的心性喜好，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这是教育在精神层面上的成功。

2022年写完这部小说，我一直放在电脑里捂着。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总想捂一下，沉淀一下，再作修改。2024年，在我的科幻小说《黎明动物园》和《极地穿梭》出版之后，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打开书稿，阅读，修改，再小心翼翼交付出去。跟之前两部科幻小说的热烈和奇幻相比，我心里我更满意这本《上铺的兄弟》，这是一本需要沉下心来阅读的书，也是我在情感投射上很用了力气的书，交出手的一刹那，我心里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和怅然。

是为记。

黄蓓佳 著名作家，曾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 墨痕寄沧海 片纸映晚清

——读《片墨寄沧海：晚清明信片绘事》

||| 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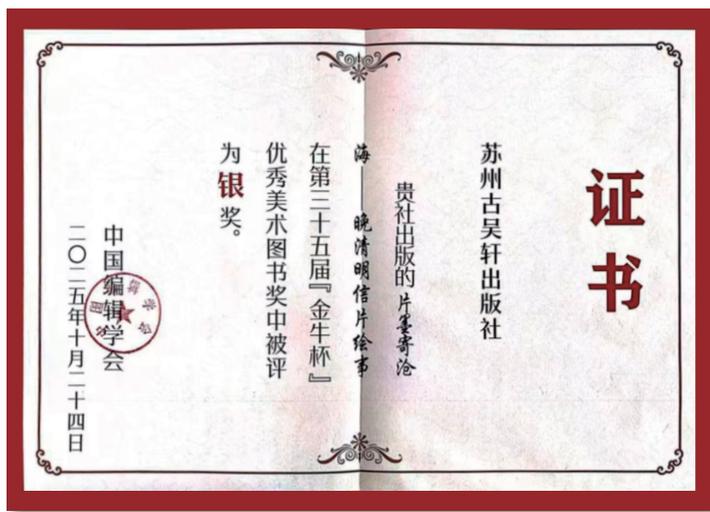
初见《片墨寄沧海：晚清明信片绘事》(宋琛、宋欣樾编著，古吴轩出版社)，便被其厚重的体量所震撼。近900页的篇幅，辅以精良的装帧、全彩的印刷和便于翻阅的线装设计，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预示着内容的丰沛。果然，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沉浸其中，愉快地完成了这场跨越百年的阅读之旅。这部书，正是对晚清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遗珠的系统性打捞与呈现。

这部书堪称“出手不凡”。出版仅半年，便斩获两项颇具分量的大奖：在汇集了十一个省份94部展品的江苏省专项集邮展览中一举夺得金奖；又在第35届“金牛杯”评选中荣获“优秀美术图书”银奖。这两个奖项，一个肯定其在邮政史料领域的价值，一个彰显其在美术出版界的地位，从不同侧面印证了这本书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也让人体会到作者为此付出的艰辛与心血是完全值得的。

### 时代之变：从“黑便士”到“清一次片”

晚清，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充满了屈辱与抗争、迷惘与探索。明信片的出现，正是这一大变局在邮政领域的直接体现。在世界上第一张邮票“黑便士”诞生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才在1878年由海关发行了“大龙邮票”；又过了18年，即1896年，大清邮政官局才正式开办。也正是在这一年，清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开始筹备邮资明信片的发行。1897年10月1日，清代第一版邮资明信片(简称“清一次片”)正式启用。

然而，在那个时代，写信尚属奢侈，加之国人根深蒂固的隐私观念，明信片这种公开的通信方式并未引起普遍兴趣，一度备受冷落。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由官方发行的明信片，其“好”最终被独具慧眼的民间艺术家所发现。正



如作者所描绘：“当你凑近观察，用手轻抚之，能感受到纸面如细腻肌肤般的触感，表面细小的纸质纤维犹如芦苇的绒毛般自然。”这种质地柔和的纸张，极适合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挥洒。在“清一次片”发行不久，就出现了手绘明信片，作者收藏的绘画时间最早、邮路完整的一张手绘明信片，是画在德国的空白邮资明信片上的《行医图》，于1897年11月13日寄出，12月24日抵达目的地德国海德堡。非常凑巧的是，有一张画在“清一次片”上的手绘明信片，也是在同一天抵达德国汉堡，这一张画的是《理发图》。这两张手绘片，无疑是最早的手绘片，同样都是用写实的手法，一是行医、一是理发，画家显得成竹在胸，把当时各色人等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是异国人士所感兴趣的。

民间艺术家们对明信片进行的二次创作，使之成为可以出售的艺术品。这对于来华的外交官、商人、军人、旅行者和传教士而言，无疑是意外之喜。购买手绘明信片，或用中外明信片进行“定制”，一时成为风尚。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和民间艺人的市场意识，形成了一种双向奔赴，

成就了晚清时期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

### 慧眼识珠：文化世家的十六载坚守

作者宋琛出身于著名的文化世家，祖父宋文治先生和父亲宋玉麟先生都是知名画家、收藏家、鉴定家。与前辈专注于传统书画不同，宋琛的文化视野更为多元。他自小受到熏陶，喜欢集邮，从中得到乐趣和知识，当他偶然接触到晚清手绘明信片时，被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所深深吸引，他说：“那历经百年岁月形成的微微泛黄，以及斑驳褪色的字迹，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温度，仿佛被时光的暖阳温柔烘烤过，透出独特的历史芬芳。这种含蓄而深沉的历史质感，令无数收藏者心醉神迷，我也不例外，在惊喜之余开始四处搜寻。”

正是这份心醉神迷，让他在接下来的16年里，于海内外广为搜寻，悉心研究，辨析真伪。根据作者研究，从第一张手绘明信片1897年出现(实寄)到1915年退出，手绘明信片存在的时间也就短短18年。而宋琛却用了几乎同样长的时

间去追寻这段短暂的历史。后来，他的女儿宋欣樾也加入其中，以其英语专长一起收集、整理与研究，父女二人共同成就了这部收录近600张珍贵图片、厚达6厘米的皇皇巨著，成为文化世家接续前行的一个范例。

这份对冷门、小众文化遗产的热爱，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兴趣，成为一种深沉的文化担当。作者将自己的珍藏整理成书，不仅是为这一收藏门类提供了实用的参考指南，更是在为这些被遗忘的文化瑰宝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价值。

### 包罗万象：一幅别样的晚清社会风情画卷

通过图像解读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历来是西方世界的一大兴趣。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以托马斯·阿罗姆为代表的欧洲画家，通过版画等形式向西方描绘了东方帝国，郎世宁等传教士也有他们眼中的中国图像，然而，这些作品多是西方视角的观察与再现。相比之下，晚清民间艺术家创作的手绘明信片，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动与鲜活。它们更具民族特征和民间创造力，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烟火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晚清社会的独特窗口。

翻开此书，宛如步入一条晚清社会的历史长廊，千姿百态，目不暇接。作者的收藏极具系统性与学术性，内容包罗万象：

- 文化经典的再现：书中描绘了几十出传统戏曲，如《四郎探母》《贵妃醉酒》《西厢记》《白蛇传》《苏武牧羊》《哪吒闹海》等；也呈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甚至《金瓶梅》等文学名著的经典场景。

- 社会生活的画卷：从官场百态到市井风情，从妇人生活到儿童嬉戏，从街头杂耍到拜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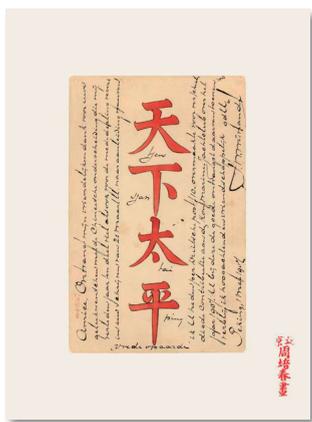
德国邮资明信片，中医问诊把脉图



《西厢记》选段(“清四次片”)

祈福，从日常劳作到休闲娱乐，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许多不同地区民情民俗的精彩画作，诙谐有趣，其中有的是已经失传的民间技艺。

- 时代变迁的缩影：更令人惊喜的是，书中还捕捉到了现代科技与新生活方式的初现，如女子读书、骑自行车、打台球、乘坐人力车、使用



“天下太平”明信片正、反面

自来水，甚至电线杆与电灯的身影。这些题材源于生活，是晚清社会风貌最直接、最真实的映射。

从手绘明信片这样的“入口”，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间百态，也是以小见大历史观的一个典型例子。

### 匠心独运：方寸之间的艺术价值

晚清手绘明信片得到重视，除了它独特的社会价值以外，还和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相关。手绘明信片是用中国传统艺术手工所画，是具有唯一性的艺术品。我忽然想起，新中国建立初期和特殊年代里，曾经也有非常有名的画家去画一些工艺画，主要用于出口赚取外汇，手绘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作者以对中国绘画的专业眼光，对手绘作品进行了精到的介绍，充分肯定了它们的艺术价值。作者研究了不同地区画家的不同风格，有的工细严谨，有的奔放野逸；色彩上，有的明艳夺目，有的淡雅宜人。天津画家的作品保留了杨柳青年画的韵味，汕头画家则巧妙汲取了西洋技法。在有限的尺幅里，展现了高超的绘画技巧。正是这些色彩斑斓的作品，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鲜活，从而产生强烈的兴趣。这里有一位寄信人不可抑制的兴奋，急切地向对方传递他的喜欢：“亲爱的女士，我给你寄了一些中国明信片，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它们是我向一位中国艺术家定制的，非常原创，反映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时为1903年7月29日的北京。这张手绘片画的是两位女子带着一个小孩在山崖采花的场景，女子体态婀娜，动作优雅，孩子则稚气可爱，整个画面色彩鲜艳，是生活和艺术的和谐呈现。

这些手绘明信片的作者，大都是民间艺人，加上并不署名，其姓名身世无法考证。在仅有可考的人中间，有一位北京的周培春。书中有作者悉心收藏的几十张周培春的作品，十分珍稀。周培春是一个民俗画家，他画的《清朝文武官员品级图册》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不管是文官武官图，还是民俗套片，周培春的中国画工致中表现出了生动，生活气息更为浓郁，他受到来华的外国人的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一张是周培春用中文书写的美术字“天下太平”的明信片，是作者收藏中的意外之喜，也是全书唯一用中文作为画面的明信片，从寄信者的美好愿望以及用昂贵的挂号信方式等信息，反映出人



清文明信片

们对这种交流方式的珍视，以及手绘明信片作为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 综合价值：作为邮政历史的完整性

作者认为，精美的绘画和完整的邮政史的结合才是一枚完美的手绘明信片，因此在对手绘明信片价值的认知上，既充分肯定其独立的价值，但更多的是彰显其作为邮政历史的综合价值。作者认为，如果仅仅从手绘的艺术看，并不比当时优秀画家的作品好，但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在充满民间风情的画面上，有鲜艳的蟠龙邮票，加上流畅的外文字体、不同的邮戳，甚至是邮票上斑斑驳驳的霉斑，都是历史的沉淀，也会有独特的美感。它们巧妙地让东西方文化不期而遇，读者可以借助明信片上的图案、邮戳、字迹，考察其文化价值和历史隐喻。

在航海时代，一封邮件要寄到国外，耗时长达三四十天，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以后，时间虽然缩短了，但每张手绘明信片跨越时空的情感历程，依然值得珍惜。寄信人在购得或定制了手绘明信片以后，大多选择以平信的方式寄出，也有的以挂号信方式以确保顺利送达者，少

数人因欣赏其绘画精美，会直接携回国外。作者从许多明信片还保存完好的情况，推测应该在运输过程中被放在铁盒里。从现存明信片的四个角都有压痕，表明曾被插入相册精心保存。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明信片还在，证明虽然经过战火兵燹，它们依然被珍藏。我们可以随着一张张实寄明信片，了解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感觉生活的律动、生命的温度。作者宋欣樾说“这些历经数十日远渡重洋，跨越数万千米的明信片，从中国各地寄往欧洲各国，传递着亲情和友情的温暖。每当看到明信片上泛黄的邮票和斑驳的邮戳，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

### 学术担当：创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阐发

这本专著的意义还在于其中的学术担当。收藏和研究是相互促进、互为成就的事业，作者在对每一枚明信片深入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阐发，使其不仅是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也是自成体系，别具一格的一部专著。

作者打破了邮品一般按照题材进行分类的惯例，而是按照地区分类，形成了收藏的体系。

全书分为北京、天津、京津地区、上海、山东、广西、广东、湖南、云南、四川等地区，重点对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地区再进行细分、阐述。实现这个要求，需要收藏数量的支撑，同时需要考证的准确性。比如，作者考证出天津石头门坎振声画店有师徒二人，作者对师傅的画作几近狂热，收藏的第一枚手绘明信片就是出于其手。再如，在确定民间手绘明信片艺术家的所在地时，作者除了对艺术风格作考证，还有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某种艺术风格统一的明信片寄出地的一致。作者据此考证出了天津地区“还有一位卓有成就的以传统戏曲经典场景为创作主题的手绘明信片艺术家”。作者还根据画家的艺术风格，考证出上海有一位“最高产画师”，他的动物画尤为精彩。

作者在本书中的理论阐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代手绘明信片概述”部分，将清代明信片的诞生、清代中国境内的客邮局和手绘明信片的收藏价值娓娓道来，努力厘清晚清的邮政发展脉络。例如，晚清时期，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分别在中国设有客邮局，作者以手绘明信片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也是所谓“治外法权”的一部分，也证明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同时，也以手绘明信片邮寄的过程，肯定了“客邮局”起过的一些作用，并从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清朝邮政的积极变化，证明了融入世界才是最好的出路。

作者认为，通过这些手绘明信片，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点点滴滴，也对画中表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忠孝节义、善奸贤愚等伦理问题引起了共鸣。相对于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的输出就显得不成比例，如果我们把这些虽然微不足道但别有风味的明信片，作为文化交流的一朵浪花，可以看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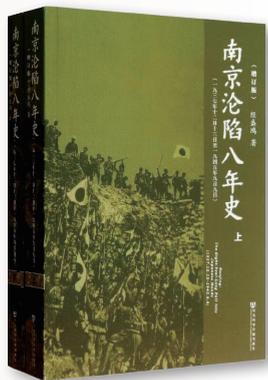
的特殊作用。这样的手绘明信片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它可以寄自云南蒙自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可以寄到遥远的非洲喀麦隆。但丁说过，爱是相互的，这些手绘明信片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象征，在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片墨寄沧海》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佳作。它既是对作者收藏成就的一次梳理与总结，更是对作者收藏理念的一次传播与分享。相信作者这份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与热爱，以及希望将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人的信念，会激起回响，让更多的人共同见证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沙洲 省级机关退休干部，业余写作。

## 以史为鉴，烛照未来

III 李风宇



《南京沦陷八年史》书影

与经盛鸿教授相识，始于2014年《雨花》杂志筹备国家公祭日专刊之时。彼时他已是令我素所景仰的历史学者，我作为《雨花》主编，有幸邀其担任专刊总校阅。初见于编辑部会议室，他衣着朴素目光严谨，全无权威学者的架子，甫一落座，便郑重地询问专刊编辑进展。

此后交往渐多。我常就写作编务请教，他总耐心解答、倾囊相授。我们亦常探讨历史与文学之交汇，他常从历史维度予我新视角。《南京沦陷八年史》自此成为我案头必备，既是处理相关题材之依据，亦是理解那段惨痛岁月的钥匙。岁月流转，该书屡次再版，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日益彰显。作为作家，我深知历史书写之重；作为其挚友，我更明其治学之严、情怀之深。这部逾百万字巨著，凝聚十年心血，翻阅时似听见历史悲鸣，亦见一位学者以良知守护民族记忆的坚执身影。它不仅是南京陷落研究的拓荒之作，更是以实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里程碑。

不久前，经教授来信告知《南京沦陷八年史》增改本已印行。他说：“一座南京城，半部抗战史！南京是中国首都，是遭日军大屠杀之城，沦陷八载，乃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伪中央政

府所在地，亦是中国军民抗战最激烈与受降签字之处！”

在既往抗战叙事中，南京常被“大屠杀六周”的惨痛记忆笼罩，其后八年日占时期则缺乏系统深入之研究。经教授以宏阔历史视野，将研究延伸至1937年12月13日陷落至1945年9月9日受降典礼的完整八年，实现从“事件”到“时期”“惨案”到“统治”的表述转型。

上册聚焦政治、军事与控制机制，下册深入经济、文化、社会与民众生活，以十二章大结构、百万字篇幅，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沦陷城市史。既记述“维新政府”“国民政府”等伪政权运作，亦关注普通市民日常生存——物资配给、人口流动、底层抗争、文化消遣、宗教信仰乃至黑市交易等细节，皆纳入史学视野。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叙事，拓展了对“占领”的理解边界。

经教授极为重视史料全面性与可靠性。为撰此书，他广泛搜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地档案馆原始档案，含日军战报、伪政府公文、外交文书、个人日记与回忆录等。尤值称道的是，大量引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

交史料馆、防卫省研究所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审判记录，交叉运用，增强论述说服力。

此外，经教授尤重口述史与田野调查。他长年走访南京老城区、慰安所旧址、抗日据点、殉难者纪念碑等地，采集濒逝的民间记忆。如利济巷慰安所幸存者证言、浦口战俘营劳工遭遇、西方人士建立安全区细节等，皆在其笔下重焕历史光芒。这种“纸上材料”与“地上调查”结合，体现出现代史学家之实证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本书未止步于暴行控诉，更深入剖析日本殖民统治的运行机制与逻辑。经盛鸿指出，日军在南京的统治，是一套结合极端暴力、体制压迫与文化驯化的复合殖民系统。

军事上，除大规模屠杀外，尚有生化武器试验（如“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强迫劳工制度与系统性暴力（“慰安妇”制度）。书中以确凿证据指出南京地区有四十余处慰安所，详揭其运作内情，直指国家犯罪与战争责任之本质。政治与社会控制方面，作者析论伪政权通过保甲制度、特务统治、户籍管理、通行证制度等手段严密监控市民；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系统掠夺工业资源、农产品及金融资产，致民间经济凋敝、饥荒蔓延。文化上，日伪篡改教科书、推行日语教育、控制新闻出版，企图瓦解市民民族认同与文化自觉。此多层次、系统性批判，彰显作者驾驭复杂历史结构之能力。

面对高压统治，南京市民抵抗从未停止。经教授以相当篇幅忠实记录各类抵抗：知识分子以文化抗争坚守气节（如中央大学教授王澐拒任伪职，绝食而亡）；普通市民冒险救助俘虏、传递情报；甚至出现詹氏兄弟在日本领事馆投毒、日籍士兵秘密出逃等戏剧性事件。

尤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微小却不屈的日常抵抗——商贩暗抬日货价格、教师课堂隐喻民族意

识、艺人借戏曲影射现实……这些琐碎行为，共同构筑一座城市的精神防线。他亦未忽视西方人士的人道贡献，如拉贝、魏特琳所建安全区，经教授以客观笔触保留这段历史中的国际主义微光。

《南京沦陷八年史》不仅树立学术新标杆，亦具深刻现实意义。经盛鸿通过八年长时段考察揭示：南京之创伤远非限于大屠杀六周，而是持续八年的系统灾难；不仅是肉体消灭，更是精神与文化摧残。

在日本右翼仍妄图歪曲、否认侵略历史的今天，这样一部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实证著作，成为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它昭示，历史真相不会褪色，唯诚实面对，方能跨越创伤、走向和解。

此外，本书也为城市史、殖民史、社会记忆研究等领域提供重要参考。它建立起一种“沦陷城市研究”范式，即从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社会结构、文化心态等多重角度，全面分析被占领地区之实态与影响。此法之意义，已远超南京一城、八年一时。

全书结尾，经教授写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和平；我们揭露罪恶，不是为了再次撕裂伤口，而是为了警示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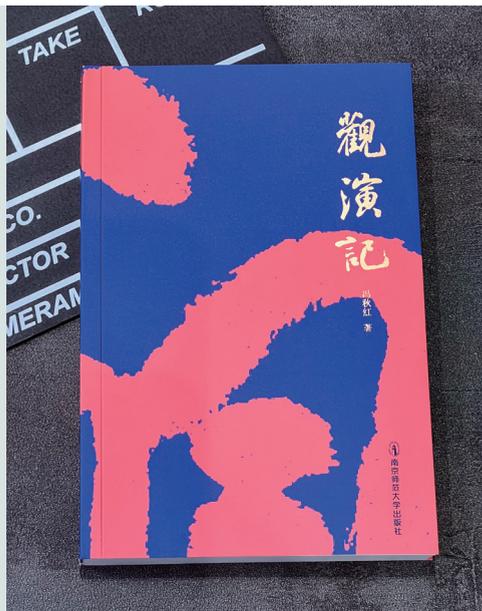
这或许正是历史学者最根本的使命——不在于渲染悲情，而在于传递启示；不在于定格仇恨，而在于照亮未来。《南京沦陷八年史》正是这样一部以沉重历史为材、以理性之光塑形的杰作。

李风宇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文学读评人。

# 在别人的故事里， 读懂自己的生命

## ——《观演记》创作谈

III 冯秋红



《观演记》出版后引发的回响，是我始料未及的。南大学弟葛俊杰以“舞剧之美，话剧之思，音乐剧之魅，戏曲之韵”概括其艺术特质，誉之为“融专业所学、事业所要、个人所长、时代所需、名家所赞、受众所欣于一体的典范”；书法家王学雷肯定“文化需要这样点滴的积累”；评论家方标军为之作序，作家李风宇、雷雨撰文推荐……面对这些厚爱，我深知这本小书的价值不在学识的渊博，而在于它的真诚。若论创作心得，大抵可归结为：积累之功、真诚共鸣、批评勇气，以及最为重要的——生命的融入。

大约2017年，我出任《扬子晚报》文化部主任，得以更系统地观看各类舞台演出。每每散场归来，总习惯提笔记下几句短评，日积月累，便有了今天这本十三万字的小册子。

开篇之作为2019年3月观“皇后乐队”音乐传记电影的感悟。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现场演出，但主唱鲍牙哥的传奇人生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这位音乐巨匠同样难逃被轻视、被抛弃、被疾病折磨的命运，最终因艾滋病引发的支气管肺炎离世，年仅四十五岁。

收官之作则是2025年1月对舞剧《雷雨》与舞蹈专场《春之祭》的评析。这两部江苏出品的原创舞剧，同一天上演，且不约而同地以当代视角重构经典，展现了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

六载春秋，观剧笔记如溪流汇成江河。感谢《扬子晚报》这个平台，让我得以见证中国舞台艺术的繁荣：民国风雅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市井烟火中的曼妙舞姿，再现老上海的风情；话剧《尘埃落定》以宏大的叙事张力，演绎土司文明的末路悲歌；民族舞剧《红楼梦》以出人意料的编舞，完成对经典的当代诠释；《只此青绿》则以极简的宋代美学，传递出道法自然的哲学意境。

也欣喜看到了相当多的江苏本土原创作品，看到了舞台艺术的“江苏力量”。江苏舞台艺术最显著的标签是“三部曲现象”。昆剧现代戏三部曲（《当年梅郎》《眷江城》《瞿秋白》）、淮剧“灵魂三部曲”（《小镇》《小城》《小区》）、锡剧“英雄三部曲”（《董存瑞》《刘胡兰》《英雄儿女》）等系列化创作，既凸显了题材的深度开掘，也形成了品牌化IP矩阵。《观演记》虽不全面，却从部分剧目看出去，打捞出江苏舞台艺术独特的生

命力和青春秘籍。

观剧除了视听享受，最动人的莫过于与人物命运的深度共鸣。有时，我们也会借他人的故事，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看舞剧《李白》，开场便是诗人入狱流放夜郎。剧中那些嘈嘈切切的同人排挤、群臣谗言，何尝不是现实生活的镜像？但历史终将证明，唯有孤独的天才能流芳千古。

观《摇滚莫扎特》，那个身穿红黑蕾丝西服、化着烟熏妆的天才，顽强对抗着命运的不公——才华不被认可、爱情失败、母亲离世……死后却留下未完成的《安魂曲》。

赏《林则徐》，方知这位民族英雄被诬罢官、贬黜伊犁的后半生。剧作塑造出一个既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激情，又具“有可为而不为”的理性的末世文臣形象。

这些流芳千古的人物尚且命运多舛，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又何尝不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劫数？

作为女性，我自然更关注女性的命运。《大唐贵妃的“恋爱脑”》中，杨玉环甘为爱情赴死，可歌可泣却也可叹可怜；《昭君出塞》里，那个克服文化差异、迫于胡俗三嫁的弱女子，两度上书想回汉庭而不得，终在异乡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五岁。

穿梭于这些古今人物的命运之中，我常常黯然落泪。《观演记》里，确实实实在融入了我个人的生命感悟。

当下艺术评论界，批评的缺席已成痼疾。圈子化的互相吹捧、理论的失语与套用，使得那种能够穿透表象的批判性声音日渐稀薄。《观演记》虽是随感，却秉持着批评的勇气。

《魅影续作，狗尾续貂？》一文中，我直言不讳地批评《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剧情狗血，“就像续写《红楼梦》，无论怎么写都难以尽人意”。

《水舞光影打造“大唐追梦”》中，我在肯定技术震撼的同时，也担忧实景演出的投资回报：“步步生莲的美景背后，每一步都是钱钱钱……”

对话剧《飞越疯人院》的改编，我认为“大家都穿着便装，没有疯人院的氛围感”；对昆剧《眷江城》中的记者形象，我指出“服饰打扮很奇怪，在紧张战场上谈情说爱让人辣眼睛”。

有读者笑言“就想看里面的批评”，可见公众需要理解艺术、训练审美、进行深度思考的向导。《观演记》所追求的，正是用鲜活而精准的批评语言，深入解读作品，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产生共鸣。

六年的观演生涯，让我深刻体会到：艺术的终极意义，不在于技巧的炫目，而在于能否触动人心，引发对生命的思考。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创作者生命体验的结晶；而每一次真诚的观演，都是观者与演者灵魂的相遇。

尤其难忘陈佩斯主演的《惊梦》，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挣扎，说不尽的人生悲凉。虽然是喜剧演员主演，且“笑果”不断，但戏剧情节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冲突却是悲剧性的。各种矛盾、痛苦、悲欢、抉择、反转淋漓尽致，真是令人笑中带泪。

《观演记》记录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更是一个观者在他人故事中寻找自我、理解生命的历程。那些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那些让人又笑又哭的时刻，那些引发深思的片段，共同构成了这本书的灵魂。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观演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欣赏艺术，更在理解生命。这或许就是《观演记》最想与读者分享的感悟——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自己的生命；在舞台的方寸之间，见证时代的辽阔。

冯秋红 《扬子晚报》文化融媒中心主任。

## 读《名山诗话》

III 薛金炜



钱振鏞著作书影

常州钱振鏞先生，字梦鲸，号名山。我初知读书时，就见郭绍虞在研究文论诗论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引用名山的诗论，孤陋寡闻的我当时想：此公好大口气，是何许人也？没想到居然是位本乡先贤，不仅道德文章为一时之选，还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家。

名山书法，气足力强，字势开张，这些年陆陆续续看到不少，他的著作却再难见到。这次钱月航老师给我发来电子版的《名山诗话》，才得以先睹为快。名山著述颇富，当自有体系，而我除一《诗话》之外，皆无缘读得，实难以深论。匆匆一过，只是一点初读印象。

### 一

名山文风，一如其书法，也是气足势强。他议论宏阔，思路开张，以正宗儒者自命，却少僵固刻板之病，笔下常常风生水起，墨沈淋漓，而又要言不烦，犀利简洁。下面仅择两个话题以见一斑。

《名山诗话》中，论陶渊明的部分最见深细。“陶诗平淡少激烈之音”，而名山个性强烈，却对陶诗有偏嗜，这是否受到前人如苏东坡等的影响呢？恐怕不是。《诗话》云：

渊明既咏荆轲，又有“饥食首阳薇，

渴饮易水流”句，以伯夷与轲并称矣。东坡乃诋轲为狂生，不与渊明水火乎？如此则和陶可不作矣。

东坡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与渊明异趣，所以，虽写了大批“和陶”诗，适足以“多言惹事”，名山因此对东坡颇不以为然。而名山与陶，却有最相契之点：

陶诗：“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此二语大之可以见道，小之可以论文。上句即《中庸》第一句也。有天在焉，古人安能限我？世人终身学不见道，宜其所得终身在古人脚底下。所以然者，不任真也，任真则见天矣。渊明所以前无古人者，只是一真字。

从陶诗平淡的句子中读出的精彩，正是一个“真”字！名山处处快论，也“只是一真字”！而许多世人“不任真”，不能坦露天性，所以文章只能依傍古人，议论只能跟随流行，做人只能甘做庸人。

渊明诗云：“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又曰：“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非不欲立名者也。乃又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又曰：“千载非所知，聊

以永今朝。”岂其言之不由衷乎？非也。此正是渊明自信千古，故看得名为自家固有，而不甚足奇。譬之大富贵人，看得钱财甚轻，不甚爱惜也。

声名之念，有实有虚。若曰实至名归，则做好一个人，做好每件事，才是思考的重点。追名逐利之徒，大约也并不真考虑什么“身后名”的。渊明之所以反复言之，正是太由衷，而其“衷”又太复杂曲折之故。名山的解读，另生别趣，自有见地。有钱人不以钱为贵，自信有后世声名的人则说“名垂万古知何用”，一无所长的人若自诩什么“淡泊名利”，则很可笑。

后世的赞誉，其实只是出于后人的精神需求，投射到前贤身上而已，这与某一古人具体真实的生命，可以说已经无关。正是在勉励后人的意义上，“身后名”才是真有意义的。

名山与渊明，就这样以写诗和论诗的方式，作心灵的交流，语虽寥寥，却深入人生的重大课题。

名山又以自己的生活对比渊明：

渊明诗虽多言贫，然有如“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抑亦乐矣。《丙辰八月下溪田舍获》一首有云：“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是渊明有佣耕者矣。又云：“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迴。”是下溪田去家甚远，中隔平湖，方知司田寄声之故。由是观之，渊明家产殆不止一处，而经纪亦未为不善也。然且为贫所困，吾辈家无半亩，更复如何？笑笑！

有素心人能赏奇文、析疑义，大是乐事。得一已难矣，况于多乎。末世道德沦丧，文学亦扫地尽矣，南村邻曲，何处得来？因渊明之乐，益见名山之穷。

困穷如渊明，犹有乐境如许。而今在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的现实中，只感到生活的苍白和干枯。

## 二

《名山诗话》平章千古诗人，品评近人、同时代人和友人们的作品，快人快语，干脆爽辣，亦不失隽永。而对于诗文理论的探讨，也时有精论。

“善诗者譬如酿花之蜂，必渣滓尽化，芳润融液，而后贮于脾者皆成蜜。如食叶之蚕，必内养既熟，通身灵莹，而后吐于口者皆成丝。”此吴草庐语也，可谓至精至微矣。虽然，此但言下手工夫耳，非向上语也。夫丝、蜜既成，则实在有物，可以取之无尽矣。而诗则未尝有物也，必天时、人事、风水相遭，灵机偶触，忽然而成。非可探囊取之，刻舟求之也。譬之“李白乘舟”“渭城朝雨”，岂可朝作一篇，暮吟一首，至于无量数乎。予谓好诗在天地间固应有数。虽渊明、太白不能多取，而况于吾侪乎。若正在酿花食叶之时，犹不当以此语告之也。

入手功夫，得踏踏实实，酿花成蜜，食叶化丝，积之充沛，养之淳熟；向上超越，则须天时人事，风水相遭，灵机触动，灵光闪现。必如此才有极品产生，所以顶级作品数量很少，“天地间固应有数，虽渊明太白不能多取”。对于入手功夫与超越境界的区别，作出如此明晰的叙述，恐无过于名山了。

名山论写作的有意和无意状态，颇有意味：

明道《洛园修禊诗》结云：“不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龟山叹其温柔忠厚；

然张旭诗云：“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明道才用旭诗第二句耳。

旭语无心，明道似有意矣。

这是将理学家程明道的诗与诗人张旭之诗对照。理学家写诗，常喜讲道理，诗意已薄。所引程明道的两句，则是因为有意用了张旭的诗意，张是即事，程是模拟，高低立判。

世传吴得臣（佩孚）《黎明渡汉阳》一绝云：“天风送我过江城，万户无声犬不惊。可惜清明平旦气，都从梦里误平生。”胸次不凡。我朝不能得此人，而使曹氏得之，宰相之过也。今日又传其一联云：“马革余生悲日暮，牛衣相对泣天涯。”为之击节。本朝如此好诗不多几句，而竟得之长枪大戟中，号称诗人者能无愧死。沪上有石印得臣画竹，自题一律，末句云：“但凭蒂壮根深固，不怕东瀛起怒涛。”本朝自中兴以来，罕有言御外患者，但能铺张外人德礼刑政不可及而已。得臣能议及此，岂非人杰。

这是武人之诗与“号称诗人者”对比，武人诗，“得之长枪大戟中”，生命体验强烈，有真情实感，初无意写好诗，而自然高妙；“号称诗人者”若对于身在其中的时代无深刻体验，当然逊色。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答云：“某虽无识，亦不至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千古以为绝唱，坡乃以为舛公登溷语。柳为苏秦所轻如此。真正论词，自当以欧苏为宗，缘二公以余事为词，出语自然不同。若一生沾沾于词，必在自《郢》以下矣。

此段是词人与词人较量。宋词豪放、婉约两派高下之争，众说纷纭，亦各取所好而已。名山全不以此为念，另起壁垒：一边是“以余事”为之，一边则是“一生沾沾”于此。本来词只是“诗余”，以余事为之，则可能举重若轻，自然高华；一生沾沾于此，多少受点拘限。此论至少可为崇欧苏一派加分。

魏叔子谓“文中要有黄”，此千古名言。《易》言：“天地之心”，心即黄也。《礼》言：“言有物”，物即黄也。《通书》：“文以载道”，道即黄也。以鸟卵论，有黄则生生不穷。以文章论，有黄则可以使此心此理千古而不朽。伟哉黄之说乎。以诗论，陶渊明诗之有黄者也，唐人学陶者多矣，储、王、孟、韦、柳，其诗固非流俗之诗矣，然以黄论，则犹在若有若无之间，不得与陶并论。彼以陶诗为隐逸之宗者，固未尝以黄论也。

黄之喻，首出于魏叔子（禧），而被名山阐释得淋漓尽致，可作一篇大论之纲领。

唐诗未易作，如旅人诗云：“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送人诗云：“风涛看解缆，云海去愁人。”后人为之必费手脚，非此数字可了。

所引四句唐诗，并非广为传诵的名句，却是精到简洁、真切深感、令人回味的好句，是只有真正的好眼光才会发现其精美的好句。故唐诗不仅“未易作”，也未易读，未易选。

草草读后感，显出我既读得很有兴味，又只是些粗浅理解。今后若能读到名山先生更多的文字，更深入地了解其人其文，或许才能写出更进一层的读书笔记。

## 《海上尘烟》记

III 周矩敏



周矩敏《轮渡》

早在二十年前我就曾经试图去寻找新的能发挥出艺术和技术优势的绘画题材。当时我的民国布衣人物画已经被社会熟悉，成了我个人的绘画风格。持之以恒走所谓“一招鲜”的道路，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条坦途，没有风险。但我似乎心有不甘，总是在我擅长表现的题材中再求突破。所谓变法，就是跳出自己的认知半径，重砌炉灶，寻找形式上的陌生感，在过往经验基础上求顿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儿时的生活记忆又鲜活地呈现出来，那就是——老上海风情。

民国时期的上海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要表现那独特而复杂时期的社会风情，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洋泾浜式的文化状态，信息杂乱无序，没有一条主线。二是如何突破叙事的局限，准确表现出海派文化的独特与唯一性。三是如何把错综复杂的生活元素统一在整体的画面中。

如此，传统的绘画表现手法显露出一定的局

限性，以往的绘画经验也难以充分表现出老上海城市多元魅力与时代精神。探索一种全新的视觉表达方式去创作《海上尘烟》组画，成为我必须面对的一个学术难题。

《海上尘烟》是以非典型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用手卷横展形式，娓娓道来有序推进。《海上尘烟》画面呈现出无序、碎片化、不连贯地流动，时间空间相互交织相叠。类似十九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他首创的“意识流”概念启迪了文学，很好拓宽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把人类意识的流动特性表现得自由自在。我把此理论借鉴于绘画创作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意识流，这一独特的思维模式，宛如一股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打破了现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固有界限。在创作这些描绘上海风情的作品时，我任由思绪如脱缰之马，在历史的记忆碎片与想象的广袤天地中自由驰骋。那些关于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点点滴滴，无论是亲身听闻的



周矩敏《午夜的霓虹灯》

故事，还是历史资料中挖掘出的细节，都如同散落的珍珠，被意识流这根无形的丝线一一串联起来。这种思维方式摒弃了传统绘画中线性叙事与单一视角的束缚，使得不同时间节点、不同空间维度下的人与物，能够在同一画面中交错呈现、相互对话，为观者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画面构图上，我既不采用西方绘画所推崇的焦点透视法，也不拘于传统中国画“三远法”透视。取而代之的，是将大小不一的人物与物件进行自由的交织、重叠。在画面的中心区域虚拟一个视觉场景，或许是十里洋场中热闹非凡的歌舞厅，或许是身着华丽服饰的时髦女郎，或许是缓缓驶来的有轨电车，或许是熙熙攘攘的轮船码头。围绕主场景穿插着各种看起来互不相关的情节，舞池中身姿轻盈灵动的舞女，而舞池边缘，

黄包车夫正拉着车匆匆而过，他那疲惫却坚挺的身影与舞女们的光鲜亮丽形成鲜明对比。不远处，一辆有轨电车沿着轨道缓缓前行，车上的乘客们或望向窗外，或相互交谈，他们的神态各异，仿佛各自怀揣不同的心事。在画面的上方，黄浦江轮渡船在外滩建筑的衬托下，在江面上破浪前行，船身的轮廓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这些不同大小、不同身份、不同场景的元素，在画面中相互穿插、重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张力，仿佛一首激昂的交响曲，每个音符都在诉说着民国上海的独特故事。

色彩，作为绘画艺术中最具表现力的元素之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常色彩只是技术层面的表达，是描绘图像的形式手段。如果想利用色彩去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则需要寻找出

具有普遍认同感的色系。这种认同感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而是时代审美的文化特征。我精心选择了灰绿色与枣红色作为主色调，构建起整个画面独特的色彩体系。灰绿色，最让人联想起老上海有轨电车与咖啡吧斑驳陆离的墙壁，黄浦江上来回穿梭的轮船，石库门弄堂墙壁上的各种招贴广告，为画面奠定了一种沉稳、内敛的基调。而暖色系，如金黄色的路灯、橘红色的晚霞、粉色的旗袍，大街上奔驰的老式轿车等，则为画面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它们象征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与热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灰绿色与暖色系相互交织、相互映衬，在画面中营造出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独特氛围，让观者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个充满魅力与传奇的民国时代。

为了将本不相关的人与物巧妙串联成一个统一色调的画面，我采用了云烟、商业广告、化妆品瓶罐、香烟以及月份牌等元素。云烟，以其缥缈虚幻的形态，在画面中自由穿梭，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场景、不同元素自然连接在一起。商业广告，作为民国上海商业繁荣的象征，以其鲜艳的色彩、醒目的图案出现在画面的各个角落，它们不仅为画面增添了时代感，还暗示了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风貌。化妆品瓶罐和香烟，作为那个时代时尚生活方式的代表，与画面中的时装女郎、石库门娱乐场所相互呼应，共同展现了民国上海市民的生活情趣与消费文化。

月份牌，作为民国上海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更是成为《海上尘烟》系列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用其与其他元素大量互动。例如在画面中，一位时装女郎手拿着一本印有月份牌图案的杂志，她的眼神专注而迷人，仿佛在与月份牌上的人物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或

者，在石库门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巨大的月份牌海报，我降低了月份牌广告的色彩明度，使之与画面的整体灰色调相互协调，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一份浓郁的怀旧氛围。

老上海的工具，有轨电车、小汽车、黄包车、三轮车、黄浦江轮渡船等，不仅是人们出行的工具，更是那个时代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它们在画面中或疾驰或缓缓前行，展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力与节奏。

马路上的情景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装女郎们各式发型，或烫或卷，穿着各式旗袍走在繁华街头。她们的装扮时尚而大胆，融合了西方的流行元素与东方的审美观念，展现出那个时代上海女性的独立与自信。而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瑰宝，以其独特的剪裁与优雅的款式，将中国女性的柔美与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画面中，我细致描绘了各种款式的旗袍，从简约的素色旗袍到华丽的绣花旗袍，哪怕手中的小拎包也十分仔细，每一件都诉说着一个关于民国上海的故事。

石库门，作为上海独特的民居建筑形式，承载着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与地域文化内涵。石库门内的娱乐场所，如茶馆、麻将室、小堂会等，是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空间。在这里，人们或是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着家长里短，或是观看一场小型的戏曲堂会表演，或是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听留声机传出的音乐。这里东西方文化相融，享受着休闲时光的乐趣。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弄堂文化，正是上海市井风情的写照。

民国的上海是个社会阶层复杂、各阶级生活品质相差悬殊的城市。街头小贩、马车夫、码头工人、手艺人、服务生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是民国上海民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



周矩敏《流金岁月》

部分。他们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叫卖着各种小吃、日用品和手工艺品。“五香茶叶蛋，快来买呀！”“卖花咯，新鲜的茉莉花！”这些熟悉的叫卖声仿佛穿越时空，在画面中回响。街头小贩们的辛勤劳作与朴实生活，为这座繁华的都市增添了一份浓浓的烟火气息。

这一切生活细节在意识流的引导下，如同五线谱中各个音阶的音符，通过云烟、商业广告、化妆品瓶、香烟和月份牌彼此串联，如同奏响了一曲“海上繁花”的序曲。一幅幅如尘烟般消逝却又在画面中鲜活重现的民国上海民俗文化记忆长卷便徐徐展开。《海上尘烟》作品，不仅仅是对三四十年代上海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更是对传统中国画表现手法的一次突破与创新尝试。

在创作《海上尘烟》作品的过程中，我始终

怀揣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对历史的尊重之情。每一个笔触、每一抹色彩、每一个元素的选择与布局，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与反复推敲。我希望通过这一幅幅作品，能够让观者穿越时空的隧道，亲身感受那个时代上海的独特风情与文化魅力，同时激发人们对传统中国画艺术形式如何创新与发展的深入思考。在艺术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被传统图式所束缚，而应勇敢地探索与尝试一切可借鉴的艺术样式，以创新思维与独特视角，去发现和展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作品永远是先感动自己，才有可能感动观众。

周矩敏 江苏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苏州国画院名誉院长，苏州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 江上往来人

### III 黄靓靓

没有哪座城市比南京更具艺术气质了，我常常这样想。十年，或二十年后，我还会这么认为吗？当然不能确定，但朦胧中感觉时间流逝只会强化本能认定的东西，尤其对于那些伫立在时间之河里渐趋永恒的艺术品。

在南京，一年四季都是探馆好时节。去年夏天我沉迷于几家绘本馆，不仅因为它跟自己的专业相关，更因为绘本本身的魅力。秋天一次又一次穿越中山路，满街的梧桐由青转黄万般风情，却总来不及细看，博物院召唤着我，它宇宙般浩瀚，呈现着人类群星闪耀时。从冬到春，我搜寻各类展览信息并逐一前往，美术文学建筑园艺，科幻动漫摇滚服饰，主题纷繁庞杂，那些展馆，有的雄踞大厦顶楼，有的躲在迷宫般的地下，有的建在远郊山谷或湖畔，有的隐在街巷深处。当夏季再次来临，我忽然对所有浓稠甜腻的事物厌倦起来，渴望进入更自然真实的境地。

于是，一个梦境般的黄昏，《极乐戏》出现。它挂在一家画馆的前厅，许多张脸，又像是同一张脸，望向我，说：“嗨，你来啦！”

我刚上完一节不那么成功的公开课，满心沮丧。长途骑行，经过高楼立交绿地和广场，世界

空阔得仿佛没有边际。由山西路拐入宁海路，渡赤壁过珞珈，跨牯岭出颐和，丢开单车，与三两游客擦肩，冥冥中走进画馆，如大象闯入瓷器店，彼此都将迎来一场浩劫。

这种震荡是双向的，我近乎冒犯地探究它，它亦以同样姿态探究我。除了应对巨大的冲击力，我脑中一片空白，工作的规训使我勤于概括和提炼，但此刻“欲辩已忘言”。画中金面留须者深谋远虑，红额乌眼者伺机而动，乌面乌唇者阴险狡诈，有眼无珠者骄横跋扈，四张主体脸谱也可拆解成许多脸，影影绰绰更有无数隐于后方。很难用单一的绘画理念来界定《极乐戏》，它依靠抽象主义的大线条浓色块多维空间支撑，蕴藏写实主义的精准聚力，既有印象派的光影流动，又饱含超现实主义的异质感。一幅布面油画，仿若演至酣处的人间情景剧，鼎沸与空虚交织，庄严与荒诞并存，又像一盆火，灰烬飞舞却熊熊不灭，似乎要一直燃烧下去。

喧哗，燃烧——《极乐戏》给我的第一印象，但它绝不仅限于此。燥热氛围中，画家以极度敏感的笔触，探测面具下深藏的灵魂，于是线条开始扭曲，色彩发生颤动，点线面营造出的现实



丁捷 《极乐戏》

时空变得虚无缥缈，失重失真状态下，隐秘事物得以浮现，欲望海里的挣扎，名利场中的失控，真情假意间欲拒还迎的周旋，善恶抉择前闪电般的警醒，幡然醒悟时的恍惚，得偿所愿后的惘然……贪嗔爱痴怨，人性明灭尽在其中。若是少年心性，我是说我，一定要继续往下挖掘，画家却在这时停步，以一种淡淡的接近温情的意韵收尾，留下无穷想象和可能。

我嫌它太多隐晦、缠绕及困顿，不够舒展，不够快意恩仇手起刀落，可我一知半解地感知到它是对的，它诚实地记载我尚不明白的图景。生活对我来说，像风雪即将来临，空气渐渐浸满冷

冽气息，像朝着群山进发，虽未抵达，却明白终将被苍莽覆盖。千利休说：“艺术是用残缺完成的完美。”《极乐戏》将此演绎到至高点。未尽的画意，如不够圆满的人世，有亿万种解读方式。

“乐”究竟为何？《极乐戏》未妄言，只以夸张脸谱展示“恶之花”。寄居于平庸病态畸形外壳下的，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如我爬山所遇，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而早在千年之遥，南唐高僧德韶早已道出立世之根本：“始识通玄峰，只在人间住。”

风景无穷，《极乐戏》是开篇，也是纲领。移步向前，近乎凝滞的光影被打乱，随即又复原。

这家画馆古朴沉静，跟江苏路整体风格相同。夕阳透过天窗洒落在楼梯上，恰好为那里拍照打卡的几个女孩作补光——这该是百年前建筑师的匠心吧。女孩们的笑语声落在地板上，撞在墙壁上，给馆里增添了几分明媚。一队游客鱼贯而入，又悄无声息地聚拢。“세계 문학의 랜드마크(世界文学地标)”，领队轻声讲解，“DinGie”，“丁捷”，画家名字被各种口音念出。从他们的徽章我勉强认出是个韩国团，男女老少都有。

一位中年女子与我并肩看画。这幅水墨名为《喜相逢》，墨色清透，以象征性笔法绘出鱼的神韵，众多线条看似堆砌，内里却可自在往返，整个画面空彻洞明，闪烁如琉璃。很长时间，身边的人静止着，我也没动，任由一种平和的情愫在心头流淌。忽然间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原来那个女子在啜泣。我从包里抽出纸递过去。

她道谢，以生硬的中文，目光依然舍不得离开画。眼泪还在流，不时抽动鼻翼，有几分神经质，更有几分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稍稍平息后她感叹，“喜相逢，真好啊，真高兴！”

为何高兴了反而流泪，我不能完全理解。她身形瘦削，长相平淡，略带花白的长发让我想起海子的诗，“你说你孤独就像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

我俩使用极简语言进行交流。

“艺术团，我们。”她环视一下在其他作品前流连的同伴，“我，음악가(音乐家)。”她摆出弹琴的样子作补充，“Piano(钢琴)。”

“阿尼哈塞哟。”我从韩剧学的，难得有用到的机会。“我是幼儿教师，Preschool Teacher(幼儿教师)，不过现在还是新手，有点菜的那种。”

她有没有听懂我不知道，但她的笑容如此温暖，我仿佛看到画中那条最飘忽的鱼儿轻轻一跃，水面波光粼粼。

背着萨克斯管的韩国团长过来，不由分说地帮我俩拍了合影，然后发隔空投放。钢琴师虔诚地合掌，谢了团长，又谢我，最后对着画深深合礼。

团队行程匆匆，一番拍照后准备离场。钢琴师从背包上取下一个挂件，慎重地交给我，“转山转水转佛塔，喜相逢，Good luck(祝你好运)！”

尽管相识不过几分钟，沟通也有障碍，我却因一幅画而心灵相通。“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无论是远去还是留下的人，都有着无法言说的孤独。在文学名著《一句顶一万句》中，老汪拖家带口走了很多地方，只为找到一个“不想灯盏”的地方。我们何尝不是老汪？难以觅得那个让身心完全平复的地方，但若愿意，总有意想不到的事物给我们些微的安慰。

挂件上蜜蜡在幽暗中泛光，取代了早已消失的余晖。裙裾飘飘中，拍照的女孩们也走了，白昼敛去最后一丝芬芳。管理员拎着钥匙，从他身边经过，响起一句“欢迎再来”，回头时看见《极乐戏》，许多张脸，又像是同一张脸，望向我，像是它发出的声音。

桐影依依，画馆矗立。这座城的外围，江水正滔滔流过，夜以继日，永不停止。那是画馆主人的江，是他生命的起点和灵感的来源。忧伤的早慧少年，知晓了太多人间故事，于是写着，画着，一本又一本，一幅又一幅，构成广博的新世界。在无限辛劳中，他偶尔停顿，望向江的方向。

那样的时刻，如黎明到来前，夜空几粒恋恋不去的星痕。

如一曲終了，指尖滑出最后一串音符。

如江上往来人，鱼和人都寻找归处。

黄靓靓 教师，写作者。

## 为了告别的聚会

III 向隆鸣



高欢《墨竹》

这个聚会是为了告别，告别朋友，告别人生，以画展和摄影为形式。

来宾很多，主角却迟迟没能出现。

高欢，头衔很多，画家、作家、篆刻家、编辑，南京古歌博物馆创办人、馆长，1996年《纽约时报》封面人物。其实，一句话，他就是个高级玩家。

高欢有张照片，是去年和钱大经联袂举办画展时拍的，光头，墨镜，白须，黑衣，盘腿而坐，双手平持一根细而润的竹杖，胸前挂一圆的玉坠。

弘一法师是彻底出世，连书法都充满空灵，笔画之间无一丝烟火气。高欢不然，一直浸淫于世，广交友朋，抽烟喝酒，骑马郊游，自由不羁。他的画，汪洋恣肆，竭尽张扬。郑板桥的竹清秀挺拔，寥寥数笔便跃然纸上。高欢的竹却枝细叶繁，层层叠叠，不厌其烦，其中不乏枯枝败叶，想必画来极费工夫。两者技法都属大师级，若以工时论，估计板桥信手画竹二三十幅，高欢未必成一幅。况且，高欢的竹林还缠绕着数不清的嗡嗡作响的蚊子。那些蚊子，或飞或歇，甚或在空

中交尾，姿态各异。最令人惊叹的是，蚊足极细，而极细且屈张着的蚊足上，仍可见其鳞片构成的黑白斑纹。有位朋友说，一见这些蚊子，身上不禁就发痒。是的，这都是那种飞过来无声无息出其不意叮你一下就奇痒难耐的有毒的花蚊子，画得太像了。

近来高欢身体日渐衰弱，去日苦多，于是有了这个聚会。原计划在明年一月举办，现在提前了。

妻子喻慧说：

老高多情有义，喜结友朋，因此以画展的形式做一个生前告别。

请带一张纸、一封信，写上几句话，带一点情谊带一点温暖，彼此告慰还有时间可以细读。

审美地、体面地告别人生是他和我共同的心愿。

所以不必沉重不要哀伤，说说心里最想讲的话，见证他一生的荣耀，把他最好的一面留给大家。

其余的就让家人承担吧。

画展地点在南京逸空间画廊，时间为2024年12月22日。原定展览一天，最后改为半天，显然鉴于高欢身体。但结果，高欢还是没能前来。他在医院，现有体力仅够支撑他在病床与卫生间之间来回挪动。

我正在仔细观赏展厅中间那五幅联排着的墨竹，忽然谢舒给我发来微信：“我突然醒来，在看我哥刚发来的现场录像，才知道高欢没到场，心碎，太难过了，不说了，说不出来。”

此时她在华盛顿，正是夜间，心却挂在这个画展上。

现场有个大竹篮信箱，来客将事先写好的给高欢的信投进去。吧台另备有三副纸笔，供来客现场书写。现场书写的人们在排队，写下最想讲给高欢听的心里话。

展馆四壁挂着高欢的画作、不同时期的照片，照片旁配有文字，都是高欢平时说的话。有一幅青年高欢与父母的黑白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戏曲人物画大师高马得先生的形象。王亚伦说，当年他们插队在苏北宝应夏集，高马得一家亦下放在夏集，经常来往，马得夫妇十分恩爱，待人和善，喜欢朱虹。朱虹说，那时高欢还小，很皮，人很聪明。

在一幅画旁边配的文字里，高欢说，我经常对着镜子画自己，因为我不好意思让人家在那里太久。韩辛、丹青、朱新建、沈勤等等他们都画过我，小朋友们也喜欢画我，我有特点，戴墨镜，光头，一画就像。

陈丹青在高欢钱大经联合画展上的序言里说：“那些年我没见过高欢画画，以他的性格，大约只是自己快乐，并不示人，现在见到他的墨竹与向日葵，吃一惊吓——原来这半仙的取意，竟是很高，忽而有点赵孟頫，忽而有点金冬心，用

水用墨的纵意恣肆，又简直徐文长。”

来之前很是纠结，高欢，一个高古之人，离我很远，我只是不断地从谢舒那里陆续知道一些高欢的片段，此时，给这位大师写点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将一个月前与谢舒谈论高欢画的对话写在纸上投进大竹篮信箱里——

我说：高欢的画是给后人看的。待这个世界清静下来，杂质沉淀，回头再看，他还端坐在属于他的历史坐标上。

谢舒：你是这样看高欢的画？回头看种种评论，难道不是你的观点最超前吗？我看了一惊，因为你这样评论他画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难道从他的笔触中感知到什么吗？我相信有些人对事物有超维认识的。你的这段话就是超维判断。

其实，我不懂画，说不出什么布局、结构、技法、色彩、主题、寓意、意境之类。我说这话，只是因为我看不懂高欢的画，如同我至今看不懂梵高与毕加索的画一样。但我相信时间。在我心中，高欢是大师，大师之作，世人开始往往会忽略，但最后终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浮出水面。当年张择端将画好的《清明上河图》献给宋徽宗时，徽宗起初不以为然，还随手甩在一边呢。

在一组高欢的照片旁边，配有几段文字，很有意思：

问：最喜欢的画家？

答：太多了，维米尔、莫迪、梵高、塞尚，太多了太多了。

问：政治人物？

答：美国总统里根。

问：人呢？指性格。

答：真实、爽气。

问：最讨厌什么样的人？

答：虚假、叽叽歪歪。

问：动物呢？

答：马。

问：最讨厌的动物？

答：鬣狗。

问：最喜欢什么音乐？

答：古典的，交响乐，大提琴，小提琴，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年轻的时候竟然听哭了，所以印象深刻。不喜欢钢琴，被朗朗们搞坏了。

问：这辈子最满足的是什么？

答：都蛮满足的，没有什么遗憾的。

这大约是高欢与妻子的对话，通透，干净，率性，旷达，很有几分童真。喻慧心极细，她给高欢选配的文字，都是高欢平素随口说的话，最高欢了。

高朋满座，文友云集，来宾中不乏杰出的艺术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一家四口特地从安徽赶来，还有一位身居美国的高欢的挚友托朋友送给高欢一盒巧克力。现场有歌舞，有吟诵，还有戏曲表演。开场节目是王亚伦拉着手风琴领着一群手持向日葵的朋友合唱《社员都是向阳花》，那优美畅快轻松活泼的节奏一扫原先弥漫在展厅内的悲伤与沉闷。喻慧眼圈先是红的，每见挚朋，未曾开言先有泪，但她在融入小合唱以后，眼眉渐次开朗，成为这场聚会的名副其实的主持人，串起一个个朋友，一个个与高欢有关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

喻慧说，我只发了个朋友圈，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朋友。又说，来的都是朋友，我就不报各自的身份了。我自忖，在众多来客中，大概只有我一个纯属“外人”。除了亚伦朱虹夫妇，我不认识这里几乎所有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艺术成就，如此便好，我可以旁观者的身份

细细地看，静静地听，不停地想。这场别具一格的聚会，没有官场的油腻，没有商场的铜臭，纯属民间的自发的一场活动，这么多人冒着严寒赶来聚会，显然是想见见高欢，和他说上几句话。那么，高欢，为何竟有这般魔力？

恰在这时谢舒又发来一条短信：欢兄喜交结，重情义，守信用，仗义执言才华横溢收藏巨丰真挚坦诚！这个俗世已经难有他这样的赤子。那么多人喜欢他，舍不得他，我也是其中一个。这片江湖上少了个艺术大侠，而对我来说回国探亲少了个值得相聚海聊的朋友。南京空了一片。

音响里传来一个醇厚的声音，我挤过去，原来是一对老年夫妇在朗诵，一听就是专业人士：“……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是徐志摩再别康桥，还是高欢在告别人生？听着、想着，突然眼眶就湿了。

手机响起，还是谢舒：“高欢，永远的少年！”呵，大洋彼岸那边，今夜无眠了。

我的视线越过众人，久久停留在高欢那幅骑马的照片上。高欢身着雪白的马裤，黑衣黑帽黑马靴，上身前倾，站在一匹黑马上，似刚跃身上马，正欲策马飞奔，极是英姿勃发，神采飞扬。

我不知道这是高欢哪年拍的照片，也不知道当年《纽约时报》封面上的高欢是不是这样的骑着马。但在我心里，瞬间就把原先定格的高欢那张盘腿持杖充满禅意的照片撤换成这张骑马照片，同时心里喊道：高欢别走啊，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哎！

2024年12月25日

向隆鸣 1952年生于南京，江苏省高级检察官，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 哭向九泉添一语

III 王振羽



陈宝箴像

2025年，清明过后，一偶然机缘，有赣湘之行。车抵南昌，参加完一些红尘俗务，已经夜深。我从驻地打的，西行过江，寻找靖庐。夜色朦胧，犬吠有声。根据导航，到所谓程村，但当年散原公子多次的歌哭之地，他父母的安葬之所，踪迹皆无，面目全非，人世间的桑田沧海，如此剧烈，还是让人大出意外。电话询问南昌陈三立研究专家胡迎建先生，他说，踪迹皆无，了无印痕。多次反映修复，毫无结果。多年前南京的沈卫威也曾来踏访寻觅，一无所获。闻听此语，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且把目光拉向127年前那一风雨如晦的峥嵘岁月，靖庐矗立，魂牵梦绕。

1898年冬，光绪二十四年，满怀悲愤的陈三立陪伴父亲陈宝箴并携母亲黄夫人灵柩离开长沙湖南巡抚府衙官邸，经湘江出洞庭湖，泛舟苍茫长江、越浩渺鄱阳湖，抵达南昌。经如此重大变故，陈三立看父亲神情泰然，与接任他的俞廉三交割事物，举止从容。右铭先生登船之前，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前来送别，拥抱陈宝箴，嚎啕大哭。右铭先生神情虽然黯然，却并不失态，还劝慰谭继洵有加，仪态安然。

被罢黜之后的陈三立全家为何会安家南昌？

葬母亲黄氏于西山？原来不是说好要栖身九江的吗？却原来，陈三立托付他人九江寻觅宅邸，此人一口答应，并致信陈三立，一切都已办妥。谁料到，一家多人到了九江，此人却避而不见，溜之大吉，所付款项，也都杳如黄鹤，一分不剩。陈小从《庭闻琐述》有载：罢归时原拟在九江安家，及舟抵埠，方悉前托代为觅宅及其他一切庶务，均无头绪。祖父恚甚，一拳击在船窗玻璃上，碎片伤指。玻璃入骨，碎片割裂，血流如注也全然不顾，多日积郁，一朝爆发，年近七旬的封疆大吏，一旦失落，遭小人如此欺凌，夫复何忍？！陈三立万般无奈，迫不得已，只好乘原船改赴南昌而来。陈三立畅游庐山，还是陈宝箴任职湖北之时，散原公子与朋友们曾三到庐山，留下大量诗文，这也为散原晚年归卧庐山埋下重重的伏笔。

曾经的封疆大吏，虽宦海多年，而陈宝箴父子在南昌并无片瓦立锥之地，他们最初只能赁居南昌古城的磨子巷栖身蜗居聊避风雨。陈三立后来曾说，“既归，而无田可耕，无宅以栖”，“府君既罢归南昌，囊篋萧然，颇得从好友假贷自给”，当时的困窘狼狈之态，跃然可见。朱德裳

有《三十年闻见录》亦载：余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由此来看，王湘绮把陈家父子与朱明严嵩父子相提并论，实在是令人费解委屈，严世藩富可敌国，散原可曾有家财万贯纸醉金迷？南昌青年才俊熊季廉前来拜访，将所作《论学书》求教于陈宝箴，大得右铭先生叹赏，赞其为来日“国家重器”。此人后来服膺严复，与陈三立也多有往来，可惜他不到而立之年，就英年早逝了。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曾追忆这一段时光的往事历历：“光绪己亥之岁旅居南昌，随先君夜访书肆，购得尚存牧斋序文之《梅村集》。”《梅村集》就是吴伟业的诗文集，钱谦益为之作序。困顿挫败之中，陈三立陈寅恪父子还有此雅兴，夜逛南昌书摊，购得此书，成为晦暗岁月的一种温馨回忆。

陈三立家学向有医道，居南昌之时，陈宝箴还向孙子陈寅恪谈到曾祖母购药核实药名的往事缕缕，陈宝箴也曾为郭嵩焘、翁同龢、谭继洵等诊病开方。谭继洵答谢甚厚，但被陈家婉拒谢却。谭继洵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患病早夭，二儿子谭嗣襄才过而立之年就死在宝岛台湾，三儿子谭嗣同则在1898年喋血菜市口。与谭嗣同父子相比较，陈家父子尚能有一线生路，无血光之祸，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种侥幸了。

1899年春，陈三立葬母亲黄氏于南昌城外西山之青山程村。母亲落葬，陈三立想起当年父亲与祖父在外与太平军周旋、州城叶济英太守投水自杀、母亲背着自己东躲西藏，吃尽苦头，不禁泪如雨下，情难自己。安葬之时，陈宝箴刚刚有一颗牙齿脱落，年近七旬古稀，遭此不大不小的身体变故，心中顿生落寞凄凉来日无多之慨。他将牙齿小心翼翼包裹存好，置放在墓圪之左，并在墓中所埋石上镌刻短铭。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江西南昌(1899年)

入土为安，丧葬事毕。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便在墓旁构筑靖庐。靖庐之靖，取义于青山之名。靖庐左右，丘壑之间，绿林掩映，陈宝箴在靖庐门上自题：“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靖庐墙壁之上嵌一方石，刻有“容膝”两字，署款“晦翁”，说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手笔，由一收藏者赠送陈家父子，所刻两字出自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自得其乐，蜗室不小，此心安处是吾乡。

西山，《水经注》又名之为散原山。陈三立以此为号，即源于此。陈三立《靖庐书所见》对这一带山势有生动形象描绘：“西山江之滨，包裹四百里。岗峦支脉分，错出斗俶诡。高者插天霄，腾翼鹏鸾似。稍伏奔虎象，忽蹙蛇龙起。”陈三立还曾在《靖庐述哀》一诗中说道：

其上萧仙峰，形态高且娴。

雨如戴笠翁，妍晴立妖鬟。

散原公子有《靖庐记》，就靖庐周围地理概貌，至为详细明白，他放眼远眺，“西山负江西省治，障江而峙，横亘二三百里，东南接奉新、高安诸山，北尽于彭蠡，其最高峰曰萧坛，下纷罗诸峰，隆伏绵缀，止为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陈三立再说靖庐，“墓旁筑屋，前后各三楹，……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

空翠潏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余蔽亏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难得清闲的陈宝箴在靖庐墙内外种植了不少花木，还开辟小池塘种荷、养鱼，还饲养了二鹤一驴，猫狗各一，在阶前种植了两株桂树。

经过一年精心经营侍弄，靖庐的小环境大为改观。靖庐墙边有翠竹，周围栽种桃、李、杏、梅、牡丹、杜鹃等，旁边的小池塘里有莲花，塘边有棠梨树。可惜的是，两鹤有一鹤猝然死去，被葬在靖庐之旁，陈宝箴还特地在鹤冢碣石上题写数句哀辞，为之作鹤冢诗二首。他还曾攀登萧峰最高处，一览雄奇，彭蠡连江，匡庐溅瀑，渺然独立，天风浩荡，慨然作《登西山萧峰》：

西山高处白云飞，绝顶苍茫入翠微。  
彭蠡连江烟漠漠，匡庐溅瀑雨霏霏。  
乘鸾仙子今何在？跨鹤王乔去不归。  
四望渺然人独立，天风为我洗尘衣。

陈三立曾有《倚楼望西山》追叙父亲当年的登顶之举，不无自豪：“先公昔居靖庐时，曾登萧峰绝顶。”但内心隐痛纠结又怎能一朝抚平？陈宝箴父子全力推行新政，虽然各种意见纷纭，彼此矛盾甚多，有人激进，有人观望，有人保守，有人诋毁，更有来自北京、武汉的压力，张之洞多有函电“指导”，陈宝箴父子极力兼顾各方，也不得不进行人事调整，维持大局，就在1898年戊戌政变前不久，陈宝箴还得到光绪帝表彰。顷刻之间，风云突变，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其中有三人属陈宝箴推荐之人，但这些推荐，陈宝箴何曾有一点私心杂念？有的是故人之子，如谭嗣同；有的是张之洞的学生，如杨锐。陈宝箴举荐，也是根据朝廷旨意，怎么就属“滥保匪人”？父子复盘，一一检讨，“其所难言之隐，莞结幽忧，或不易见诸形色，独往往深夜孤灯，父

子相语，仰屋唏嘘而已。”陈宝箴还问陈三立，皮锡瑞、黄遵宪，他们的情况如何？陈三立默默说道，他们也许都还好吧？！

陈三立葬母之后，大病一场，憔悴骨立，几乎死去。因此之故，他的堂姐迟迟未离南昌，留下来照料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直至七月方才离去。但到此年底，他的堂姐就病故了。当时陈三立与夫人带着数子仍居南昌城内磨子巷，时常往西山侍父小住，“父子虽自放山水间，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光绪二十六年初，陈三立将仿宋刻《黄山谷集》刊印完成，了却了陈宝箴多年企盼牵挂的一桩心事。陈三立刊印《黄山谷集》，还把此送给亲家翁范当世，算是对他撰写陈宝箴墓志铭的酬答。众所周知，黄庭坚是陈宝箴父子同乡，也是陈三立一直尊崇奉为圭臬的作诗楷模标杆向导，他曾赠诗南通范当世：“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由斯力人复古，公然高吟气横秋”。

1900年4月4日，陈三立自南昌城内携衡恪、隆恪、寅恪等诸子来看望陈宝箴。他曾在《靖庐述哀》诗中回忆陈家祖孙欢聚拥抱、嬉戏石狮情景，温馨可亲，令人难忘：

哀哉祭扫时，上吾父母冢。  
儿拜携酒浆，但有血泪涌。  
去岁逢寒食，诸孙到邱壑。  
父尚健视履，扶携迭抱拥。  
山花为插头，野径逐汹汹。  
墓门骑石狮，幼者尤捷勇。  
吾父晚之笑，谓若小鸡竦。  
惊飙吹几何，宿草同薙茸。  
有儿亦赘耳，来去不旋踵。

陈三立家人众多，长期居住南昌与西山，坐吃山空，难以为继。生活拮据，“囊篋萧然”。陈三立祖先虽置有田产，修水竹垞有房屋田地，湖南某县也有田租百担。但陈宝箴父子罢职之后，

以“不治产，不问政”为家训，传谕子孙。竹墩乡里等处房屋田地，从无人管业收租。江西讯息也不灵通，尤其是在西山，隔江船渡，风雨泥泞，与外界联系很不方便。

1900年春末，陈三立携家眷移居南京。散原为何选择落户南京，也许可从他为蒯光典所撰《四品京官蒯公神道碑铭》中一窥端倪：国家自海通以来，南北洋屹然为国内重镇，南洋辖三巡抚、四布政使，地尤广，士大夫欲发名成业，以才智自效于时者，争趋江宁。流寓南京，比较直接的原因，一是薛次申的邀请，再者是俞明诗的哥哥陈三立的大舅子俞明震在南京，彼此也可有所照应。但离开父亲，有失侍养，又令他最为割舍不下，忐忑不安。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有言：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且留靖庐，诫曰：“秋必往。”当时商定陈宝箴留在靖庐，陈三立秋天回来即接父亲赴江宁定居。

此一年，岁在庚子，义和团狂飙突起，在山东、河北等地，烧教堂、杀洋人，风声鹤唳，时局紧张。5月25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下诏与各国宣战。南方长江一带宣布戒严，谣言纷起，传说德国、英国纷纷动作，索要下关炮台、上海制造局，一时人心浮动，惶然无措。

甫到南京的陈三立，感于时局，在南京、上海等地积极参与“东南互保”活动。所谓东南互保，即鉴于京津一带陷于战火，东南各省宣布自立，互相联络，达到保障东南一方之目的。当时的所谓庚子勤王，即迎銮南下，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南下南京或武昌，借机迫使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帝。

7月9日，阴历六月十三日，为时局纷乱而焦虑不安的陈三立，在金陵披肝沥胆冒着巨大风险，致书追随銮驾护卫的多年挚友梁鼎芬，他在信中说：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

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

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独居深念，诂不谓然？

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牒，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

陈三立此一密札，多有解读，众说纷纭。周康燮在《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中就散原此一信札如此分析说：“骤读之，似为庚子义和团案时筹献东南自保议，细辨之，赫然为三立参预唐才常自立会组织，谋拥鄂督张之洞，掣两湖宣布独立，以劫持江督刘坤一，联为同志，成立势力，勒令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之复辟勤王运动……”；周进而又说：“庚子之役，献议东南各省自保者，首发于赵凤昌，倡导于盛宣怀，终由江、鄂二督列衔飭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项，时三立虽属戊戌得罪禁锢在籍之身，亦得躬预斯役……”；解读至此，周进行总结，得出结论：“综察此札，三立欲使鼎芬商筹秉恩，谋通款曲于张之洞，由张之洞劫持刘坤一，主持此勤王复辟大业，乃之洞权诈欺世，势利性成，致才常、三立所谋，终告失败。”从周康燮就陈三立就这一密札与他的跋文来看，陈三立分析时局，推测刘坤一、张之洞这两位总督晚清大吏之举措，若指望刘坤一率先行动，不大可能，只有张之洞倡议在先而刘坤一附和其

后，方有一线生机，挽救危难。散原信札中的陶观察即陶森甲，字榘林，当时代表鄂督张之洞赴上海与议东南互保。龙大令即龙泽厚，字积之。王秉恩，字雪澄，久佐张之洞幕府，后入两广总督岑春煊幕。陈三立不顾革职在野的卑微身份，仍忧虑国是，挺身而出，积极参加勤王运动，其用心迫切，系挂天下，跃然字里行间，尤其是他的“题外作文度外举事”这八个字，动魄惊心，让人悬猜。但周康燮如此诠释，甚至说陈三立与唐才常联手如何动作发难，似有过度解读之嫌，不大可信，还有商榷再议空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记述此年大事，可与周康燮的解读彼此参照：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自上海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请飭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留东南以救社稷。盛宣怀还曾邀张謇、赵凤昌等分别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去函请沈瑜庆、何嗣昆、陈三立、汤寿潜等参与劝说。六月二十六日，刘、张两总督授权盛宣怀与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上海各国领事会商制订了《东南自保章程》，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张謇，字季直，号啬翁，清末状元。他约陈三立一起去见刘坤一，慷慨陈词，劝其迎銮驾南下。后来，南方事态平缓，张之洞毕竟圆滑世故，出于自身考虑，仍然效忠慈禧太后，所谓勤王之举，很难有所作为。对此，陈三立后来在给张之洞的祝寿诗中也微讽其圆滑骑墙，首鼠两端：“人皆攘臂趋，退审敛锋芒”。

当年倡导东南自保，陈三立活跃其中，穿针引线，并非向壁虚构，夸大其词，故意拔高散原作用。现摘刘厚生著《张謇传记》引《啬翁自订年谱》庚子年记事，予以佐证：“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与眉孙、爱苍、蛰先(汤寿潜)、伯

严、施理卿炳燮(刘坤一幕僚)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即定义，电鄂约张，张应”；“再说新宁退敌迎銮”，刘厚生在“退敌迎銮”下有注：“此主张发生于陈三立……迎銮之意，即拟将那拉氏与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设法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也。”这样说来，“迎銮南下”的主张实出自陈三立。新宁是指刘坤一。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入京，肆行烧杀抢掠。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京逃往西安。二十七日，唐才常在汉口起义失败。“迎銮南下”、复辟勤王的此一大胆富有想象力的计划，最终昙花一现、化为泡影，了无痕迹。

目光再转向陈宝箴。7月17日，陈宝箴还写信给陈三立。时间不过五天之后的7月22日，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陈宝箴就撒手人寰，猝然病逝于西山晴庐。陈宝箴之死，距陈三立移居金陵时间仅仅相隔两月，正是“东南互保”活动紧锣密鼓期间。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说父亲“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卒前数日，尚为鹤冢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孝，懃懃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陈宝箴去世之时，有人撰有七律一首挽之，郁郁不平，有李商隐“无题”诗的隐晦不明，大鸟华表，青蝇素旗，似有所指：

日斜庚子惨无晖，黯黯西山叫子规。  
时事渐非公早去，勋名未竟世同悲。  
月明大鸟来华表，风冷青蝇吊素旗。  
千古长沙流恨地，魂归只合伴湘累。

陈宝箴曾哀叹贾谊遭贬于长沙，殊不知后人又哀陈宝箴以“招奸引邪”之名遇挫于长沙。余肇康撰挽联言说陈宝箴一生功绩，主政三湘：“负

天下之谤，尤享天下之名，今日盖棺姑莫论；去吾湘最奇，而在吾湘最久，当年轶事不胜书。”语语写实，并非虚言。

陈三立闻听如此惊天噩耗毫无精神准备，他立即从南京赶来西山哭悼，哀毁之状，草木泪落。他椎心泣血将父亲葬在母亲墓旁，范当世、陈芑潭、梁鼎芬等也前来靖庐吊丧，相与培土成坟，哀伤叹嗟不已。多年挚交晚清名臣梁鼎芬有《拜陈抚部丈墓》诗，字字真切，绝非场面客套，言不由衷：

枕中魂泪常经处，今晚冲泥上此台。  
肃肃高松非故物，疏疏寒雨助人哀。  
丈夫一瞑曾何顾，山径余花有未开。  
欲去仍留肠已断，衰迟真恐不重来。

陈宝箴的葬事费用，还因有知交陈芑潭的倾力帮助才得以完成。从1901年陈三立所作《由靖庐寄陈芑潭》诗中可知其间酸辛一二。父亲猝死，散原公子时隔一年，回首盘点，心如刀绞，他如此总结：

前年朝政按党纲，父子幸得还耕约。  
分应亲故不相收，万口訾訾满嘲诮。  
独君放船就游衍，感昔伤今谈舌掉。  
无何昊天示灾凶，坐使孤儿仆且叫。

如此天降灾祸，致使孤儿丧吊，椎心泣血，故人相助，风谊清劭，忧心时局，哭天无泪。散原又说：

昏昏泣血西山庐，奔忙重辱君临吊。  
寻声索迹行哭悲，助丧成坟费量料。  
先公宾客散九州，君也风谊特清劭。  
尔时北乱逼京阙，西巡方下哀痛诏。

散原此诗最后还是落脚在当时的危局如何走出困境，而自己与朋友因蹭蹬失津，无能为力，徒唤奈何：

臣民悔祸露机缄，公卿陈言仍窃剽。

君论时变究新法，动得本根中款窍。  
提携孤愤到荒山，更剖大义督不肖。  
瑰才自合老卑冗，安问蹭蹬失津要。

陈三立坦言追述戊戌变法后陈氏父子回归江西、遭人嘲诮的尴尬窘状，困顿无助。此时此刻，陈芑潭悄悄来到西山，陪伴并安慰昔日的主人，与他一道谈古论今。未久，陈宝箴猝逝，又是陈芑潭前来帮助料理丧事，直至安葬。陈芑潭，广东澄海人，是陈宝箴的门生故吏，曾任泰和县丞二十年，后调任新建县丞，定居丰城。

陈宝箴之死，令陈三立五内如焚。国忧家难，齐涌心头，他含泪在《先府君行状》中自责道：“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断魂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他为湖南新政中断而悲，为当年向父亲推荐数人以致连累老父而疚恨，为自己未能侍奉父亲终老而伤心自责。

1900年终，办完丧葬之事的陈三立方才返回江宁。1901年3月12日，春寒料峭，陈三立致信人在上海的多年故交汪康年，他在信中说：

前以先公大故，猥承唁賻，奔走余生，未遑答谢。岁终毕葬，还金陵，乃稔年伯母亦竟弃养，何彼苍厄我两人之酷邪？国变家难，萃于一时，集于一身，呜呼……穰卿尚何言哉？又念君之贫窘，无以异我，丧葬之费，其何所出，尚有端绪否？临风缀泣，殆不自胜。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西方列强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清廷别无选择，一概照允，庆亲王奕劻、李鸿章等参与谈判，最终签订《辛丑条约》。根据八国联军要求，清廷将参加庚子之乱的一些王公大臣陆续诛杀与革职，并为袁昶、许景澄等昭雪平反。陈三立时在南京，他闻讯之后，百感交集，感怀时事，八骏西游，关河中断，诛杀“晁错”，残局难收，赋《书感》一首：

八骏西游问劫灰，关河中断有余哀。  
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  
补袞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  
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来。

此诗是《散原精舍诗集》中的第一首，所谓开篇之作，古典今事，熔为一炉。多年后，陈三立应袁昶后人邀，为其文集作序，再次评说袁昶这一当下“晁错”在当时的情势之下敢于直言劝止慈禧太后的凛凛风骨，并不人云亦云的难能可贵。

陈三立正在忧愤之日，黄孟乐来访，他出示《纪愤》诗，激起散原强烈共鸣，诗思奔涌，和答抒怀。陈三立痛恨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更痛恨当权者的颛顼昏庸一意孤行，他作《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九门铜驼，烽火秦关，指鹿为马，道旁豆粥，描画慈禧太后仓皇出京西狩西安的狼狈不堪，且看散原诗的其一：

九门白日照铜驼，烽火秦关惨淡过。  
庙社英灵应未泯，亲贤夹辅定如何。  
早知指鹿为灾祸，转见攀龙尽媿媿。  
恍惚道旁求豆粥，遗黎犹自泣思波。

条约签订，似乎危机消除，但，八海兵戈，仍在禹甸，苞桑无计，白发疏灯，梦醒无路。

1901年3月29日，又是一年春和景明，陈三立到南京下关乘船赴南昌西山为父母扫墓。3月30日清晨，船发金陵，逆水而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陈三立躺卧床榻，迷迷糊糊，进入梦乡，他与父亲在靖庐静坐闲聊，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熊希龄、江标、徐致靖，他所推荐的喋血菜市口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还有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物形象一一浮现；陈三立还说到有人写一联讽刺陈宝箴、熊希龄，陈宝箴笑着说，说来听听，陈三立犹豫了一下，说道：“四足乱动，究竟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陈宝箴呵呵一笑说，说陈道熊，还挺生动的嘛。散原

梦中醒来，不无怅然，轮船停泊在吴城，他探身船外，只见月亮高高直悬在孤篷上空，映在水中的星星随着轻缓的波浪而移动，灯光映照着喧闹的渔港，他睡意全无，作《夜舟泊吴城》：

夜气冥冥白，烟丝窈窕青。  
孤篷寒上月，微浪稳移星。  
灯火喧渔港，沧桑换独醒。  
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

家国之痛，万念俱灰。此后，陈三立又移居金陵青溪河畔复成桥侧，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此后几乎每年清明、冬至，陈三立沿江而行，奔走于苏赣之间，追怀父亲，留连山水，留下大量诗文，其间除了辛亥革命他避居沪上外，直至他的妻子、长子于1923年先后在南京病逝，他移家杭州与上海，这一奔走在长江之上的歌祭告哀长途，才算大体上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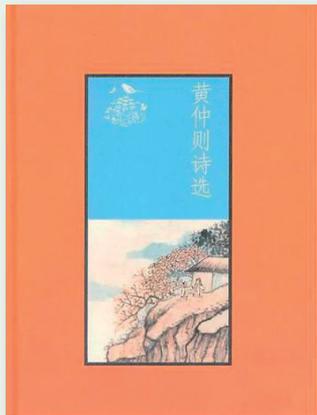
如今，西山仍在，靖庐无存，陈宝箴夫妇墓莹已无踪迹。陈三立墓在杭州牌坊山，陈寅恪最终葬在庐山。三山相望，九泉相通？有人说，“散原集中，凡涉靖庐之作，皆真挚沉痛，字字如迸血泪，苍茫家国之感，悉寓于诗，洵宇宙之至文也”。现如今，唯有文字留存，故纸犹香，让人想望义宁陈家的风流宛在。

王振羽 国家一级作家，凤凰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 半世癫狂谁念我

## ——诗人黄仲则的一生

III 周俊炜



黄仲则诗选书影

### 一

1749年，乾隆十四年，黄仲则生于高淳县，小名“高生”。父亲黄之琰，县学的秀才(邑庠生)，曾娶两任妻子，原配吴氏生了长子庚龄，继室屠氏生了次子仲则。祖父黄大乐也是秀才(岁贡生)，是高淳县学的训导。虽然几代人没出过什么大官，但还是书香一脉、秀才世家。仲则本名景仁，自号鹿菲子，乡里人因他脸色发黄，称他为“黄面瞿昙”，也就是黄脸菩萨的意思。

仲则4岁时，父亲去世，终年40岁。祖父母年事已高，哥哥幼弱，持家的重担全落在母亲屠氏一人身上，每天纺纱织布直至深夜来赚取家用，还要督促两个孩子读书，生活十分艰辛。

7岁那年，祖父带着全家回到武进，定居在县城中的白云溪北，也就是今天的白云渡北岸。仲则是个聪明孩子，5岁就能识字，8岁已能写出像样的八股文。16岁，仲则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成功，他通过了童子试，成为诸生，也就是秀才。仲则是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的。洪亮吉曾说起这次考试：“学使者主持的岁试和科试，武进参试的童生多达三千多人。”他还说：“仲则拔了

头筹，常州知府潘恂、武进知县王祖肃都非常欣赏他。”他俩的赏识是对仲则才能的肯定，成为少年仲则自信和骄傲的资本。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初七日，他的异母哥哥黄庚龄去世了，才25岁。父亲及哥哥的过早离世，似乎已显露了家族基因的缺陷。

### 二

17岁，仲则通过了考试，成为常州府学的附生。府学和州、县学统称为儒学，是区别于私塾的官学。学生分为三等，廪生、增生、附生。廪生是官费生，每年供给“廪饩银”；增生是普通生，附生是刚入学的新生。生员每年都要考试，目的是奖勤罚懒，不令其怠误学业，考得好则可以“补廪”，也就是升级。是一种积极的上行机制。但仲则似乎并不感兴趣，并没有在学习中有所建树。他很少参加由学使(省官员)主持的岁试，从未升级补廪，一直处于新生等次。

第二年他去了龙城书院，与一班儿时的伙伴成了同窗。在一次去江阴赴考的船上，借得了洪亮吉的一册汉魏乐府诗集，读后如梦方醒，知道

世上还有如此与自己意气相契的东西。略一试笔，竟让洪亮吉十分叹赏，惊为天人。随即两人订交，成为割头换颈的兄弟。

在龙城书院，他遇见了一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老师，邵齐焘。龙城书院是明代隆庆年间所建，是常州八邑子弟的读书之所。邵齐焘是常熟人，乾隆七年的进士，官至翰林编修。老先生是个识才的人，非常欣赏仲则和洪亮吉的才能，邵先生对仲则的帮助不仅是专业上的，还是全方位的，包括目标、方法、价值观，乃至身体健康。他勉励仲则：“生身一为士，千载悲不遇。所籍观诗书，聊以永其趣。”“家贫士之常，学贫古所虑。”一个读书人能否遇到好机遇是不一定的，但认真读书却是必须的；家中贫穷是读书人的平常事，学问贫乏才是读书人要担忧的事。“努力年少时，白日不留驻。”是另一版本的“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在看了仲则的诗后，赞叹之余又写道：“盖以汉镞(仲则)质材之美，而充之以学，其所造岂可量占？然以其体弱多病，又不欲其汲汲发愤以罢撤其精神，而弟劝以博观泛览，悠游而自得焉，则与进学养身均有助矣。”如果仲则能以个人天赋再加以后天努力，成就将是不可估量的。但因其身体不好，并不想让他在学习上劳累过度，所以劝他随心所欲地阅读、游览即可，对长进学识和增强体质都有帮助。邵先生的关心兼具着严父慈母的特点，这对童年就缺乏父爱的仲则真是春风雨露，或许，情感上的获取还要大于学业上的帮助。仲则说：“我生受恩处，虞山首屈指。我愧视犹父，视我实如子。”

但两年后，迫于生计，仲则离开了龙城书院。不多久，邵先生也去世了。没有了知音，仲则说：“公卒，益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

三年间，他去了四明山、钱塘江、黄山，并由安徽去湖南，登衡山、游洞庭，再涉长江而归。

写了大量的诗，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但此时，家中更为贫困，他只能回家后再离家，去作“负米游”。其中，他两次应江南乡试(1770年、1771年)，均未成。

他去了安徽天平知府沈业富处。沈业富，江苏高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爱才乐育，培养气类，殆于性命休戚其间。官翰林，不通谄谒，而与后生末学，有一艺之长，则称道不去口实。”仲则在那里辅导沈公子在廷的诗文课，与沈在廷成了好友，还结识了一帮才识之士，如后来赫赫有名的章学诚、汪中、顾九苞等。他们“初未为人识，先生(沈业富)望气先识”。

1771年底，著名学者、安徽学政朱筠巡视天平，拜访同年沈业富，听说仲则正在沈幕，便投了拜帖，仲则随即赶来，以弟子礼拜见朱大人，并成了他的幕宾。随同朱筠的各地视学中，仲则游历了很多地方，也留下了一生最牛的回忆，写下了著名的长诗《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笥河是朱筠的号。朱筠的儿子朱锡庚正身逢其会，记录了仲则当时的风光：“时方秋霁，先大夫召客登翠萝峰，张宴太白楼下。甫设宴，黄生独离席立于悬崖之巅，江风吹衣，飘飘有凌云之致。即入座，座客曰：‘今日不可无题咏。’黄生从容出素纸为长句，洒洒百余韵，酒未阑而成，激昂壮丽，咸谓谪仙复生，于是座皆搁笔。”被誉为李白再世，当然一派独领风骚的气象！仲则的朋友左辅记载：“学使尝游宴太白楼赋诗。时宾从数十人，皆一时名彦，仲则最年少，著白袷，颀而长，风貌玉立，朗吟于夕阳中，俯仰如鹤，神致趋旷。学使目之曰：‘黄君真神仙中人也。’……一时士大夫争购白袷少年太白楼诗，由是名益噪。”

这是在朱筠那里的第二年。24岁的仲则无论品貌、才学都足以颠倒众生，但一年后，败象

生起。吴蔚光《素修堂遗文》卷三《黄仲则诗序》记载：“汪子剑潭曰：‘仲则为人长身疏眉秀目，性情异绝俗，然其举止往往类童稚。曩从朱笥河先生安徽使院与仲则语，一日中记其自相矛盾者什九。……至酒酣谈辩间发，人士满座，而仲则忽僵立如槁木。乃或偃仰身世，欲相对泣下，而仲则持一竿跳掷下阶，效横刀舞鞘，嚶唳颠倒自乐，人笑之。余观仲则良然。’”动作夸张，是他的风格，但却不合辙。

他要离开，选择的却是一种独特的方式，洪亮吉记述：“居半岁，与同事者议不合，径出使院，质衣买舟，访秀水郑先生虎文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标格如此。”不辞而别！原因只是同事的讥嘲，甚至卖了衣服以换船钱，真是率性得可以！

### 三

1775年12月23日的傍晚，黄仲则到了京城。26日，朱筠偕同翁方纲、程晋芳、吴蔚光等在陶然亭设宴为他接风。诗酒唱酬，不亦乐乎。

第二年春四月，因为平定大小金川的胜利，乾隆除了告祭永陵、福陵、昭陵外，还亲自到山东谒了孔林，回京举行郊劳盛典前，在山东、天津进行了两场召试，对前来“忭颂抒诚、进献诗赋”的文人作了测评，分为两等赏赐，以示对天下读书人的恩典。仲则参加了天津的“进献”，被评为二等，“俱著赏缎二匹，以示庆惠士林之至意。”（《清实录·高宗实录》）不高的排名，微薄的奖品，与仲则的内心期待有了巨大的落差，他在给吴蔚光的诗中写道：“所恃惟毫锥，作计已居亚。”对考评结果感到郁闷。

但召试还是给了他实际的好处，一个月后，乾隆指示，此次召试所取二等的举人、贡监生员

“有愿在四库全书处效力，俱准其誊录上行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仲则就此当上了四库全书的誊录生。这是一份薪水不高、却是没有风险的工作。

有了稳定的收入，有着广泛传播的知名度，更有朱筠等大佬们的提携帮衬，仲则在京城的生活如鱼得水。仲则也遭遇了这个坎——科考。科考不成，无法出仕，以至于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了问题。1780年，三十二岁，又是一次科考不成。除夕这天他写了长诗《除夕述怀》，自己的窘状在诗中表露无遗，“岂宜便绝风云路，但悔不为田舍郎。”屡试不中，他已有了悔意，似乎当个种田汉才是自己的归宿。京城之梦随着科考之梦而破灭。

1781年夏，毕沅正任陕西巡抚，孙星衍、洪亮吉已先后去了他的幕中。毕沅，字秋帆，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公爱士尤笃，闻有一艺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洪亮吉）因此，仲则也随后赶去。陆继辂《春芹录》记：“秋帆官保初不识君，见《都门秋思》诗，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好事惜才，亦佳话也。”是说毕沅读到仲则的“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大为感慨，随即送金邀请他来陕。毕沅还为他出资捐了个八品小官——县丞，当时，誊录生的资格，只要再愿意出一笔钱，便可折算成功名。用钱买官，以前出现这样的念头对仲则来说都是可耻的，但现在已经顾不上了，一个芝麻绿豆官都会带给他不少安慰！“君言少贱耽自忧，欲为卑官已不羞。”（洪亮吉）在毕沅处待得不久，仲则于秋天便匆匆返回京城，为要保住饭碗，去应付年底誊录生资格的考核。他与洪亮吉在华山分手，那是他俩生前的最后一面。

回到京城，朱筠已在半年前去世，没有人再

对他关怀备至了。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他欠下了很多债。贫病交加，他的行为也愈发乖张了，那些以前的朋友都慢慢地疏远了他。

1783年2月，他感到了那些债务的沉重，便拖着病体逃离了京城。一个月后到了山西运城，沈业富正在那里任盐运使。路途辛劳，加之肺病已入膏肓，汤药无效，四月二十五日(公历5月25日)，仲则离开了人世。“岁在癸卯，黄君景仁以疾卒于解州。”洪亮吉时在西安，接到噩耗，急忙赶去。沈业富为他操办了后事，毕沅、王昶送了很多钱，“厚赙之”，请扶棺柩返乡的洪亮吉带给仲则的母亲，毕沅还为他辑录了诗集。“盖数公者，于君皆始终礼爱之，为近今所难及。”(洪亮吉)

生前的许多朋友以不同的方式做了悼念，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其中不仅是友情的关系，更是“君之才有以致之也”——他的才能当得起！

#### 四

仲则是个诗人。

他的诗宗法唐人，有着杜甫、韩愈的影响，本质上更接近于李白，是诗的“正宗”。“惟李唐作者，可谓大成……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能写出很好的近体诗，但更擅长于古体诗。相对的自由，给了天才型诗人更感性、更随意的发挥——犹如李白，恣肆跌宕，洋洋洒洒，浩浩万里。吴蔚光评他：“工为诗，歌行近鲍照，五言近谢眺、杜甫，七言长句洎律体神似李白、东坡，而一二近昌谷。”

二十岁时的浪游给了他游历名山大川的机会，在湖湘山水的宏博诡谲中，他完成了自己诗

风的塑造。“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洪亮吉)但他并没有满足。从江南到湖南，是沿着长江的蜿蜒，仍然是南方文化的特点，“自恨其诗无幽并气”，遂有三十二岁的西北之行，强悍厚重被注入诗中，弥补了阴有余、阳不足的缺憾。他能关注自己诗的风骨的打造，有着追求艺术高度的自觉。天才与常人不同的是：能看到自己前方的路，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的诗言之有物，能从生活中来，发肺腑之言，不同于清诗中大量的陈词滥调。他能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对景、对情作入木三分的刻画，让人感同身受。他将本来寡淡如水的清代诗词炒出了新的味道；将一个行将就木的艺术形式翻出了新意。仲则着实不易。

他的诗颇多警句，是深思熟虑推敲的结果，读后让人意犹未尽。洪亮吉将其总结为：“‘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豪语也。‘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裁剪’；‘足如可析似劳薪’；苦语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买得我拌珠十斛，赚来谁费豆三升’；隽语也。”这三语说尽了仲则诗的妙处，也道尽了他的人生甘苦。

他的词也很好，洒脱飘逸，似乎比诗更适合他的本性。但词被称为“诗余”，比诗低一个等级，最终没能被他当做主业，却仍能体现出他掌握不同艺术形式的得心应手。王昶有着十分精当的评介：“词入辛(弃疾)、柳(永)间，新警略如其诗。”诗词一体，对于天才来说是没有高低难易之分的。

周俊炜 原常州书画院院长，原刘海粟美术馆馆长。

## 董同龢：一位对音韵学有重要贡献的学者

III 侍建国



故乡常州的青果巷走出了多名语言学家。它是“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少年居住的地方，常州话是他心心念念的乡音，在很多重要著作里都以它为例。还有两位名人也跟这巷子有缘，一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他也是汉字拉丁化的倡导者之一。有人觅得20世纪30年代初扫盲用的《拉丁化课本》，把图片“屋子”拼成uz，“椅子”为iz，跟后来的汉语拼音很相似。还有一位语言学家是享年112岁的周有光，当年曾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纵观古今汉语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位大学者，他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界享有盛名、祖籍常州的董同龢先生。

董同龢生于1911年10月12日，病歿于1963年6月18日。董先生是江苏武进人，生于昆明，幼时回江苏，在如皋上小学，所以有人说他是如皋人。以上资料来自董同龢先生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时的门生丁邦新，丁先生祖籍江苏如皋，其硕士论文写“如皋方言的音韵”，董是他的导师；丁邦新这么说董同龢的祖籍，应是可信的。笔者又请常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朱隽先生查阅1927年刊印的《宜武董氏合修家乘二十卷》获知，董同龢祖父董若洵，常州府阳湖县人，光绪

十三年銜江苏如皋县教谕，二十四年登进士二甲。清代的县儒学为一县之最高教育机构，内设教谕一人、训导数人。董同龢的父亲董寅复，云南高等学堂毕业，指分云南使用盐大使，后任审计院核算官、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科员。董同龢的父亲及祖父在云南、如皋、北平的经历澄清了关于他祖籍地的混淆，他是昆明出生、如皋读小学、北平念中学。

董寅复任职审计院核算官后，董同龢随家迁北平，北平一中毕业后因病休养三年。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研习音韵学，学士论文为《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1936年清华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时考进的还有北京大学毕业的周祖谟先生。据丁邦新回忆，董先生说自己年轻气盛，史语所当年一道考题是评论国语罗马字，他对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系统大加批评。幸好赵先生气度宏大，愿意聘用这位唱反调的年轻人，并作为自己的助手。赵元任曾是王力先生的导师，日后董同龢给赵元任的书信必自称“再传弟子”。

这里加插一则学界广为流传的佳话。当年清华国学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四大导师，王力是赵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为《中国古文法》，梁启超对该文评价甚高，赵元任则提出批评。赵的批语是“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有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它针对论文的一个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在赵先生看来，西文包括多种语言，未精通这些语言的语法，不可轻易下这判断。从此“说有易，说无难”成了王力先生做学问的座右铭，它也是评价文史论文的一句经典。做学问讲求依据，对确实存在或出现过的论点（“说有”）比较容易证实；对某结论的否定（“说无”）却很难证明，抑或一时找不到证据，抑或研究者的认知不够宽广，所以做一个否定的结论更须谨慎。

董同龢进入史语所后随即跟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发表于次年，该书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中篇幅最大的著作。赵元任对董同龢工作的评价是“我们几个人作湖北方言调查的时候，他就是最得力的人员之一”。

董同龢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轶事亦为他人所记，《南渡北归》写到抗战期间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有人亲眼看见助理研究员董同龢跟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辩论的场合，作家岳南这样记述：

在这方面，作为专家的董同龢自然要比傅斯年懂得更多更精也更广，故石璋如所亲临的傅斯年与董同龢辩论场合，“在许多时候辩不过董。有时不知为一个什么问题，二人就开始抬起杠来，史语所的同仁就聚过来围观”。傅斯年眼看自己出现力不能支的颓势，就以“这个董同龢最爱抬杠”为名宣告败退。

1949年董同龢先生随史语所迁台，升任研究员，兼聘为台大中文系教授。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编写了《中国语音史》，于1953年出版，

构建了上古至现代完整的汉语音韵史系统，出版时因排印困难有所删节。1968年由弟子据遗稿增补，更名《汉语音韵学》，赵元任先生为其作序。董同龢1954—1955年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人，1956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1959年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一年。196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要请他去长期任教，董同龢却于那年6月因血管瘤引起黄疸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二岁。

董先生在台大的教学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据梅祖麟先生（前清华校长梅贻琦之侄）的回忆，他说高友工先生（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文学教授）本来在台大读法律系，有一天旁听了董先生的声韵学课就决定转读中文系，后成为台大中文系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梅祖麟曾问高友工的同学，聪明绝顶的高友工怎么会旁听了董先生一堂课就即刻变了志愿呢？他的同学认为高友工是被董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所吸引了，并说自己也是董同龢的学生，他最佩服董先生新颖、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笔者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的导师薛凤生先生，江苏邳县人，1949年跟随父母去台



1938年7月1日赵元任与四位助手在昆明，左起：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赵元任、丁声树。

湾，1957年台大外文系毕业，随即考入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他也修过董同龢的音韵学。那时董先生从哈佛返台，带回印欧语言学史研究方法的精髓。此后业师薛凤生亦转向音韵学，1962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专攻语言学，其博士论文1975年由Mouton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中原音韵音位系统》1990年在北京出版，赵元任先生曾对英文书稿提出修改意见。2021年5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薛凤生文集》，笔者作为常州人，且忝列董同龢、薛凤生门墙，有机会为故乡人介绍董先生的音韵学成果，也是纪念董、薛二位业师。末了，笔者尝试从常州话的“搭浆韵”解释董同龢对音韵学的重要贡献，说“搭浆韵”的正是赵元任和董同龢。赵元任在《汉语音韵学》“序”的一开头就对董同龢的学术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曾是自己遗著的理想序言人：从前有时候想到要是编印我的遗著时，找董同龢来给我写几句序倒也不错。没料到我倒给董同龢的遗著写序了。董先生一向非常谦恭，写信总签名“再传弟子”，因为在清华时候他上过王了一（即王力，笔者注）的课，王了一又跟我写过“两粤音说”的论文。俗语说青出于蓝，所以从这两代的蓝青的中国音韵学就结晶于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学”了。

在讲到董同龢对音韵学的贡献时，赵元任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传神之笔：他很早就有关于古音跟中古音的文章，例如在南京时候，他就有批评高本汉先生的《诗经》里的“搭浆韵”的说法把高老先生都说气了，到后来也觉得那批评也无无可取之处。在抗战期间，在那种困难情形之下，董同龢把一个多少时代大家莫名其妙的广韵重组问题，第一次才搞出个头绪出来。文中的“搭浆韵”是赵元任依据董同龢1938年的论文批评高本汉《诗经》有“自由押韵”的观点而创造的，窃以为董同龢应认可赵先生用家乡话所表达的

创见，高本汉的“自由押韵”就是忽略《诗经》的方音差异而糅合不同的小韵。常州话“搭浆”是敷衍应付的意思，本义指用浆糊黏搭破损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八回有“陶大人吃酒，菜是要好的，交代本家大阿姐，不要搭浆”。赵、董所指的“搭浆韵”并非马虎草率的韵，而是黏搭拼凑的韵，把“搭浆”原本的补救处借喻为古音学上相近却不同的小韵，以一方言词揭示了“多少时代大家莫名其妙的广韵重组问题”的破绽，难怪这让“我姓高，因为我本来是汉人，所以就叫高本汉”的瑞典人气得跳脚。“重组”的说法从清儒提起至今仍争论不休，赵、董二人从《诗经》的本质厘清了所谓“自由押韵”，两位现代语言学家将前代音韵学人的模糊概念澄清了。音韵学是一门“博古通今”的学问，其两大研究范式为考古和审音，“博古”即考古，“通今”即审音，后者包括利用各地方音探究古音演变。高本汉的“自由押韵”忽略了《诗经》的方音色彩，亦即考古的功力不足。董同龢先生精彩而短暂的人生，却培养出丁邦新、梅祖麟等著名学者，他们与业师薛凤生皆祖籍江苏，也都归骨于彼岸。当年师辈或自己或随家迁移海岛，但从印度传至中土的陀山鹦鹉以翅取水，飞上空中洒水，欲灭山火的家国情怀却一直埋藏心里。

侍建国 江苏常州人。先后任教于新加坡、美国、香港、澳门，现移居美国。

## 颐和路风情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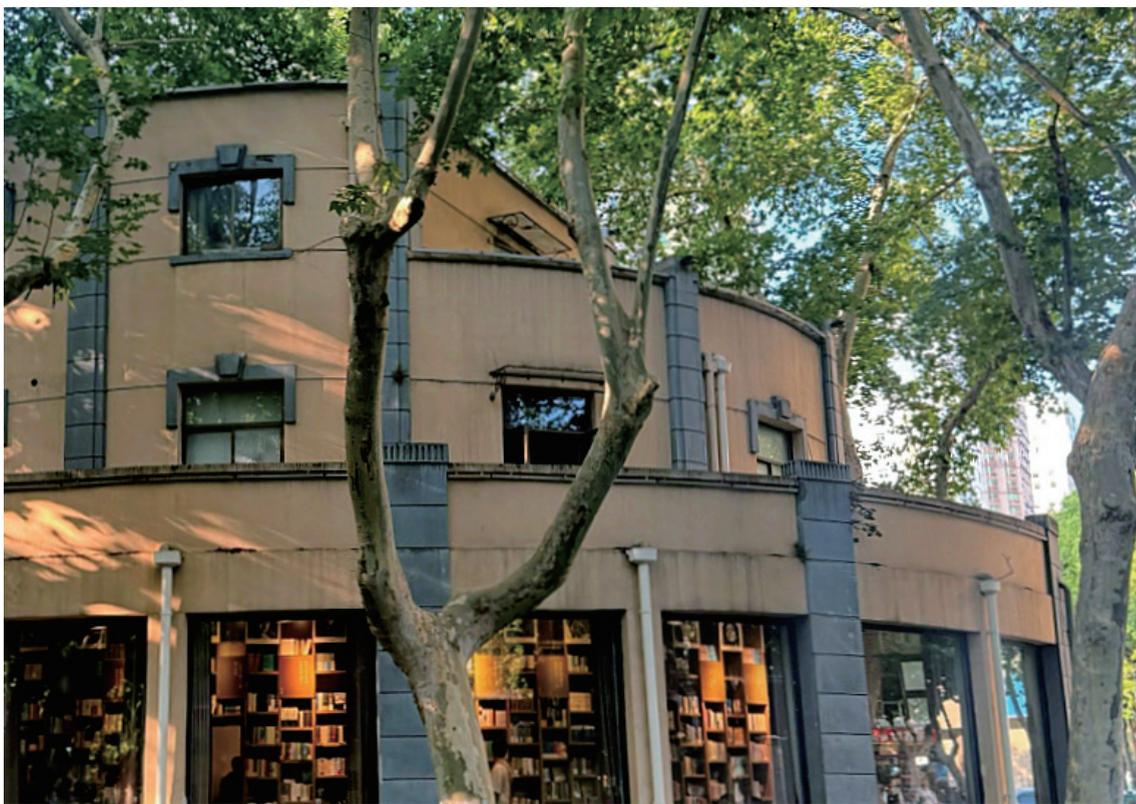
### III 杨应奇

#### 书 香

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这是一条路，更是一本书。颐和路确实与书有许多不解之缘，民国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达官显贵，也居住着一些读书人、写书人、教书人，这里也有书院、

书库、书社，曾飘荡着书香。

颐和路街区坐落着一所百年名校——南京市宁海中学。宁海中学的历史可上溯到1890年的“文正书院”，由著名企业家张謇先生创办。“文正”典出《荀子·王制篇》“积文学，正身形”；“文为才，正为经”。按古人说法，经天纬地为文，博



颐和路先锋书店



颐和路街区手绘地图

文多见为文，敏而好学为文；清正守法为正，守道不移为正，诚心格非为正。“文正书院”名以“文正”，意谓此地为长学问、学做人的内外兼修之场所。文正书院当年拥有大批资历深、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文正书院此后几经更名，先后名为“江苏省第四师范学校”“江苏省南京中学”“南京市师范学校”等，196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南京宁海中学。

颐和路18号邹鲁公馆建于1937年，砖混结构，西式风格。邹鲁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战友，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邹鲁的一大功绩体现在教育上，他受孙中山委托创办了广州中山大学，用10年时间将中山大学建成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邹鲁有诗曰：“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他一生撰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国国民党史稿》《汉族客福史》《环游二十九国记》《教育与和平》等专著。

在江苏路环岛上，如今一家书店成为南京网红打卡点，就是颐和路先锋书店。这是一栋南京

近现代重要的历史建筑，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曾是南京特别市第六区公所所在地。日军侵占南京期间，这里曾作为南京侵华日军宪兵司令部。1960年后这里用作鼓楼区图书馆。颐和路先锋书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图书种类以及令人着迷的景色，成为众多读者心目中的最美书店。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或茶，阅读一本书，任窗外车水马龙，徜徉在书的海洋里，宛若行走在大地上的异乡者。在颐和路先锋书店里，仿佛与窗外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无论是四季变换的风景，还是偶尔飘过的行人，都成为阅读的一部分，让阅读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

2023年8月，位于颐和公馆十二片区南门的译林书坊正式开放营业。这是一间由译林出版社与问象艺术空间联合打造的人文空间，为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新添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阅读打卡地。位于莫干路口的锦创书城即将开幕，这家书城又称之为“颐和城市客厅”。

颐和路这部百年光阴交汇的画卷里，藏着历史风云故事，也藏着文化书香。有人说：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他曾经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从水西门到颐和路上班已有五个年头了，几乎每天都会在这条路上走走看看，如同每天在翻阅一本书，这本书，常读常新；这条路，常走常新。

## 地 图

颐和路先锋书店里一款卡通版颐和路街区手绘地图，设计精美，图文并茂，民国建筑标注清晰，吃喝玩乐一看尽知，深受读者喜爱。如今，南京许多旅游景点和历史文化街区都有自己的手绘地图，这些地图留存着南京城市记忆，也让人们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京摄影爱好者陆钦

阳曾手绘一幅“南京民国公使馆导览图”，连同图片在微博上发布后，迅速在网上走红。如比利时使馆、荷兰使馆、国际联欢社……这些隐匿在南京大街小巷的民国公使馆，恐怕不少老南京也不一定认识，但在这张手绘地图上都可以找到。

南京颐和路街区红公馆临街橱窗里挂着一幅手绘地图，这是1928年南京共和书局发行的《最新首都城市全图》，绘制人罗云澄。有意思的是，此图下面用黑体大字标出：“版权所有，不许复制，每张大洋五角，欲知明晰，另购详细游览指南”。可以肯定的是，红公馆里这张地图就是复制品，不知有没有掏五角大洋！

在这张《最新首都城市全图》上，当时颐和公馆区域内建筑不多，仅有零星民房。颐和公馆区四面如今坐落着许多省级机关和高校，90多年前竟然是人烟稀少的丘陵山地，从最北边的狮子山一直到五台山，是一片连绵的山地，很少有住家，只有晏公庙、古林寺、清凉寺等寺庙和火药局仓库。地图上标注的清凉山、五台山为人所熟知，但诸如妙耳山、凤山、刘家岗、马家大山、蛇岭这些小山包的名字，早已淡出了南京人的记忆。

《最新首都城市全图》显示，一条小河从颐和公馆南门穿过，这是金川河的分流，西桥是当时河上的一座木桥。如今这里没有河，也没有桥，西桥成了一个路名，是颐和路街区的网红打卡点。这幅地图全图用湖蓝色铺底，用翠绿色描绘南京整个城市的水系，包括河流、湖泊、河塘。如今南京城市水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金川河一样，地图上的惠民河、进香河，现在也是有名无河了。地图上还有一个面积和莫愁湖相当的“西头湖”，如今也几乎无迹可寻。地图上城南地区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池塘，较大的有锅底塘、沙塘、九莲塘、荷花塘、王府塘、八府塘，如今也全部不见了踪影。今日南京繁华的河西地区，在这

张地图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水西门外至江东门有一条狭窄公路，两侧分布着散落的民宅，莫愁湖、南湖、西头湖一带都有堤埂。

老地图往往是一段尘封的往事，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岁月的变迁和城市的变化。为实施“首都计划”，南京市土地局1929年编印了《首都城市图》。这张老地图单面套色印制，比例尺为三万分之一，所用底图为军用或专用的地形图。其标示范围在“国都计划”中所划定的国都界线范围内，注记符号极其详尽，包含的信息量丰富，从右下侧的图例中可见各类符号达五十八种。在民国时期出版的众多城市地图中，如此之多的注记符号实属少见。

《南京旧影·老地图》一书中收集了中国人绘制的第一幅南京城地图，就是《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1903年，江南陆师学堂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委派毕业生钟丙熙、李德霖手工绘制。地图中地名用蝇头小楷标注，湖泊、山峦、街巷用水彩勾勒，虽年代久远，仍逼真清晰。地图不仅用红线清楚地再现出南京明代城墙全貌，而且还标明了每座城门的具体构造。通济门、汉西门、水西门、聚宝门都分别用红线画出了瓮城的结构。

南京图书馆收藏许多不同时期的南京老地图，这些地图上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线条都在向人们讲述故事。《南京市街道详图》是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初绘制的，地图上建筑物标注非常具体实时。如原本用商号命名的下关各个码头，被冠以“国营招商局”字样；国民政府更名为总统府，国府站更名为总统府站。当时新街口不仅是商业金融中心，也是新闻中心，地图上的中山路沿线出现了美国新闻处、《中央日报》、中央宣传部等机构。《南京市街道详图》是折叠式的，可放入口袋，封袋也就是粘在地图背面的一张32

开大小的彩纸，上面标注着金擎宇的名字。大多数人对金擎宇都会觉得陌生，其实，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国人，几乎全是看着课本里他编制的地图长大的。为配合前线抗战和社会大众的需要，金擎宇和他的两位哥哥创办了亚光舆地学社，就是今天的地图出版社的前身。亚光舆地学社编制了《袖珍中国分省详图》和《世界分国详图》等，由于版本玲珑，内容详尽，图后附有简要说明，一经问世，行销全国，经不断再版供应。

地图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舆图”，“舆”者，车之底座，是载物的意思。虽然如今外地人来颐和路大多用手机导航来识别线路、寻找目的地，但这些老地图留存着岁月的痕迹，用无声的语言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信息。

## 先生

南京颐和公馆曾编辑过一本《颐和文学季刊》，其中第二期上有篇题为《先生迟迟归》的文章，介绍了纪录片《先生》中十位先生与南京的渊源及与颐和路的精神契合。《先生》是一部大型教育纪录片，记录了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胡适、蔡元培十位先生的生平事迹与精神风貌。民国时期的这十位先生，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更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他们的风骨和精神，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宝贵财富，也是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力量。这十位先生均在南京留下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汇文书院与其他教会学校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先生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南京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理念试验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怀揣教育救国理想，立志“乡村学校应当做改

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于1927年3月，在南京栖霞区晓庄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试验乡村师范——晓庄师范，开启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和理念研究，在南京播下了现代教育的火种。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陶行知还是南京民盟的创始人。

位于南京颐和路街区附近的青云巷41号，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这里原为民国时期杰出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公馆。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尤其重视体育，是最早在中国宣传并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家，也是中国最早、最具影响力的篮球运动推广者之一。1910年10月，张伯苓等人在南京筹办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设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等四个项目，张伯苓任裁判长。在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的前言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把张伯苓先生同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相提并论：“张伯苓与顾拜旦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与顾拜旦一样，首先也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位体育家。在提倡普及与参与体育的同时，把教育同体育结合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

马相伯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震旦大学的首任校长，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辛亥革命前后，马相伯被任命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在任期间，大力发展中国教育。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特意将他接到北京，想借他的名声笼络社会精英。当马相伯看清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后，痛斥他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随后隐居上海，不问世事。1939年4月7日，马相伯迎来了百岁寿诞，举国关注。国民政府颁发嘉奖令，延安方面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就连时尚杂志《良友》

画报，都破例舍弃时髦女郎，改用马相伯照片作为封面。

南京颐和路附近的头条巷，是一条连很多老南京人都不熟悉的小街巷。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寅恪先生就是在这条小巷里长大的，曾在这里接受基础国学教育。此后出国留学每次回国省亲，他总会来到南京。其弟子蒋天枢教授所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先生假期返南京”“登江舟还金陵”“暑假还南京”“回南京省亲”“孤身返金陵旧居”“侍父母居南京”一类的记载很多。陈寅恪中年以后虽然很少来到南京，但对南京却一直含有深刻感情。这位国学大师一部另类代表作《柳如是别传》，就是以“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为传主，褒扬这位秦淮名妓的不屈风骨，也反映了他对南京历史的关注。

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从教和从事气象科研工作，都起始于南京，与南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20年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创建东南大学的地质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和世界地理等课程。同时还在南京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气象台，出任所长，直到1936年赴浙江大学任校长时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前后在南京工作17年之久。如今南京大学有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气科学学院和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这三个学院的创始人都是竺可桢。1932年，他撰写的《南京气候》一文，将南京与国际同纬度地质作对比研究，揭示了南京因季候风影响，以致形成冬季特冷、夏季特热的气候特征。这一研究开创了我国地方气候研究的先河。

此外，纪录片《先生》中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也都与南京有很深的渊源，或在民国南京政府任过职，或在大学校园

教过书，或在街头参与过新文化运动，或为南京古城赋过诗、留过墨。

何谓“先生”？“先生”何为？“先生”一词由“先”与“生”二字组合而成，字面意为“先出生的人”，最初指父兄或长辈，后演变为对有学问、德行之人的尊称。“先生”是一个称谓，也是一种修为。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清末至民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先生”逐渐成为对成年男性的普遍尊称，类似英文“Mr.”。郎君、官人、相公、老伴、老公、当家的、孩他爸、老头子……无论怎么称呼，都不及一声“先生”，尊重而文雅。“先生”一词也是对杰出女性的最高礼赞，用以表达对女性的敬意和认可。宋庆龄、何香凝、冰心、林徽因、张爱玲、吴贻芳、杨绛，这些被称为“先生”的女性，以学识与品格诠释了超越性别的敬意，是人们对德才兼备者的永恒推崇，她们与南京也有着深厚的渊源，也有许多风范故事。

先生迟迟归，风范代代传。颐和路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留存着许多民国故事，也留存着“先生”们的风骨。来颐和路走一走，或许跨越时空遇见“先生”。致敬先生！致敬颐和路！

杨应奇 现工作于江苏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组，著有作品《牌楼巷思语》《水西门印象》等。

## 文学福地“老门西”

III 速泰春

文化是“老门西”的底色和灵魂。

文学是“老门西”的彩霞与亮色。

文学是门西文化的组成部分，占有重要分量与位置。文学与门西纠缠千年，留下许多绝世佳作，或振聋发聩，或义薄云天，或情深意浓，或意味深长。文学中的门西，门西里的文学，互为渗透，互为融合，互为一体，互相成就，是“老门西”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门西文学”，丰富而多彩，厚重而醇甞。

“老门西”，可谓文学的福地。

### “老门西”的文学景象

2019年10月，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是文学之都，名不虚传。小说、诗歌、典论、戏文，“南京文学”出类拔萃，实至名归。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最早的诗歌评论著作《诗品》、最早的绘画理论作品《画品》、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最早的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最早

的集宋词大成之作《全宋词》……都诞生于南京。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门西，自然也沾光添彩。在上述文学名著中，大多可以找到门西的碎影。南朝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清代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这些举世闻名的文学读本，更是直接与门西息息相关。

#### （一）文学成果灿若繁星

与“老门西”相关的文学成果，可谓多之又多。小说戏曲、诗词歌赋、文论经典，民俗方志，民间传奇，灿若繁星。在门西产生的诗词难以统计，几乎历代都有名家诗作问世。唐代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杜牧的《清明》、崔颢的《长干曲》最为世间耳熟能详，宋代杨万里的《登凤凰台》、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陆游的《登赏心亭》，清代郑板桥的《念奴娇金陵怀古：长千里》、王士禛的《瓦官寺》等等也在文坛声名赫然。《世说新语》中有多篇反映“老门西”的人和事，《红楼梦》中有超过千字直接描写了“老门西”。著名戏曲《桃花扇》，更是与门西密切相

关，戏中的反角阮大铖正是门西石巢园的主人。明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民国夏仁虎的《秦淮志》、潘宗鼎的《金陵岁时记》、卢前的《明清戏曲史》、仇垚的《鞠燕词》，包括阮大铖的《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无不文采飞扬，举世称绝。

### (二)文化名士流连忘返

“老门西”是历代文化名士的“朝圣”之地。六朝以来，有太多的文化人在这里吟诗作文，奋笔疾书。看一看历代有多少大家在门西留下的诗篇，我们不能不为之触动。除了上述一众大诗人，还有写过《南乡子》的宋代名臣王安石，写过《金陵赏心亭》的宋代政治家王琪，写过《沁园春》的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等等，这些赫赫名家都为“老门西”留下了笔墨。清末民初著名方志学者陈作霖在其著作《凤麓小志》中，列有30位与门西深度关联的文化名士，其中包括东吴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论语注》)，西晋的陆机(著有《文赋》《辩亡论》)，梁朝的伏曼容，南唐的孙晟，宋代的侍其瑀，无一不是大名鼎鼎，文才惊天。而顾起元所交文友多达五十余位，同样各有神通，驰名天下。诗仙李白，更是对门西情有独钟，多次光临，除登临凤凰台观景，与老友举杯畅怀，更多的是在此借景思古，抒情展绪，忧心天下。如此众多的文人名士在门西进进出出，足见门西的诱人魅力。

### (三)文化土壤肥沃厚重

“老门西”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独特又少见。这儿的文化土壤肥沃厚重，滋养、成就、催动了多少作家、著作的诞生。这儿既有顾起元一类的个体学者，也有愚园一类的群体性文学结社；既有写出《本无异宗》的高僧法汰，也有写出《文赋》的奇才陆机。明阮大铖则是个奇特的文学现象：作为一个被公认的大奸臣，他的政治经历直

接被《桃花扇》取材，作为反派人物入戏；但是，在戏曲创作界，他的作品却被公认为顶级水准。

“老门西”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之地，有“城”之日就有她。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东吴建都之后，“老门西”顺势而为，快速发展。“老门西”的历史进程，多与经济繁荣相伴。南京是十朝都城，有长达450多年都城史。都城，集政治、经济、军事、行政、教育、宗教多重文化之中心，是人文荟萃和商贾云集之要地。《南京通史·明代卷》称，大明时期南京城户籍人口有五十万，而“老门西”人口密度始终最大。南京多次历经战乱，但战后社会总能迅速恢复元气。这些因素都对“老门西”产生了直接影响，也为“门西文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养。南京长期处于天下文枢之位，“门西文学”深植于南京文化沃土之中。“老门西”交通便利，水陆相通，交流顺达，也是促进文化交流、文学互动的重要因素。历代文人过往金陵，不登凤凰台，不进瓦官寺，不入杏花村，不拜阮籍衣冠冢，不上赏心亭，定是一件憾事。一拨又一拨文化人长期、高度集中，有意无意助推“老门西”文化生态，令其文化土壤不断增肥加厚。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产生丰硕文学成果，一点也不奇怪。可以说，“门西文学”是“南京文学”一块极具代表性的高地。

## “门西文学”的主要成就

所谓“门西文学”，是指与门西相关的文学——或在门西诞生，或因门西产生的文学作品。如此归类，或许不够科学不够准确，但这些“文学”的关键因素在门西，是不能否认的。

所谓“门西文学”，包括所有文学类成果，诗文、论著、经文、小说、纪实、传奇、随笔、成语，甚至家书、门联、日志，都可划入其中。因顾恺

之而出的成语“点睛之笔”“渐入佳境”，清末纺织业巨头魏家桦的家书，流传门西的民谣《一个小老头》（一个小老头，戴个草帽头，衔个香烟头，拐个箬箕头，鞞个破鞋头，跑到小门口，买包牙蚕豆，越嚼越有味。）等等，都能让我们感受“门西文学”的韵味。陈作霖在《凤麓小志》中提及的黄庭坚《保宁寺练光亭题辞》、叶梦得的《保宁寺轮藏记》、郑之翰的《重修谢将军庙记》、刘叔向的《重建镇淮饮虹二桥记》、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记》、文翔凤的《游凤凰台瓦官寺记》、焦竑的《重建凤游寺碑记》等等，无一不是精品佳作。

顾起元一个人的著作就撑起一片文学天地——“经、史、子、集皆有涉猎”。据《明史艺文志》载：经部有诗类《尔雅堂诗说》四卷、四书类《中庸外传》三卷；史部有地理类《客座赘语》十卷；子部有道家类《紫府奇玄》十一卷；集部有别集类《顾起元文集》三十卷、诗二十卷。此外，还有《归鸿馆杂著》八种、《说略》三十卷、《鱼品》一卷、《潘方凯墨序》一卷，以及《懒真草堂集》二十卷、《蛰庵目录》四卷、《雪堂随笔》四卷、《金陵古金石考目》一卷，包罗万象，极为丰富，如同百科全书。

“门西文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诗词

我们翻看一下与门西相关的诗作便可知，数量惊人，水平可叹。难以计数的诗人诗作，构成了一座丰满奇异的“门西诗坛”。诗人中既有如李白、郑板桥那样的诗仙、诗怪，也有如苏东坡、辛弃疾那样的豪杰、志士，还有帝王爷乾隆，更有默默无闻的平头百姓，童谣、顺口溜也频现门西街巷，为门西诗坛锦上添花。称门西为诗情之地，一点也不为过。一座愚园，就留下清末民初四百余位名士千余诗文；一个顾起元，就写了748首诗（据南昌大学文学博士龙野统计）；一座

凤凰台，就出了350余首诗词（据“古诗大全”网集载）。“门西诗词”，咏物叹情，思亲念友，诗酒交错，天地感怀，反映了历代文人的思索与追求。怀古几乎是绝大多数到访门西的诗人们共同心结，且一个比一个强烈。杨万里在《登凤凰台》一诗中是这样表达的：

千年百尺凤凰台，送尽潮回风不回。  
白鹭北头江草合，乌衣西面杏花开。  
龙蟠虎踞山川在，古往今来鼓角哀。  
只有谪仙留句处，春风掌管拂蛛煤。

而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诗中如此抒怀：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悲壮之势，气吞山河。

其二，纪实

所谓纪实，即有依据的文字记录。纪实类作品是“门西文学”中重要部分。纪实体主要表现在描写上层生活、百姓生活，以及物产、地理、民俗等各个方面。忠实准确的记录，生动详实的描绘，细腻透彻的分析，不仅为南京、为门西的文化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载，同时形成了“门西文学”的一大特色。《世说新语》有为数不少的门西人文记录，仅瓦官寺就有多篇。明代纪实大家周晖，其著《金陵琐事》（包括《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曾深深影响文坛，其中不少篇章记录了门西故事。清代金陵出了多位纪实名家，袁枚、龚乃保、甘熙、陈作霖，他们的笔触也

频击门西。清末民初，本地名家程先甲二十一岁创作的鸿篇巨作《金陵赋》、著名乡邦文化学者潘宗鼎以88条目再现清末民初南京风俗的《金陵岁时记》、国学大师夏仁虎以十二卷的规模细数清末民初南京生活的《秦淮志》，这些本土文化名人用饱满的笔触记录南京民俗之时，无不深入地描绘过“老门西”。这些纪实大家，讲述南京、门西故事，细致精准，构图生动。《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关于瓦官寺的故事，很有意思：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可以看出，主客在言谈之中锋芒毕露，瓦官寺高僧对答如流，外来和尚多次被驳倒。孙绰不解：林公既然是胜方，为什么没有胜利者的样子？而林公表示：白檀香并不是不香，只是逆风时闻不到而已！胜者不喜不狂，反而指出对手的长处，活灵活现写出了瓦官寺高僧的气度与胸怀。

其三，传奇

“老门西”是个出传奇的地方。所谓传奇，即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门西街巷中，许多巷名的背后，就有一个故事。其中许多故事广为流传。如钓鱼台，说的是东吴孙权与宠妃潘夫人游憩，在此钓得大鱼而得此名，留下了一段帝王的浪漫爱情故事；如饮马巷，说的是宋高宗逃难中因坐骑口渴止蹄，后在此找来饮水而解困，留下了一则帝王遭遇不堪的尴尬故事；如船板巷、柳叶街，还有“百猫坊”，说的是明朱元璋为防开国

重臣俞氏家族“通海成精”而采取的极端措施，留下了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恐怖故事。

“门西传奇”中有不少“励志”故事。孝顺里，说的是清末江宁太守李璋煜，在此教育不孝之子，令其改邪归正，因而有了巷名；学智坊（原名孝子坊），说的是清同治间，苏州知府、胡家花园主人在自家门口立牌坊，以公益广告形式施以教化，因面对该巷，获名孝子坊（后改为学智坊）；陈家牌坊，说的是清代门西陈氏家族28岁寡妇，面对族人贪其家财，逼其改嫁时，以死相拼，坚守家业，将其子培养成人，并考中举人。官府为表彰她敢于担当的勇气，立此牌坊，留下巷名。

“门西传奇”五花八门，不拘一格，同乡共井、谢公祠、百花巷、煤灰堆、崇恩街、五福街、花露岗等等，这些街巷都潜藏着各种故事，故事或有原型事例，或凭空创造，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中四处流传。

“门西传奇”各种版本的故事，是谁创作的？何时出现的？如何传开的？是阴谋还是阳谋？是娱乐还是政治？是教化还是随意？一切都无从定论，当然也无须定论。这些故事源于民间，不受版权制约，自由创作，随意传播，虽历经数百年，却从未中断，留存至今，生命力之顽强十分了得。

## “门西文学”的文化追求

文学的意义在于放飞自我，启示世人。文学的价值在于用美学、哲学、神学滋润世界，催化世界，改造世界。文学用文字或口语传播方式，宣示其或明或暗的文化追求。

那么，“门西文学”的文化追求有何表现呢？我以为，重点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真善美始终贯彻其中



陈作仪《凤凰台》

“门西文学”中的所有类别，所有篇章，所有文字，无不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们在享受那些文学时感受最深刻，体会最真实的心灵实践。“门西文学”的载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作者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追求。李白《长干行》著名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传达给我们的，远远不止一个温暖的场面，或情投意合的意境，更有那种叩击心灵，唯美唯真唯善的感动。杜牧的《清明》脍炙人口，四句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创造出的美感与境界，早就超越了我们对他物的关心。真实的描写，不仅令读者感同身受，更是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美如仙境的杏花村，即理想主义世界。一个巨大的美学镜像空间，如此这般地完成了。让我们再看看平头百姓留下的文字：戴启明先生在《故居大门上的对联》中列出的“谯郡世泽，注礼家声”“九居世泽，百忍家声”“爱莲

世泽，细柳家声”，不仅让我们从文字上感受美感，对于对联深刻的内涵也同受撞击。童润棣先生在《过年贴对子的讲究》一文中称其父是个“对子高手”。每逢过年，总要出新对子。如“勤能补拙，俭可养廉”，横批是“四季平安”；如“寿同山岳永，福共海天长”或“一进重门乐，万分喜气添”，横批是“双萱永茂”；父母房间的上下联是“喜夫妇齐眉同饮延年酒，乐儿女绕膝争压岁钱”，横批是五个“福”字；厨房的上下联是“烹调余五味，宰割备三鲜”，横批是“百无禁忌”；院墙后门贴的是“门外有天来雨露，院里留地种芝兰”，横批是“欢天喜地”。朴实的文字，传达出的是对至真至善至美的向往。

## (二) 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门西文学”的主旋律。这个现象在“门西诗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怀古”是历代文人在门西抒怀时表达政治态度一个重要的现象。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最具代表性。全诗八句五十六个字，以观景时所感而叹，将历

史变迁与民间传说相结合，摭志言情，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思考。这种以家国为上的态度才是诗作的核心。顾起元则是用“七征不起”的明确态度拒绝朝廷召唤，表面上远离政治，实则换一种姿态表明心志。在他看来，朝廷腐败、无能，完全不靠谱，自己绝不能掺和进去。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躺平”，而是将所有精力放在了民生，放在了“文学”上。他以超人的才情与智慧，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为历史留下了丰硕文化遗产。以雅集而名闻四方的愚园，则是用集体的方式表达对时局、对政治、对百姓，对民意的关切。数百位各界精英，相聚门西，以千余诗文，尽情抒怀，给门西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文库。园主胡恩燮给曾国荃的挽联如是感叹：

奇勋恢半壁东南，继文正培养承平，元老历三朝，古今有几；史笔表一门忠义，与惠敏后先殒谢，大江数千里，遐迹同悲。

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国家前途的关心。

### (三)持续不断的探求精神

探寻与求索精神在“门西文学”中同样表现突出，值得我们关注与重视。探求精神是“门西文学”的核心文化之一，体现了“门西文学”的创造性、开拓性、标新立异性。西晋陆机的《文赋》，打开最早的文学评论的大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堪称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石。“文章用赋的形式比较细致地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提出了文学理论上很多重要的问题，对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瓦官寺的高僧法汰(320—387)，开创了“本无异宗”学说，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他主张的“心学”，即“心会”之说，对中国佛教理论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佛教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两百年后，瓦官寺另一位高僧智页(538—

597)，世称“智者大师”或“天台大师”。他“一生力弘法华宗义及龙树教学，并以中国独特的形式加以体系化”。他提出的“五时八教”，综合佛陀的教法思想和经典内容，在释经判教上最具代表性，为外来佛教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清末文字改革运动积极推行者程先甲，在二十一岁创作的鸿篇巨作《金陵赋》，不仅为南京文化留下了重要文献，在赋体文学上也开创了新标杆新境界，“打开了城市文学、都会文明新高度”。而门西的民间传奇，更是以天马行空、任意随想、自由自在之风，创作出各种版本的口头文学，表现出“门西文学”创造精神的文化自觉。

速泰春 原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周末》副总编辑。

# 园林大师远去

## ——寻访朱有玠旧居

III 老 克

这些年，我经常爱去玄武湖转悠，随便拍拍，毕竟历史上是皇家园林，底子好，大树多，哪怕走错路也有好风景。我尤其喜欢玄武湖东岸的情侣园，好风景有个特点，就是耐拍。

走在十里长堤上，一边是湖光山色，令人陶醉；一边隔河相望，古意萧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对面的情侣园就像一幅宋画长卷。

我曾经是杂志编辑，看到好文章就会关心作者，同样，看到好风景，就会多方打听设计师是谁？经几次辗转周折，发现我喜欢的玄武湖情侣园，与一位已故的设计师朱有玠先生有关。

1919年，朱有玠出生在浙江黄岩的书香门第，爷爷是黄岩县乡贤，父亲是晚清进士，朱有玠从小受家庭文化熏陶，熟习诗词歌赋，喜爱绘画写字，年少外出读书，假期喜欢去苏州看园林，去杭州逛西湖。1945年，朱有玠本科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师从汪菊渊、程世抚等著名的园林大家，为从事园林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9年，朱有玠先后任南京市城建局园林处副科长，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3年，研究所更名为南京园林规划设计院，朱有玠是首任院长，他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园林规划



朱有玠(1919—2015)

设计工作：如玄武湖、珍珠泉、莫愁湖、绣球公园、浦口公园的规划，瞻园的维修，梅花山红楼艺文苑的参与设计，唐山震后的重建规划，中南海的绿化调整，日本大阪市友谊园中华表设计等。他还参与了国内诸多风景名胜的规划评审工作，如麦积山、泰山、华山、贵州红枫湖等等。上次我查资料，发现玄武湖网上爆红的“三色乌桕树”也是朱先生的创意。

南京是一座山水城林的城市，如今南京成为大家公认的网红城市，与朱有玠等一大批从事南京绿化和园林事业的人，有很大关系。二十多年

来，我生活在南京，赏风景、拍照片、写文章，享受了这座“滋养之城”的许多文化福利，而像朱有玠这样的先生，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一位退休的文化记者，自己不写点文字，心里说不过去。

感谢南京市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李平等朋友的帮助，让我有机会拜访坐落在玄武湖附近朱有玠先生的旧居，朱有玠的女儿、原市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朱道萸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

朱有玠与左大珉、洪达瑜、李继芬、陈璐等老一辈他们五人不仅是设计团队的好伙伴，更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的友情维系了一辈子。

这次采访，我在网上特意买了那本《岁月留痕——朱有玠文集》，比如那篇《南朝园林初探》，不但对南朝风景名胜、私家园林和宫苑作了区分，让我还了解到玄武湖沿湖边是成片的皇家园林，比如南岸的华林园，北岸的乐游苑，西边的玄圃和东田小苑等。还有那篇《园冶综论》，对“因地制宜”“意境”“丘壑”等概念有非常精妙的解读，是我见到解读计成《园冶》最好的文本。

以上文字我想表达的是，朱先生是站在历史长河中，吸收传统文化和造园艺术精华，因地制宜，“继承和展望”来做设计。

与朱有玠同事三十年、已经去世的陈璐老师也许对他最了解：“他工诗文能书画，学识渊博，设计中强调创新，最厌抄袭。对如何总结前辈造园技法为今所用，有独特见地”。

朱大姐说，父亲平时在家就是坐在书桌前，看书、写文章、练毛笔字，兴趣高时，还会写写古体诗。退休后在家他还爱上种花，喜欢到南京许多园林景点游玩。

1984年，南京植物园(情侣园)获国家优秀设计奖。1989年，朱有玠荣获建设部授予“园林设计大师”的殊荣。2015年6月，朱有玠先生驾鹤

西行，享年96岁。

在朱有玠先生的房间，墙上挂了几幅画作，很文气，很有古逸气息，我开始以为是朱先生画的，朱大姐告知这是她弟弟、著名画家朱道平的画作。同样，朱道萸老师是优秀的园林规划设计师，姐弟俩为人低调，淡泊名利，这一切都来源于父母，归结于家学教养。

那天我们从朱大姐家出来，次日，我就迫不及待去玄武湖情侣园重新走了一遍。

情侣园坐落在玄武湖东岸，是一个沿湖的狭长地带，当年这里是浚湖弃土区，规划以水系自然分割为6个小洲(圩区)，从翠洲门开始，由北向南一直延至太阳宫。

从翠洲大门走进一号圩蔓园，所谓蔓园，指以藤蔓药用植物为主体的园子。进门迎面就是一汪水塘，对面是一座假山的蓼屿，上面长满各种野生蓼、常春藤、爬墙虎等花木。

向右是有着茅草屋面的“蔓园小筑”，我特意走上台阶，绕到屋后平台，大片苍翠竹林，一条小径沿着小河伸向远方。小河之上有座小桥，桥上不时有一两位游人走过，这个画面好治愈。如果哪天三两朋友带着茶席，坐在平台上喝茶多好。

如果你有心，还可沿着蔓园小筑左边小河石磴上跨过河，沿着石阶走进竹林，能感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效果。站在水边，可以看到蔓园小筑，远处的石桥，宛如一幅宋画。

走过另一座小桥，就是二号圩，抬头就是松林冈，路对面就是朱先生设计的“樟荫台”，几株古老的香樟树遮天蔽日，树冠覆盖200多平方，夏日更是一片阴凉。我曾看见一位老者在树下吹萨克斯，如泣如诉。不远处草坪水边，有一株像鹿角的老树，苍劲而顽强。

朱有玠先生说过，一笔一划都不给历史留下

遗憾。这里药物花径区是分层次的，高处是香樟、松、冷杉，中间是巨紫荆、七叶树混交林，最下面是石蒜园、杜鹃园、木瓜园等。朱先生当年特别喜欢用蝶径——“访花蝶径”的简称，指分散在林荫下、带花地被中的园林小路网，游人行走可高低回环、任意东西，享受清幽野趣。

走过大石桥，就是三号圩，这里是以樱花、枫杨、鸢尾、紫藤、茶花、荷花等植物造景的区域，整个区域大都用植物来分割，很少用建筑材料，哪怕小桥也是“引蔓通津”的花架，就是让园林保持天然野趣。

朱有玠在设计中，特别强调藤本植物的观赏和布置方式，架因花设，才是园林小品建筑。比如为了表达“五叶木通”藏在叶下的雄花和雌花盛开的情景，朱先生专设了椭圆形花架，架下放了长凳，让游人抬头观看，领略其深情。

去年4月初，我在樱花怒放的季节来到这里，此时晚樱正盛，早樱已迎风飘落。那天我干脆坐在紫藤架前的石头上(相当于剧场的3排2座)，眼前有一株火红的山茶花，像穿红衣的杜丽娘，整个天空纷纷扬扬，像下了一场樱花雨，眼前分明就是一折《牡丹亭·寻梦》，可惜当时忘了拍视频。

最后，我还去四号圩绕一圈，上次我曾请教过朱大姐，从这里到太阳宫区域，都是南京市园

林规划设计院建设的。游人在这里，不但可以躺在西式教堂前宽大的草坪上遐想，还可以在鸽子广场喂鸽子，沿着水边还可以过“鹊桥”去牡丹岛。再向南去，花卉大道两旁，种满郁金香，繁花点点，似万千彩蝶飞舞。其实，情侣园是一座不断生长和变化的园林，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不同选择，一路移步换景，感受到文气、诗意和浪漫的情调。

世界上的美景往往稍纵即逝，所以美是要追寻，要主动去把握，同样，欣赏美景往往是有门槛的，要靠读书、修为、情感才能领略到。

当年朱有玠在设计药物园论文中写过：“若干年后，这些垂藤悬蔓的树群，将更发挥出苍茫朴野的情趣，但又不荒乱，而是清幽妙漫的境界。”

朱有玠先生已经过世10年，当初他期待“清幽妙漫”的意境，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虽然老人家生前，我无缘与他交集，庆幸的是，南京这些经他和团队设计打造的景区以及花草树木，我们只要有心，就可以享受其中，就可以与它们喃喃细语。

老 克 本名徐克明，散文作家、文化记者。



## 一座城市的记忆与一个时代的理想

邵力子与南京力学小学

三  
邹  
雷

在古都南京的文教脉络中，邵力子这个名字，与一座小学的诞生和灵魂紧密相连，这便是至今依然书声琅琅、桃李芬芳的南京市力学小学。

这不仅仅是一个名人办学的故事，它更是一段在乱世硝烟中坚守教育理想的动人篇章，是邵力子先生一生“力学不倦”精神最温情、最持久的回响。

故事，要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南京说起。

彼时的南京，刚刚摆脱日寇铁蹄的蹂躏，虽重归故都，却满目疮痍。战争的创伤深深刻在城市的肌理上，断壁残垣与劫后余生的仓皇交织在一起。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大批军政人员、学者教授、公职人员自重庆、昆明等地辗转回到南京。他们带回了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也带回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子女的教育问题。

战乱八年，教育体系支离破碎。南京城内的学校，或在战火中被毁，或被日伪占据，复校工作千头万绪。原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在短时间内无法满足激增的学龄儿童需求。许多归来的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望着自己活泼好动却无处安放书桌的孩子们，心急如焚。

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邵力子，也身处这股还都的人潮之中。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邵力子素有“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早年投身革命，奔走国事，深知一个国家的根基在于国民的素质，而国民素质的培养，始于童蒙。他的人生信条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民族未来的期许。

看着南京城里那些在街头巷尾游荡嬉戏的孩子们，邵力子心中那份文人的忧思与责任感被触动了。他与夫人傅学文女士时常谈及此事。傅学文是一位同样热心于社会公益与妇女儿童

事业的独立女性，她思想开明，行动力强，对丈夫的教育理想抱有深刻的认同。

一日，在他们位于颐和路的家中，或许是望着窗外战后初复的街景，邵力子对夫人说：“现在回京的人多，孩子们上学太难了。我们何不自己动手，办一所学校，为朋友们分忧，也为国家育才？”

理想的种子一旦萌发，便需要现实的土壤来培育。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资金、校舍、师资，三座大山横亘在邵力子夫妇面前。但邵力子一生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这点困难并未让他退缩。一场围绕着“力学”二字的艰辛而动人的创建史，就此拉开序幕。

邵力子虽身居高位，但为官清廉，并无多少私产。办学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他想到了自己的一技之长——书法。

邵力子的书法，在当时政学两界享有盛誉。他的字融合碑帖，雄健洒脱，自成一格，求字者络绎不绝。过去，他多以笔墨唱和、酬答友人，而这一次，他决定将自己的润笔所得，悉数用于这项他认为比任何政治活动都更具长远意义的事业。

于是，邵府一时车马盈门。许多故旧同僚、社会名流听闻邵公为办学义卖书法，纷纷解囊求字。其中，既有出于对邵力子人品与书法的敬重，更有对其兴办教育义举的感佩。邵力子则是不论对方地位高低、捐资多寡，皆以诚相待，凝神聚气，挥毫泼墨。他书写的内容，多是“有教无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等饱含教育哲思的格言。

每一幅字，都凝聚着一位长者对教育的赤诚；每一笔款项，都承载着一份对未来的期盼。据说，邵力子为了筹款，常常写到深夜，臂腕酸痛亦不肯停歇。傅学文女士则在一旁为他研墨理纸，细

心打理账目，将每一分钱都登记在册，准备全部用在刀刃上。这段“卖字筹款”的佳话，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更赋予了力学小学一种独特的精神底色：它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由文化、道义与社会各界的爱心共同浇灌而成。

资金有了着落，选址又成了难题。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寸土寸金，价格不菲。邵力子夫妇四处奔波，踏勘了多处地点，都不甚满意。他们希望学校能在一个清静、安全、文风浓郁的环境中。

最终，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了汉口路西端，靠近南京大学（时称中央大学）的一片空地。这里，在战前曾是一片民房，战争中被炮火夷为平地，光复后，竟成了一片无人问津的荒芜菜畦和垃圾场。它虽然荒凉，却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地处使馆区与大学区之间，闹中取静，文化氛围浓厚；二是因为是战争废墟，产权相对清晰，获取的难度和成本较低。

邵力子动用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与声望，与当时的南京市政府地政局进行交涉。他陈述了办学的公益性质与紧迫性，最终成功地以较低的价格申请获得了这块约十亩的土地使用权。

有了地，有了钱，建设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在傅学文女士的亲自监工下，1947年初，六座简朴而坚固的砖木结构平房教室在荒地上拔地而起。没有宏伟的礼堂，没有华丽的装饰，一切都以实用、安全、明亮为原则。教室的窗户开得很大，保证了充足的采光，这在当时的校舍建筑中是颇为先进的理念。校园里还规划了小操场和绿地，尽可能地为孩子们提供活动的空间。

学校建成，该取个什么名字呢？邵力子深思熟虑。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力子”与“力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没有用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他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了最能代表他教育理念的两个字——“力学”。

“力学”一词，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见于《中庸》之“力行”与“好学近乎知”的结合。它蕴含着勤奋学习、努力实践、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这既是邵力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对每一个将要走进这所学校的孩子的殷切期望。他希望这里的学生，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要懂得身体力行，做一个勤勉、有为、不断追求进步的人。

“力学”二字，言简意赅，意蕴深远，为这所新兴的学校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邵力子亲自题写了校名，“力学小学”四个大字，笔力遒劲，气韵生动，被制成校牌，高高悬挂在校门口。从此，一座以“力学”为名、为魂的学府，正式屹立在南京的土地上。

1947年秋，力学小学正式开学。首任校长，便是亲力亲为、一手操办建校事宜的傅学文女士。如果说邵力子是力学小学的“精神之父”，那么傅学文就是将这种精神化为春风化雨般实践的“慈母”。

在傅学文的主持下，力学小学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她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总结为一个字——“爱”。她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她要求老师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理解、尊重和关爱每一个学生。

当时的教育，多以严格、刻板的训导为主，但力学小学却洋溢着一种民主、平等、活泼的氛围。傅学文校长常常在校园里巡视，看到地上有纸屑，她会亲自弯腰捡起；看到有孩子哭了，她会温柔地把他揽入怀中，轻声安慰。她熟悉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和家庭情况，与家长们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一位学生的家长因工作繁忙，常常很晚才能来接孩子。傅校长知道

后，便让这个孩子放学后到自己的办公室做功课，并为他准备好晚餐，直到家长赶来。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力学小学的孩子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邵力子先生虽不担任具体职务，却是学校最尊贵的“顾问”和“守护神”。只要人在南京，他便会时常拄着拐杖，缓步来到学校。他不喜欢惊动任何人，只是静静地站在教室窗外，看着孩子们认真的小脸，听着那清脆的读书声，脸上便会露出满足的微笑。有时，他也会走进教室，和孩子们聊聊天，问问他们的学习情况，给他们讲讲历史故事，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岁月流转，邵力子先生于1967年溘然长逝，但他留下的这份遗产，却日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力学小学，这座从战争废墟上生长起来的学府，历经七十余载风雨，始终是南京乃至全国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他们的人生底色中，都或多或少地烙印着“力学”二字的印记。

邹雷 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 探寻南京永利铔厂遗迹

III 朱兆华

由范旭东创建的南京永利铔厂是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工工业有限公司的前身，2024年10月迎来了南化公司90岁生日。我撰写《探寻南京永利铔厂遗迹》一文，作为献给南化公司90岁生日的一份礼物。

我利用各种机会走访永利铔厂相关遗迹，深情探寻永利铔厂遗迹和遗迹背后的工业奇迹，还原那些精彩的历史瞬间，揭秘那些少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以进一步激发我们爱厂爱国的中华情怀。

## 永利旧物

在南化公司厂区内有一台十分醒目的永利旧物。

永利旧物是一台1936年采购自德国A·BORSIG公司的压缩机，是生产出中国第一包肥田粉的核心化工设备。该设备在南化运行了52年，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工业遗存。它机身庞大，最显著特点是有一个工作时以150r/min的转速不停旋转的巨大飞轮。

这个“永利旧物”是一个大型实物雕塑，由

经过特殊防腐处理的银白色的机身和大红色的飞轮两部分组成，雕塑长9米，宽4米，高4.8米，坐落在铺满红色雨花石的基座上，在雕塑前方一块长方形石碑上镌刻着“献给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者”12个金黄色的大字，金黄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如今这台压缩机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件保存完整的同类产品，几年前，德国某公司了解到了这台压缩机仍保存完好，曾试图出价100万元想购回，被婉言拒绝。

永利旧物压缩机，它凝聚了中国化工先驱们的心血，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我国极其重要的化工历史遗存，是永利铔厂极其珍贵的历史遗迹，列入中国工业遗存保护名录实至名归。

## 硝酸塔

竖立在南化厂区内的硝酸塔引起无数人的关注。我曾不止一次站在硝酸塔下回忆它的历史。

1936年从美国进口原料建造了硝酸吸收塔及其厂房，这座硝酸塔在南化公司正常运转了近70年。1942年硝酸塔被日本掠夺而走，1948年被成功索回，2011年5月正式从南化退役。如今这



索回后的硝酸设备重新安装并投入生产

座硝酸塔被南京市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而永久保存。

硝酸塔，是我国民族化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空中化石”，更是铭刻中华民族那段苦难历史的重要见证。

每当谈到硫酸、硝酸，每当谈到化工和危化，有些人就谈“酸”色变，谈“化”色变，对化工和危化充满恐惧，甚至有人仇恨化工和危化，殊不知，工业建设离不开化工，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危险化学品。我们要正确对待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严格管控风险，让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为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 五所洋房

五所洋房是永利铔厂1934—1949年之间建设的7个住宅区之一，是5幢民国建筑风格的砖

木结构二层小楼，主要用于永利驻厂专家居住。永利铔厂第一任厂长侯德榜，第二任厂长傅冰芝，以及美国工程师李佐华(Gilmer T. Lee)、美国氮气公司专家白斯脱(W. H. Baxter)等都曾居住在此。五所洋房也是当时永利铔厂的“指挥中心”。从1936年秋到1937年春季，在永利铔厂建成进入全面验收和试车投产的关键时期，侯德榜经常在五所洋房自己的住宅内召集专家、高管讨论生产经营或技术工作，有时深夜由此步行到扬子江边厂区察看工厂情况，在现场解决问题。

五所洋房，是中国化工先驱者们当年工作和生活的见证。

### 《海王》旬刊

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曾说过，“中国人要有雄心壮志把海洋征服。让海洋为我们服务，给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并使它纳入新技术，新工艺，从而彻底解决、提高大众的生活。”1928年9月20日，范旭东创办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份企业内刊，将其命名为《海王》。范旭东带头撰写文章，他在《海王》旬刊发表文章近百篇。

范旭东研究专家张能远先生给我提供了几份《海王》内刊复印件，我看了以后认为，《海王》编撰与出版指导思想，完全秉持了范旭东“四大信条”，办刊思想先进，办刊理念新潮，旬刊内容丰富，旬刊文章接地气，读后收获满满。

《海王》历经战乱，曾经先后搬迁至湖南长沙、四川乐山、江苏南京，1949年9月20日在南京停刊。其中除两次因战争破坏导致的短暂停刊外，每年都出满36期，前后共出版了700余期。目前，南化公司档案馆尚存部分《海王》，完整存有《海王》1948年、1949年(当时《海王》迁址南



京出版)合订本。

《海王》是研究永利公司创建、发展及“永久黄”团体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 南化公司厂史陈列馆

南化公司厂史陈列馆是中国近代工业自立自强传奇历程的一个典型缩影。

南化厂史陈列馆设于葛关路南化八村会堂的一楼，落成于2003年9月，之后又进行改造，共占地约800平方米，分为序厅以及“根、魂、脉、范”四个主展厅。全馆以200多幅照片，180多件文件、图书、产品和名人生活用品等实物，16件工业设备模型和人物雕塑，全面展现了永利铔厂及南化公司(含南京化工厂)的创业发展历史，并兼具图片教育、实物收藏、电子互动等功能。

全馆紧紧围绕南化创始人、化工先驱范旭东艰苦创业及著名的“四大信条”及“四千精神”文化遗产这条主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南化公司创业、创新、奉献和发展的企业特色以及南京化工厂的发展历程。南化厂史陈列馆展示了范旭东实业报国的厚重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企业文化。

2020年11月24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关工委在南化公司举行揭牌仪式，南化厂史陈列馆成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南化

厂史陈列馆入选国家2023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还先后获国家工业文明遗产、全国高校大思政教育实践基地、国资委网上推荐展馆、中央企业(江苏省)工业文化遗产、中国红色教育基地等称号。

南化的“中国第一”是值得回忆的。

中国第一包肥田粉，新中国第一号发明证书(侯氏碱法)，第一包催化剂，第一台高压容器，第一套合成氨、硫酸、硝酸化工装置等，都从南化公司诞生，南化先后创造了30多项“中国化工之最”。回忆南京永利铔厂和南化公司的过去是自豪的，展望未来，使南化再创辉煌的任务更是紧迫的。

2018年，南京永利铔厂以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和工业文化底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永利铔厂旧址”蜕变为1934文化产业园。昔日“中国化工摇篮”已成为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一张闪亮的名片。南京永利铔厂在中国近代化工工业历程中，屡屡创造奇迹，谱写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背后的力量来自“四大信条”和“四千精神”的指引，这是范旭东精神内核。我们要让范旭东精神内核释放新的动能，为企业创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赋能。

南京永利铔厂的遗迹是中国民族工业艰难创业和逐步发展的历史见证，我期盼有一位导演和制片人，筹拍一部名为《南京永利铔厂遗迹》的电影或电视剧，让更多的人看到永利铔厂遗迹，了解其背后生动的历史故事。

(本文照片由张耀提供)

朱兆华 曾供职于南化集团。

## 逝者三题

### III 王慧骐



弋阳年糕

### 父 亲

那一年的春天，已是七十五岁的父亲领着我们几个在异乡长大的兄弟姐妹，第一次回到他的出生地——江西上饶所辖的广丰县柘底乡——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那儿度过的。从上饶城里陪同我们一道返乡的大表叔指着村里的一片农田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读书很用功，经常是一早天刚亮就跑到这没人的田边来念书、背书。高中是到广丰县三岩中学读的，平时住校，寒暑假回来，也都有晨起跑到周边田野上读书的习惯。他喜欢大声地背诵英语单词，村里的农人听不懂，讲他是“癫子”，一早起来就胡言乱语的。可正是凭着这股“痴劲”，你爸爸考上了省城的南昌大学，时间是1946年的夏天。

关于父亲早年求学和以后工作阶段的履历，他并没有很正式地同我谈过，父亲读完南昌大学后居然又“再下一城”，考上了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所学专业是飞机发动机。毕业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照道理，根据专业对口，他应当被派分到国家飞机研究所或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单位，但父亲被改派到

了彼时还较落后的苏北行署所在地扬州(当时的江苏省分为苏南行署和苏北行署)，具体单位是苏北行署农林科，做技术员工作。大约到了1952年，父亲被抽调参与筹建当时扬州的第一所大学——苏北农学院，并让他担任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的系主任。安排在这个专业里领头，父亲认为得益于他在中央大学的学习。虽然飞机与农业机械分属两个行当，但发动机的原理却是相通的。记得在我成年后，父亲有一次同我开玩笑说，没能上得了蓝天，却一头扎到了泥土里，和拖拉机、农业机械、植保机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我出生于父亲创业不久的1954年，在我很小的记忆里，就有父亲几乎每晚在灯下伏案看书的身影。家里的一面墙上总挂着他教学用的挂图。有一块用几根木条支起的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五合板，是他备课时贴一些图纸用的。上端两角用图钉按着，不时地会做一些调换。他备课十分认真，喜欢抑扬顿挫地讲出声来，仿佛面对课堂里的一众学生。但父亲的普通话说得很蹩脚，始终有改不掉的浓浓乡音。父亲工作起来不要命似的，给自己排的课一直都很满。他患胃病多年，胃经常泛酸，因此背着讲义的包里常年

备一只铝制的小盒子，里面放几块苏打饼干。碰到胃酸受不了时，就塞两片嘴里抵挡一下。

父亲曾参与了由江苏省农科所等三个单位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编写小组，负责编撰后来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共计八个分册的《植物保护手册》。父亲承担其中的《植保机械》分册，这本书有近四十万字，是对当时国内普遍应用的各类植保器械及其动力配套机的集中展示。为写这部书，父亲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跑了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数十家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收集了彼时植保器械的最新资料。出版后受到广大农村用户和各使用单位的广泛欢迎。

不光教学、著书，父亲还主持过多项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设计出了一批受到各地农村或农场欢迎的农业机械，诸如稻麦豆多用脱粒机、沤田拖拉机、手推收割机、育苗制钵机等。尤以一种少(免)耕全自动营养钵移植机被称作是“我国种植机械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和世界优秀专利，获得农业部、国家科委等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江苏省科技成果金质奖。

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父亲在七十岁退休以后，仍然整日埋首于书桌，在七十二岁那年完成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50万字的《植保机械学》；更令其同行为之惊叹的是，八十四岁那年，他还捧出了一部砖头般厚重的大书——71万字的《植保机械理论与设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版)。时间跨度达二十五年的“植保机械三部曲”，凝聚着父亲大量的心血，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里，最不能忘却的是那一年他以父亲的威严“逼”着我考大学。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工厂做学徒，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刚刚满师。书本已扔得太久，对于

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一点不感兴趣。可父亲却认定了年轻人必须读书这条死理。那些日子他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说书读到你肚子里，别人是拿不走的，将来总归有用。拗不过他的“软硬兼施”，我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临阵擦枪”，总算没有拂了他的一片美意。如今想来，当初若非父亲那般坚持，我必然也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那我的人生无疑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父亲九十二岁那年离世，在学校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我含着泪水表达了对父亲一生刻苦奋斗的敬意。读书——教书——写书，这六个字基本构成了父亲简单、平实而又丰富的一生。他至死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但他身上那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却令我终身受益。

## 母亲

母亲出生于一个手工业主的家庭。我的外祖父做木工出身，脑子比较灵活，从上海浦东乡下来到杭州，业务慢慢做大，能独立承揽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建筑项目。后来抗战爆发，外祖父带着他的三个女儿四下逃难。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女儿。逃难中母亲的姐姐被日寇炸死。母亲流落到了江西广丰县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在那儿认识了我的父亲，不久后恋爱，成婚。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随同父亲来到了扬州。1952年，父亲参与筹建苏北农学院，母亲则在新建的学院图书馆做了资料员的工作。随后的几年里，我的二姐、我、弟弟和妹妹陆续出生，较为密集的生育使得母亲的身体一直比较瘦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农学院有过一次对在职人员进行压缩和调整的行动，母亲在那次行动中被劝其离开图书馆的岗位，安排她到郊区的一所农村小学任教。母亲人老实，平时不太讲话，对这样的安排，尽

管感到有几分委屈，但仍无条件地服从了。其后的几年里，她又被调到距扬州市区20多公里的江都县实验小学和距离更远些的江都县张纲中学任教。

母亲读书时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在张纲中学前后待了近十年，主要从事高中英语教学。也就在那些年里，我曾跟随母亲陆续去往那所农村中学或长或短地住过。那时我已在扬州市里读中学了，只是因为当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比较松，向老师请个假，十天八天不去学校也没人会问。母亲独自一人远在几十里路外的乡村学校，每至夜晚，那所连围墙也没有的学校，真的是如死一般的寂静。孤单的母亲有时带上我是为了有个伴。

早晨我和母亲一道去学校的伙房打稀饭，稀饭装在一只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缸里捧回宿舍。稀饭熬得挺稠，母亲告诉我，那里面放了食用碱。做饭的师傅姓王，见到我常常表现出挺喜欢的神情，母亲让我叫他王叔叔，他笑笑，叫我小三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是母亲跟他说的），时不时地会当着母亲的面夸我几句。早餐除了稀饭还有馒头，有时候还能吃到花卷或咸菜馅的包子。每天能和母亲面对面地坐在一块吃饭，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我和母亲的脸上，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张纲是一个不大的小镇，却有点历史。老街上有一条不是很长的麻条石铺就的道路，两边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商店。记忆较深的，是镇子的东头有一座水闸，一些卖鱼虾等水产的商户，在水闸旁的那座桥上吆喝各自的生意。母亲有时候会买些蔬菜或鱼虾，在宿舍里用煤油炉来制作，改善一下我们母子星期天的伙食。有两次弟弟和我一块去母亲那儿，好像是夏天，我们和其他老师的孩子一道用自制的小钢叉，在学校的池塘里捕捉青蛙，跑啊叫的，玩得十分开心。

也有些星期天，我和母亲一道回扬州家里。从张纲镇可以坐车去江都，但母亲为了省些车钱，有时带着我走小路，步行约七八里地可到达江都长途车站；然后再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扬州。每次同母亲一块步行，沿途看田野里的庄稼，蜜蜂、蝴蝶在油菜花地里飞来飞去，农民们扛着农具在田埂上行走或在地里干活，觉着那些画面都很美，心情也特别放松，感觉自己成了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鸟。有时候跑得头上出汗了，母亲会停下来，从那只每次回家都会提着的柳条篮里，拿出从镇上小店买的金刚脐给我吃，让我歇歇再走。

记得在当时的背景下，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生们上英语课大都马马虎虎，不肯学，母亲在课堂上拼命提高嗓门，教得很吃力。尽管课堂纪律不好，但母亲从来不骂学生。若干年以后，母亲在扬州病故，她当年的学生赶到我们家中吊唁，说起母亲那些年在课堂上苦口婆心教学的情景，一再地向我们表达歉意，说长大后尤其是工作以后才慢慢懂得孙老师（我母亲姓孙）在当时肯那样教学生有多么地了不起。

到我开始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注重抓教学了，成绩好的学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回忆起来那一阶段我在学习上知道用功了，写作文也有了较显著的提高，而且还会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以外，主动写一些自己命题的作文。我把这些小作文拿给母亲看，母亲总是很高兴地说写得蛮好，她还把我的课外作文簿带到她的学校，请当时担任教导主任的张松卿老师、高中语文组的组长范鸣国老师看，让他们来指导。记得有一次我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两位老师都很用心地对诗作做了批改，给出了让我深感振奋的评价。母亲的这些举动，对我后来比较自觉地爱上写作，包括一种自信心

的建立，我以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母亲和她所在的那所乡村中学，在我少年成长发育的阶段，的确给了我许多终身受益的东西。和她相伴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母亲身上所表现出的亲切、善良，随遇而安，与人相处中的挚诚，对人的尊重，以及日常生活里的节俭、勤勉，和物质并不丰富情况下的自得其乐，这些向上且美好的精神品质，成为我一生学习和要求自己做到的基本要素。几十年里，工作以外我一直坚持写作，不同的年代尽管写作的侧重点和表现体裁有所变化，但有一个基调是我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对于身边的人和事我总投以关注的目光。他们，或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或是有相同爱好的文友；更多的是茫茫人海里萍水相逢的各种普普通通的人。我努力了解他们，贴近他们，并对他们的种种生活情态做下忠实的记录。我看重人间烟火里点点滴滴的光亮与温暖，那些令人心生感动的瞬间会在我的笔下定格。我以此为乐，并试图用这些素描式的文字去感染身边尽可能多的人。

母亲早在1998年便离开了人世，但她曾经工作过的张纲中学，却因了母亲而一直是那么生动和真切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不久前我又专门去了一趟这所很难再觅到旧迹的学校，给那儿的师生送去了一些历年来我所出版的作品集，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怀念我亲爱的母亲，也表达对我有着特别意义的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恩之心。

## 叔 父

有一年春节期间，看一个说年味的电视片，讲到已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江西弋阳的年糕(又称大禾米粿)，其制作过程是怎样的一种艰辛——从选米、洗净、浸泡，到入甑以大火蒸熟，再放入石臼之中用木槌反复捶打；待打茸

后捏成团，二次入甑，燃大火复蒸；之后再行循环，做足“三蒸两百捶”方才大功告成。说弋阳人打年糕已有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此处所产稻谷一年仅一次收成，春播，夏种，秋养，冬收，吸“四季之水”，得“天地之养”，故尤显软糯。所制年糕洁白如霜透明如玉，油光发亮，韧性甚好，较他处年糕，无疑胜出一筹。

而这产自弋阳的美食其实在我少年时便已品尝过多次，只是一直不知其得来竟如此不易。今日睹物思人，想到了当年不远千里从弋阳把重达几十斤的年糕哼哧哼哧背来的叔父。

祖父生有二子。父亲年长，少时肯读书，考上大学后也就早早离乡；而小他十岁的叔父，则因厌于学业而未能摆脱贫困之故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去了邻县弋阳的一座垦殖场当农工。由于没什么文化，终日辛劳也只能混饱个肚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几个侄辈已陆续出生并长大。记得每年临近春节，叔父早在腊月初始就找人相帮打好年糕，而后乘汽车转火车，几天几夜，经受旅途劳顿，跨越三省来到他并不熟悉的扬州，为的是和我们一道过个团圆年。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孤单而寂寞的，所以每次来了他都多想多留些时候。过年那一段全家老小的忙碌与欢乐，记忆中总有叔父并不高大却憨实的身影。

可惜因种种缘故，叔父这一生终身未娶而无子嗣；可怜六十岁不到又碰上效力大半辈子的农场宣告倒闭，遂孑然一身来到他兄长身边。最后的几年则由幼时受过其抚养的侄女(我大姐)照料其生活起居。辞世之年为八十二岁。我们兄弟在扬州为他选了块墓地，让其与兄嫂(我父母)相伴，比邻而居。

王慧骥 曾任江苏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 我世界里的第一位“大女主”

III 陈全忠



陈友锋 摄

### 一

少年时代，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女主行走江湖，必有过人绝技，比如黄蓉的美食。为了让洪七公收郭靖为徒，黄蓉做了一道“二十四桥明月夜”为诱饵：“先把一只火腿剖开，挖了廿四个圆孔，将豆腐削成廿四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鲜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却弃去不食。”还有“好逑汤”：这汤“碧绿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红白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

黄蓉的美食勾住了洪七公的鼻子，也让我等读者在深夜垂涎欲滴。那时我尚未觉察，出现在我生命里的第一位可见可感的江湖美食家，是母亲。

当年乡下普通家庭日子都难过，我生得最晚，上有哥哥姐姐六个，光是喂饱七张嘴，一个

个拉扯长大已是不易。日子艰难不等于寡淡，我人生记忆里最好吃的美食，都出自母亲之手。最新鲜最朴素的食材，源自脚下的土地和山川河流。

黄蓉的豆腐是从店里直接买的，而我家的豆腐必须从地里开始，夏至种豆，七八月收豆。太阳炙烤大地的时候，豆荚晒得都快裂开了嘴。全家上阵，大清早就汗流浹背了，拔豆、捆扎、挑回家、晾晒、用连枷敲打，才有圆滚滚的豆子落水浸泡，然后进入石磨，变成白花花的豆浆。煮浆、滤浆、点卤、蒙纱、压制等一系列制作豆腐的工序，母亲喜欢在深夜一个人守着灶台完成。她熬夜的习惯也可能是那时候就形成了。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如厕，睡眼惺忪中看见厨房里还有灯光，就迷迷糊糊地走过去。母亲揭开锅盖，古早的豆香味扑面而来，我的睡意立即醒了一大半。她拿出碗，给我盛了一碗豆腐脑，加了点白砂糖、撒了两三颗豆豉。那是我最初的“深夜食堂”，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如母亲的微笑一

般温婉，一勺入口，甜而不腻，滑而不散。过滤后剩下的豆渣也是不可多得的美食，母亲能把它做出百种花样。有时候是加点葱花素炒，有时候是和面煎成小薄饼，有时候是炸成豆渣小丸子，甚至揉成大圆球，放在竹篮里，悬梁上风干发酵，到冬天切成小薄片下汤，别有一种风味。

夏天燥热，大人们都午休了，树下的蝉在眠不休地歌唱，我躺在竹床上睡不着，就偷偷溜出去到小溪里去摸鱼。水流哗哗，蹚水赶鱼到竹篓里既清凉，又快活。成天忙活的父母真没精力管我们，直到双脚泡得泛白，我们才提着一桶小鱼回家。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母亲让我去屋后的地沟里拔点野紫苏。下到豆腐鱼汤里，馥香味又浓了一层。这仍然是我至今念念不忘的童年美食。

等到我上中学读书，书杂费加生活费让父亲犯难，一大家子开销捉襟见肘，哪有多余的钱？母亲说，学不能废，我来想办法。她在村里卖豆腐，采茶制茶卖茶叶，田间地头长出的黄花菜采回焯水晒干能变成冬菜卖，春天屋前屋后冒出的大笋或者山上野地里长出的黄泥小笋也能加工成畅销的干货。总之，母亲无中生有，在四季风味中找到了行走江湖的“魔法”，撑起了我最初的天空。

卖不完的豆腐，母亲大部分封坛，加入辣椒粉、食盐等，自然发酵后变成豆腐乳；少部分切片放在竹篮子，挂在厨房烟熏成豆腐干。在镇上中学住校期间，我的伙食也是紧巴巴的，但带着母爱牌的拌饭菜，还别说，真香！

## 二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就喜欢每天小酌一杯。

酒是乡下酒坊纯粮食酿的白酒，度数高，入口烈。收拾完锅碗瓢盆，忙完一天，母亲就把眼前的一盏酒一饮而尽，有时候是两盏。一盏洗风尘，两盏消疲惫。

记得有一次，父母因为家庭琐事拌起了嘴，大哥连忙给他们面前各倒了一杯酒，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喝了酒的母亲，脸上一团酡红，眉眼带笑，表情松弛，像慈眉善目的菩萨。我在看书写作业，她就坐在旁边补袜子，有时候抬头看我一眼，也不说话。等我做完了，让我帮她穿针引线。有空的时候，我让她讲讲小时候的事，她就说起小时候的苦。亲生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继母对她很苛刻，每天必须纺纱到很晚才能吃到饭。那还是旧社会，她只要稍微顶嘴，打骂也是常有的事。我听得义愤填膺，她却说得风轻云淡，脸上压根没有愁苦的控诉表情，仿佛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年深久远的事。

毕竟前人都已经作古，现在她有桃李春风一杯酒，可以消融岁月的沟沟壑壑。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武侠世界里，江湖儿女都少不了酒。少室山下，乔峰、段誉、虚竹三人结义，以酒为媒，豪气干云；李寻欢的酒，是寂寞的遣怀；陆小凤以诗陪酒，每当喝酒时就会吟诗一首；楚留香的酒，是洒脱的孤傲，散发着友情的芬芳……母亲的喝酒，并非为了快意江湖，最初只是为了止痛。父亲年轻时修水库挣工分、跟着师父学艺走四方，常常十天半月不落家，要强的母亲分娩没几天就下地干活，落下了风湿腰痛的毛病。中医建议她适当喝点酒，可以驱寒暖身。于是母亲的酒杯，一直端到了八十多岁也没有放下。

母亲有时候也会多喝，例如儿女嫁娶的时

候，人逢喜事精神爽，更禁不住笑脸春风人多劝，一杯接一杯。母亲似乎心里有数，人已经飘飘然了，喝得差不多该回了，便自个儿打道回府，回家也不多话，倒头就睡。

也有一次例外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三姐嫁得比较近，就在邻村，走过去十几里路。因为近，串门就方便，母亲也喜欢去。进门姐姐姐夫就要倒一杯酒，平时可能真的只是一杯，但那次可能是高兴，也可能是在路上的熟人家已经喝了点，喝的肯定不止两杯三杯。总之月亮爬上树梢了，母亲还没有回家。我们就到三姐家去接她回来，三姐说：“妈早几个时辰就回去了！”人丢了怎么办？我们打着手电筒，慌忙沿路去找。

路上要经过一段无人居住的坡地，黑黢黢的，静得吓人，只有夜鸟的怪叫声回荡在坡谷。我们找到这儿的时候，在坡地里小睡一觉的母亲已经酒醒，施施然走在我们前面。我走上前，拉着她的衣袖说：“我放学晚了都不敢走这段路，要快步跑过去，你怎么敢睡在这儿的呀！”“你抬头看看，不是有月亮吗？”母亲笑笑。

多年以后，我读到苏东坡的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突然发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淡定，母亲身上也有。我不觉得母亲当年的小醉是荒唐之举，反而更像一位洒脱从容的大侠。她走过夜路，也邀过明月；酣睡过荒野，也无畏于黑暗。人生在世，谁不会碰到一两回荒凉的夜路和暗黑的沟渠啊，有人快步逃走，有人从容吟啸且徐行，母亲只不过借花间一壶酒，壮了一下人生胆。

### 三

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还保留着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古风。只要没到关灯睡觉的时候，大

门都敞开着，我们几个未成家立业分门立户的孩子欢迎伯伯婶婶来，欢迎叔叔阿姨来，甚至欢迎风来雨来月光来，但讨厌“懒贤”来。

“懒贤”的真名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这名字很怪，但“懒”得名副其实，他的父母去世后，一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却不事稼穡，家里不开火，也不洗脸洗澡，头发永远乱糟糟得像是一个鸟窝，一年四季就穿着那么一套衣服，胸前衣服和袖子都泛着油腻腻的光。虽有哥哥姐姐，但被嫌弃得站不住脚，只好四处游荡。村里人见面都要取笑一下他，把他当作孔乙己似的人物。这“贤”字大概是“闲”的谐音，也可能是他在村里的知名度赶得上那些贤达，不过是讽刺。

差不多到饭点的时候，他隔一两天就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们想关门，但母亲不让，她拿出一个大海碗，盛了大半碗饭，再在餐桌上的每个菜碗里夹了一些菜出来，把大海碗堆得满满的，递给“懒贤”吃。于是我家吃饭时经常是这样奇怪的一幕：一家人围着餐桌静悄悄地吃饭，隔着两张桌子的距离是“懒贤”坐在靠墙椅子上端着大海碗狼吞虎咽地扒饭，大概是饿了几顿了，他吃饭时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胃口比谁都好。有时候看到桌上有酒，他就笑嘻嘻地讨一杯喝，母亲竟然也答应他，给他倒了一小杯。

他为什么来我家这么勤呢？我们抱怨，都是母亲惯的。母亲笑笑：“人家既不偷，也不抢，就是懒了点，就是个没了爹妈没人疼的孩子，给口饭吃怎么了？”她还说，有一次“懒贤”还主动拿起扫把帮她扫院子呢。

分口饭吃没问题，其实我们心里最大的疙瘩是嫌他脏。“懒贤”吃过饭的碗筷，我们都想扔掉。母亲把他用过的碗筷用热水浸泡，认认真真地洗刷了几遍，见我们不敢用，她自己拿着用，似乎

以此证明：都是穷苦人家，都食五谷杂粮，人家也没病没痛，用不着嫌弃。

母亲的悲悯心不仅仅是对认识的人，对陌生人也是一样。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听到房间窗户外窸窸窣窣地响个不停，顿时心惊胆战：是不是有小偷来偷鸡了？我起来悄悄告知父母，父亲如临大敌，备了根棍子，打起手电筒，喊起家里人开门去探个究竟。窗外果然有人，那人听到响声，也没跑，只是蜷缩在墙角，身上还盖着一堆柴草，但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母亲见此光景，依然明白了几分，她让父亲放下戒备，问对方是哪里人，为何露宿在外。得知是老家遭灾的流浪汉，一路乞讨为生，她赶紧拿了点干粮给人家。流浪汉千恩万谢地走了，母亲想了想，又喊住他，从房间里拿出一件旧大衣披在他肩上。

无论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还是流浪

乞丐，母亲没有智愚优劣和境遇高低的差别心，都以同胞平等慈悲视之。这种公道情怀和不忍人之心，更多的是出现在武侠小说里，那些古道热肠、仗义出手的大侠身上。

如果那时也有“大女主”的说法，我想母亲当得起这一称誉。她一辈子要强，始终以勤劳智慧之手勇敢应对生活的难题，以洒脱之风坦荡接纳生活的风霜雨雪，以朴素的义利之举激荡一颗爱人之心，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支柱和指路明灯，也是我平凡世界里第一位清晰的“大女主”。

陈全忠 《风流一代》杂志主编。



##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之路

### III 杨安翔



抗战时期的杨平

我的母亲杨平，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一位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一位自立自强自信的知识女性。时值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怀念母亲当年走上抗战之路的历程。

杨平，原名杨鑫珍，曾用名杨崇真、吴敏。1917年农历腊月17日出生在扬州城内一个普通的城市平民家庭。在姐妹四个中，杨平比较好学，后来考进了扬州崇德女子中学，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英国人，教英语。语文老师是中国人，上课会讲历史故事，穆桂英挂帅、鸦片战争等。杨平晚年回忆，“我考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让我有机会读了中学，有了中学的文化才使我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进步很快。”毕业后，杨平在崇德女子中学当上了老师。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以后，抗战爆发，不久扬州沦陷。

七七事变，抗战开始。那时杨平在每天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一条多子街，那里有个中学，门口有大幅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个牌子“扬州抗日救亡晨鸣社”。渐渐地杨平被他们所吸引，她也参加进去。就这样杨平的抗日从加入“晨鸣社”开始。一位年轻的知识女子，通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爱国意识觉醒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14日，日军侵占扬州。在扬州沦陷前，杨平和妈妈、妹妹、表嫂以及邻居家的三个姑娘，共7个人，一起开始逃亡，到乡下去避难。这群难民约40多人，一直走到高邮湖，河那边的村镇叫郭家集。郭家集是高邮县的一个集镇，位于高邮湖西，与江都县搭界，是水网地区。因为高邮县城尚未沦陷，这里还较为安全。杨平她们跟着一些难民上了船，过河到了郭家集镇。

转眼间，她们离家逃亡出来将近20天了，有的难民们也陆续回到城里去了。此时杨平的大表哥来到郭家集，准备接她们回去。大表哥带来一些坏消息。他告诉杨平，她的大姐夫蒋国粹在淞沪会战中牺牲了。大表哥又告诉她们，杨平的父亲在九江做工被日军抓走，将其带到南京兵工厂去做工了。听到这个噩耗母亲几乎晕倒，母女三人抱头痛哭，心都要碎了。姐夫牺牲，姐姐年轻就守寡了，爸爸恐是凶多吉少(后来在1942年得到消息，父亲被日本鬼子虐待折磨而死)。此时杨平下定决心，家仇国恨一定要报，她不回去，坚决不当亡国奴！母亲劝说她，她也不回去。

杨平开始参加的抗日部队是一支民间抗日

武装。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高邮湖西出现了一支由陈文领导的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名号“抗日义勇团”，简称“陈团”。陈文，安徽郎溪人，富裕家庭出身，毕业于安徽省立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是1928年郎溪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农暴失利后，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捕杀，他被迫背井离乡，寻求光明之路。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陈文在高邮湖畔自发组织起“抗日义勇团”，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

杨平看过的第一本进步书籍是《西行漫记》，书中红军长征的故事和红军不畏艰辛、不怕牺牲、坚持革命到底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她。她内心一直向往着延安，想参加新四军，当时教导队有共产党的代表，她很高兴和激动。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39年6月，杨平经吕镇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天，吕镇中通知开会，只有三个人参加。吕镇中郑重地宣布，经中共苏北工委批准，我们在陈文部队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吕镇中任党支部书记，陈淦任组织委员，杨崇真(杨平)任宣传委员。这是抗战时期我党在高邮湖西地区最早建立的一个党支部。

杨平到苏北工委后进短训班学习。短训班结束后，组织派她参加开辟高邮地下党的工作，寻找“陈团”被打散后流落在高邮的同志，尽快建立党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活动。临泽镇是高邮县最大的城镇，是战时的大后方，高邮县中学、国民党保安八旅等国民政府的机构都撤到临泽。组织通过地下党的内部关系，使杨平等顺利打入国民党保安八旅政治处，以公开身份做掩护，先后在街道、学校、商行、乡村开展了一系列党的组织活动，秘密建立了4个党支部，发展了约40多位党员，临泽及高邮的抗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些地下党的组织网不仅成为当地抗日斗争的主力军，而且为后续我党和新四军在江(都)、

高(邮)、宝(应)地区对敌作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牢靠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批经过严格考察培养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和骨干。

1939年，苏北工委分配杨平到新四军三支队工作，直到1940年7月，随新四军东进黄桥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杨平一直在苏中，主要在泰兴县、高邮县两地区担任区委书记、宣传部长，坚持敌后抗日工作。这时候，组织决定调杨平到地方工作，派她到泰兴县委四区担任妇女科长。

当时日军在敌占区建立伪政权，县里搞维持会，设立伪乡长、伪保长、伪村长等，推行所谓“以华治华”政策。那时，日伪几乎每周下乡“扫荡”，有千人的大规模“扫荡”，也有百人的小规模“扫荡”。鬼子下乡“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上级要求：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人民群众都拥护和支持新四军。四区有一个村叫西雁岭，是黄桥到古溪的必经地，是交通要地，杨平她们同县委的联系，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村，杨平物色了一个对象拜做干妈。她平时吃斋念佛，心地较善良。杨平向她宣传抗日的主张，她同情和拥护共产党，支持新四军，支持打日本鬼子和伪军。她家设有一个小佛堂，村里的老百姓经常到她家拜佛；因此她在村里具有影响力，老百姓会把鬼子的情况汇报到她那儿。我们的人经过村里，她会将鬼子的人数、朝哪个方向运动等情况告诉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可以在她那里吃饭、休息。有一次，杨平他们正在她家里时，村里有人来报信说鬼子来了。她赶紧拿出她女儿的衣服让杨平穿上，让他们化妆后，带他们从后门逃出，躲在荒坟滩避难。等到鬼子走了，她就叫同志们出来，告之鬼子的人数、

去向等。她的家就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

1942年9月至10月间，日伪集中1500人的兵力对高(高邮)、宝(宝应)地区分期分块“清剿”，水、陆两路对我包围袭击。我们人员伤亡比较大。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从1942年冬开始，在高邮地区发起工程浩大的群众性打坝运动。杨平这时已到高邮四区，随即参加到这场打坝运动中。根据上级指示，首先在四区试点。召开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揭发日伪暴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述打坝的作用，全面发动群众打坝，共同抗日保家。在四区，先发动群众和军队筑起一条较宽的土坝，取得经验后加以推广。区干部们带头，带领群众打坝，干得热火朝天，为赶时间成日成夜地干。二三月天，还在春寒时节，女同志们整天泡在水里，腿都泡肿了，但她们精神饱满，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当时老百姓还编了一些顺口溜：“你一锹，我一锹，水来土挡，鬼子来坝挡”“坝头打得好，汽艇进不了”。到1943年春，全县掀起打坝运动高潮，先后动员民工共26万人次参加，打了300多道坝。

筑坝完成后，阻敌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主要方堤有八条，总长70多公里。在1944年车桥战役中，这条坝发挥了很大作用，苏中主力数千人奔袭车桥参战，民兵、担架队、军用物资都从这条坝上浩浩荡荡地通过。

后来杨平从四区调到二区、三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1943年10月至1946年3月，杨平任高邮县委宣传部部长。

抗日的烽火并没有摧毁人类真挚的情感，战地硝烟中仍然绽放了爱情的花朵。我的母亲杨平和我父亲黄烽就相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相识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高邮地区。经过一年多工作中的接触往来，杨平和黄烽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于1944年4月结为终身伴侣。



1964年黄烽晋升少将与杨平合影

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开始。苏中地区位于解放区东南前哨，是国民党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奋起反击。7月，苏中战役打响了。黄烽所在的团，在参加解放盐城战役后回到黄桥地区时，奉命连夜赶到邵伯前线接替兄弟部队担任坚守邵伯的任务。

这时杨平已从高邮县委调到部队，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部民运科副科长，在邵伯第二次保卫战后，7月的一天，当时的纵队政治部主任孙克骥要杨平去看看黄烽。来到邵伯大街上，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在议论说，这支部队两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他们一定能保住邵伯镇的。老百姓自发组织支前队伍，送茶、送饭、抬担架。杨平问一位老大爷，又要打仗了你还留在镇上？他说：“我们要和部队共同保卫邵伯。”杨平深感，这里的群众基础多好啊！

70年后，2016年7月，99岁的杨平来到高邮邵伯战役纪念馆，在一场场战役史实的照片展板中，看到参加部队序列一栏里记录着“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第89团政委黄烽”。杨平很激动，深情地回忆说：那是1946年7月的一天，当时的纵队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在黄烽即将奔赴邵伯战役

前线时对我说，你去看看黄烽吧，言下之意黄烽要去前线，而且这一仗将很艰辛。我来到前线，黄烽见到我到来感到很突然，我说这是孙克骥主任特意叫我来看看你的，他很感动。安排我到他住地休息，我们边吃边拉家常，说到坚守邵伯的任务时，他语气严肃：坚决顶住敌人的任何进攻，决不丢失邵伯阵地。我看他刚从前沿阵地检查工事构筑情况回来，头发长长的没时间理，满身泥巴没时间洗。我把他换下的衣服洗了晾干叠好。第二天我即返回纵队政治部。8月26日，经过血战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胜利结束。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黄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时隔70年，杨平在回忆这段场景的时候仍然那样清晰，那样动情。她的回忆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一对革命情侣用他们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怀铸就了他们的信念，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镌刻在战争记忆的丰碑上。

黄烽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进军福建、解放福州，攻克厦门，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军，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12月，黄烽调福州军区空军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1年8月杨平也随调至福州，先后任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福建省气象局副局长。

2016年6月杨平在儿女陪同下从福州乘坐高铁来到她魂牵已久的故土江苏，并来到她曾经浴血战斗过的第二故乡高邮，当99岁的杨平坐在高铁上时，她兴奋地对儿媳说：“我没想到这把年龄了还能享受先进的高科技，国家的发展真是太快了！相比牺牲了的战友们我是太幸福了！”她望着窗外的风景动情地说：“我不能忘了他们，在我有生之年来看看他们，看看我当年战斗过的土地，了却一个心愿。”她又先后去了邵伯保卫战纪念馆、高邮最后一役纪念馆，向烈士们敬献



抗战胜利70周年，接受人民网采访

花圈，追思英烈！最后在当地政府同志的帮助下还专程去了临泽镇，在这里她曾受任建立了抗战后高邮第一个党支部。她寻访了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旧居，还找到了当年战友的后代。回到南京后又接受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铁军影视中心的采访；第二天又拜访了老战友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95岁高龄的郑竹波同志，老战友见面分外高兴。杨平这次江苏高邮之行虽然短短几天，但她一直精神饱满，思维清晰，她欣慰终于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写了这篇文章纪念母亲，也是为了纪念更多的像我父母一样在国家危难之际投入抗日洪流的千千万万个仁人志士和为国捐躯的英烈，我们的纪念是为了牢记历史，继承遗志，胸怀理想，砥砺前行！

杨安翔 南京林业大学文学院教授。

## 母亲的纪念章

### ——记我的母亲施淑芳

III 李 辉



几天前，在我家最显眼位置多出了一枚镌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它熠熠生辉。看到它，就想起了我们亲爱的母亲，它是母亲穿越抗日烽火的见证，它是共和国对她的最高荣誉，也勾起了我们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母亲的童年十分苦难。她出生在由海门县迁徙到苏北(今盐城大丰区)海边垦荒的贫苦农家，七岁丧父、八岁失母。童年的不幸没有击垮她，反而铸就她坚强、独立、勇敢、奋斗的性格。15岁那年，她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我曾问过母亲：“你那时就不怕日本鬼子？”她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干尽了坏事，我恨透了他们，我一点都不怕他们”。语气里的执拗，表现出她性格的刚毅。母亲在九死一生的战斗生涯中，最危险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发生在她16岁。那是在一场反扫荡的战斗中，完成了掩护

老百姓秋收任务后，游击队员分开撤退时，她被一群鬼子、汉奸盯上，母亲跑到一户农家门前时，一位大娘对她说：“小窝头(海门话，小女孩意思)，你是跑不过他们的，赶快到我这里来，我把你藏起来。”于是大娘把她塞进屋后码放整齐的棉花秸秆堆里。用过秸秆烧火的人都知道，想在棉花秸秆堆中抽出一捆秸秆是很难的，原来大娘在秸秆堆中设置了机关，只有她知道哪一捆秸秆可以拉出，里面还留有一个洞，可藏放物品。鬼子、汉奸追到大娘家门口，问大娘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跑过？大娘指着旁边的一条小路说：“刚才有一个小窝头往那里跑了。”鬼子、汉奸不信，就到大娘家里翻箱倒柜，没找到人，他们就盯上了屋后的棉花秸秆堆，母亲此时蜷缩在秸秆里，手里抓着一枚土制的炸弹，心想如被敌人发现，就与他们同归于尽，绝不投降。鬼子、汉奸过来也



母亲施淑芳

不去翻秸秆，直接用刺刀往秸秆里扎，“簌簌”的刀扎声刺破了屋后的宁静，汉奸一边用刺刀扎，一边叫嚣道：“小姑娘，出来吧！再不出来，就用刺刀戳死你！”突然，母亲感到一道寒光擦着她右眼边刺过去，冰凉的金属味儿混着秸秆的潮气扑在脸上……母亲后来对我说，如果这刀扎到她眼睛上，鬼子就会发现她，她将拉响炸弹……一个汉奸看秸秆里没有动静，给鬼子出主意，把这堆秸秆烧掉，于是这个汉奸就拿出了火柴点火，由于几天前的大雨把秸秆泡得透湿，汉奸点了几次火都没点着。此时外围忽然传来了战友们的枪声，鬼子汉奸就往响枪的地方追去。那天，如果没有大娘出手相助，如果没有几天前的大雨，如果没有战友外围的枪声，母亲的生命就会永远定格在16岁。母亲虽然历经生死无数次，但对这段经历尤为刻骨铭心，在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病重时刻，人已进入轻度昏迷状态，平时我们跟她说话都很少有反应，一天在她的病床边，我

与一位医生讲到了母亲这段特殊经历，母亲忽然间“哦哦”地身子扭动了起来，脸部表情像是想说话，仿佛她要坐起来亲自向这位医生讲述这段特殊的经历。母亲在2025年2月13日走完了她光荣的一生，享年98岁。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的功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她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这枚弥足珍贵的纪念章，是母亲的光荣，是我们做儿女的骄傲，同时也鞭策着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永远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李 辉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退休干部。

## 糖坊

III 王耀强



又到“峭寒催换木棉裘”的时节，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念起小时候村里的糖坊——那个在脑海深处里既温暖又香甜的地方。

小时候的冬天，印在记忆里就一个字：冷。好像呼呼的西北风总是刮得没完没了。下雪时，常常是鹅毛大雪。白雪晨霜，风卷平冈，遮住了菜地、盖住了麦田。河里结冰了，冰厚的地方可以站得住顽皮的孩童。低矮的茅草屋檐挂着一溜串长长且粗壮的冰凌，伸手可及。还没进三九天，人们已被冻着了：耳朵、脸蛋已是红里透紫。可怜见的是孩童们，穿着单薄，甚至还穿着开裆裤：两小手红肿，两鼻孔流涕已是标配，双脚已经生有冻疮，甚至已是开裂。

滴水成冰，幸亏村里的糖坊开张着——专门制作麦芽糖的糖坊。

原料的蒸煮、糖水的熬制使糖坊温暖如春、芳香甜润。

最开心的要数孩子们了，学童盼着放学、盼着早放寒假，可以逃离那室内外一样寒气逼人的

家、一样冰冷刺骨的教室。在这里，离开父母、老师的视野，不须读书写字，不用干家务活，无拘无束，追逐嬉闹，调皮玩耍，更有甚者，还可以吃到大师傅的赏糖，当然是麦芽糖。好不快活！

这里也是大人御寒的好去处：在麻将遭禁止、扑克不多见、娱乐又没有的冬季乡村里，晚饭后，村民们戴上帽子、笼着袖子、趿着芦花鞋，有的还叼着烟斗，不约而同，相聚于此。农闲时光的悠闲、茶余饭后的闲谈、海阔天空的唠嗑汇集于此。孩童们又多了一个选择：缠着能说会道的大人讲故事。说聊斋、聊三国，也时常讲遇鬼魂、见妖怪的，大人说得活灵活现。胆小的孩子被唬着了，夜里不敢出门，睡觉做噩梦，也有的竟尿床了。即便这样，也还总是爱听，反复听。大人们也愿意让孩子来这里，毕竟这里有免费的暖气，可少受严冬的折磨，当然还有玩伴一起玩。

加之白天里鱼贯进出的顾客，糖坊于是终日热闹如肆、门庭若市。

糖坊里最热闹、最吸人眼球的，莫过于糖浆出锅和搅糖，这是麦芽糖制备中的重要环节。

蒸馏而出的糖水，须在大铁锅中慢慢熬至脱水成糖浆。糖浆出锅的时机拿捏与火候的控制是关键点，火太大或出锅稍迟，糖起糊而影响质量。于是脱去了毛线衫、露出两膀子腱子肉的糖师傅登场了：接过大木锹，有力搅拌糖浆，节奏逐渐加快，木锹搅动着糖浆左右、上下翻飞，糖浆进一步脱水，待雾气逐渐散尽，便露出了金黄本色。每一锹掀起的糖泡，渐渐地能粘锅壁而不堕、不瘪。“出锅了！”随着糖师傅拖着长音嘹亮的一嗓子，众人围拢过来伸长脖子，眼见着大师傅用力一甩，木锹画出一个漂亮的弧圈，一个硕大的糖泡挂于锅边，久久不塌。在众人喝彩声里，糖师傅一个俯身，伸出食指，将糖泡捞出锅来，交由众人分享，更多的是赏给淌着口水的孩子们吃。

搅糖，这是重要工艺流程，也是最能引来众人观摩的一个环节。出锅的糖浆在降温石上冷却到恰当温度时，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搅打，否则，糖浆硬化无法成糖而报废。金黄色的糖浆一经搅打，最终成为人们日常所见乳白的麦芽糖成品。这需要体力，也需要技术。但见糖师傅手持类似北方人擀水饺皮用的木棍，串起糖浆，围着木桩反复用力套拉、甩打。显摆的糖师傅故意拉得慢、扯得长、甩得响，口中还有节奏地喊着号子。技术和能耐，引来大伙儿阵阵掌声和敬佩的眼光。

麦芽糖成品质地硬，如石头，但脆，轻敲则碎，入口即软，有点儿粘牙，比水果糖、黄糖、绵白糖甜度稍低。不适用范围作调料，可适合各色人等的口味和品味，特别适合作为春节时的零食和招待客人用。麦芽糖原料为纯粮食，不用添加剂。加之是在冬季制作，无蝇虻叮咬，又经高温炮制，

故也无不卫生之虞，城里人也以为稀罕物。

麦芽糖是季节性食品，它只在寒冬腊月里制作。在这个时节里，它可以随处存、随手放，不会融化。但只要立春节气一到，麦芽糖便“见风就出汗”，不易保存了。于是糖坊关门，农民们返回田间开始春耕、备耕。即便家家有冰箱保鲜、保温的今天，糖坊仍如此冬作春歇，恰似不成文的行规，节未令而行已止。

村里的糖坊专门制售麦芽糖，是十里八乡唯一的一家糖坊。隆冬是农闲季节，也称冬闲，是农民们特有的假期。可总有闲不住的农民们，正好借机开糖坊。

没有敲锣打鼓、大放鞭炮的开工仪式，也毋须张贴海报、高音喇叭的噱头宣传，糖坊一开张，便热闹不已。糖坊门口，时常会出现排队等购，甚至也出现有托人找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年关已近，离传统春节不远了。麦芽糖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重要年货、春节特供品：甜蜜吉祥，特别应景应时；用来招待来客，老少皆宜；当然，还是奖勤罚懒教育孩子的有效手段，尝到甜头的学生娃就乖了，也会有特能哭的屁孩有糖吃。

糖坊里的麦芽糖成品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糖粒子”，大小如金桔，因是滚刀剪，状如菱形，小巧玲珑，到手即可食。另一种是糖饼，呈正方形，边长约20公分左右，厚约5公分。糖饼换回家，通常用于再加工：与炒米相伴，即成炒米糖，呈圆形，大小与孩子的拳头相仿。与芝麻结合在一起，做成切片糕，有嚼劲，吃起来喷香，人称“芝麻糖”。还有来料加工的，专门制作“皮虫糖”：由麦芽糖包裹白糖炒制的芝麻粉制作而成。白糖炒制的芝麻粉须顾客自带。糖里加糖，甜上加甜，这是麦芽糖制品里的精品，于当时已是十足的奢侈品。制成的皮虫糖两头尖，中间粗，大小

如香草橄榄。只是当地有一常见昆虫，秋后如蚕结茧，色如墨，于树枝垂下。人们称之为“皮虫”，里黑外白，极神似。只是制作皮虫糖成本较高：芝麻需要自种，而芝麻收成低，一般人家里仅有的几分自留地种菜吃还赚不够。此外白糖贵，且需凭糖票方可购得。每每加工皮虫糖，众人的眼光便放出光来，更是惹得围在四周的孩童们：小嘴咂吧有声，口水跟着鼻涕一起往下趟。但大多数时候是饱眼福而无口福。

麦芽糖不论斤卖，而是以米换，另付加工费。不收糖票，也不收粮票。记忆中1斤米换7两糖，再交1毛钱加工费，这是在糖坊里的交易。一般而言，家里换糖回家，可不是给孩子吃的，是用来招待春节其间来客的，因此，吃麦芽糖是不容易的，可又特别馋。终于与发小联手换了糖：我出钱，他拿米，换了1斤米的麦芽糖。当时就是这个价，所以至今还记得。为了避免被大人发现受责备、挨打的风险，我俩在一个下午里就吃完了，没有浪费半颗糖粒子。吃太多了，实在太撑了。好在只是撑着难受，没有其他的不良反应。只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见到麦芽糖就躲，即便是皮虫糖。发小也是。

这是糖坊的换糖模式，若是在糖坊之外，可能不是这个比例了。

村里因麦芽糖而衍生出了季节性的货郎、催生了一个季节性小行业：换糖。货郎们背着麦芽糖沿村走镇，串乡入巷：只叫换，不叫卖。早上出发时，只负十数斤糖，轻轻松松。可晚上回家时肩上担的是换来的逾百斤大米。若进无锡城里卖，则获益更丰，只是路太远，且须坐船。换糖可是苦了这些货郎们，全靠脚力、力气，好在他们都是年轻力壮者。晚上货郎们相聚于塘坊里，交流着换糖的成果及所见所闻，趣闻轶事引来的阵阵欢笑，驱散了白日里的艰辛，好收成成就

着十分舒畅的心情：“提篮小卖哎~哎~哎……”虽呕哑嘲哳，却也响亮。

村里的糖坊不知道啥时候关的。现在邻村也开了家糖坊，仍只制作麦芽糖。麦芽糖还是那个色、那个形、那个味，还是一立春就“出汗”。

不同的是，麦芽糖已是江苏省名特优、非遗传承创新精品项目。

王耀强 曾供职于江苏省委统战部。

# 附中杂忆

## III 清 浅

### 一

“文革”时期，南师附中改名鲁迅中学。直到我们这一届进校前一年，校名才改回来。后来随南师院升格成南师大，又改成“南师大附中”。

附中有鲁迅园，有鲁迅纪念馆，有鲁迅塑像，有树人文学社，初中部叫树人学校，这么多与鲁迅相关的元素，导致许多人以为鲁迅是附中校友。其实，鲁迅与附中并没有关系。附中现在所在地，晚清时是江南矿路学堂，鲁迅是矿路学堂的学生，仅此而已。后来这里是中央大学的农学院。成为附中校址，是到抗战结束以后了。

### 二

我们这一届是1979年进校读初中的，是附中第二次面向全市招生。4020名考生争夺300个录取名额。记忆中我语文数学总分157，分数线是156，压着分数线惊险过关。

进校时的校长叫赵耀如，一个瘦瘦小小的小老头，喜欢背着手挺着腰板走路，气质儒雅。1982年初中毕业时，校长已是李夜光了。

我对赵耀如校长印象深刻，但是网络上关于他的介绍几乎没有。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与附中老师接触，向他们打听赵校长，竟然没有人知道附中曾有过一任校长叫赵耀如。

教务主任陈广阳，脑门上斜挂着长而稀疏的头发，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教务主任管学生工作，课前课间课后，总能看到他在校园里转悠，遇到有同学调皮捣蛋，他就板着脸批评，因之，学生都怕他。

学生另一个怕的是年级组长夏雁平老师，一个矮矮胖胖的小老太，冬天双颊总是因冻疮显得红扑扑的。怕夏老师是因为她原则性太强，有一点错误被她抓到，是一定要叫你心服口服认错才罢休。夏老师外号“夏伯阳”，是一部当时上映的苏联电影中的英雄。毕业二十年聚的时候，我到会场迟了，一进门，坐在第一排的夏老师和陈杰老师就叫出我的名字。学生记住老师很正常，但老师经手成百上千的学生，相别多年还能一口叫出名字，实在令我感动。

### 三

初一班主任是陈杰。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食堂外排队办入学手续，她站在队伍边和高晋同学聊天。高晋个子比陈老师还高，她俩当时聊天的神情就像是朋友。这一幕让当时的我隐隐有感，什么感说不清楚。现在我知道了，那就是长大的一瞬间。整个小学，我们都习惯被老师赶着、看着、管着、骂着，而陈老师与高晋轻松聊天的一幕，让我朦朦胧胧意识到中学的师生关系与小学不同了。

前几年几个同学约了去拜访陈老师，我向她回忆有一次清明节去雨花台祭拜烈士，活动过程中，大大咧咧的我把书包弄丢了，中午没饭吃，陈老师分了我一根油条一块烧饼。她完全不记得这事了。临别时，陈老师把她种的有机南瓜、柿子、蔬菜给我们每人带了几大包，让我们有回娘家之感。

迟文老师大学毕业分到附中，就接替陈杰做我们初三班主任，她是个大美女，美女往往与柔弱是一体的，即使她发火，也依旧是美丽而柔弱的，所以班上几个调皮男生如常连强、宋国庆，她根本管不住。

高中第一任班主任王世群，也是刚大学毕业，浓重的盐城口音加上激情澎湃的上课风格，以致很多画面至今历历在目。他那时就准确预测中国的崛起：“东升西落是必然趋势”，于是我们就用他浓浓盐城口音的“东升西落”代指他。

多少年后，我们班再次与王老师相聚，那时他已离开附中多年，在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除了变得持重一些外，相貌、口音、激情都没有变。

文科班班主任李代辅烟瘾大，干瘦干瘦的，佝偻着背，脸色灰暗，每咳嗽，就手握成拳，竖放在嘴前，像对着麦克风试音。课间必在走廊上过把烟瘾，上课铃响，一支烟正好抽完，烟头往窗台上一摞，进门上课。

#### 四

附中最没有老师架子的是英语老师，像教过我的刘远、施小萍、厉斌、程鸣，总是大大咧咧，思想开放，言谈幽默，喜欢与学生打成一片，所以获学生喜欢。我第一个英语老师是刘远，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英语怎么学，有一次考试作弊被她发现，给了我一个零分。正

当我羞愧难当时，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帮我背单词，这样我才知道英语单词是需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背的。她一边报单词，一边和其他老师嘻嘻哈哈说话。这就是附中英语老师的风格。

厉斌教我们高中英语，他瘦瘦高高，挺拔白净，言谈举止幽默飘逸。他是个有想法有创意的老师，英语早读，为了训练我们听力，会播放事先录制的英美原声广播，还尝试过一边播放音乐一边上课。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初中历史老师陈定侯。他绰号“高山下的花环”来自他的头发，整个顶部一毛不生，半脑处一圈鬃曲的头发如花环环绕。再就是他的两个眼睛，圆如桂圆核，普通人上眼皮最多两层，他有三层。不修边幅，因体胖，天热就穿个绷在身上的老头衫或扣子没对齐的衬衫，讲到奴隶们对夏桀的仇恨时，手臂上竖，怒目圆睁，浓浓的扬州口音“你这个可恨的太阳啊……”，大肚皮豁然从衣服里绷出。

#### 五

老坎，准确地说，应该是老堪。那是高一第



附中英语教研组老师，前排右一是刘远，二排右一是施小萍，后排右三是厉斌，后排右四是程鸣。

一堂数学课，杨志联老师点名，点到湛忠林时，“湛”字不知怎么读，犹豫片刻，一甩头发：“堪忠林”。大家都笑起来了。自此“老堪”叫开了，简写成“老坎”。老坎与我同乡，六合人，凡聚会，我都会单独敬老坎一杯。原因是有一次上游泳课，我斗胆游到深水区，被水呛了，两手乱挥，身体下沉。老坎一个猛子扎到水底，把我托起来推到池边，算是有救命之恩。

孙渐，又名孙大渐，原名孙健。在初五班，他是女排教练，带领初五班女排夺冠。在高二班，他也是女排教练，带领高二班女排夺冠。他就是附中的袁伟民。但他与袁伟民又不同，袁指导的脸太严肃，孙大渐有着一张生动的脸，笑容灿烂。

三妖徐志宁之所以屈居于“三”，是因为前面有老妖和小妖。我与三妖同窗三年，在我看，所谓“妖”，其实是他异于常人的单纯，从不掩饰，而且随性的喜怒哀乐。在文科班，三妖是历史达人，他和郑蓉晖是历史老师李代辅最喜欢的两个弟子，认为自己薪火可传了。他俩后来果然都学了历史专业。高考前，三妖最喜找人比赛快答历史得分点。每次我陪他“玩”一把后，心里都慌乱不已，觉得“完了完了，这么多没复习到”。毕业后我与三妖有过两次奇幻的相遇，一次是在毕业的那个暑假，我送姑婆回六合老家，到了十村，去我们那个镇子的班车过点了，正一筹莫展的时候，看到三妖慢悠悠骑着自行车冲我笑。亏了他的自行车，我把姑婆送回了家。另一次是在南大教学楼，我俩不期而遇。

从初五班，到高二班，再到文科班，一路同行的人只有三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卜一是三分之一(另一个是盛红)。六年，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卜一是个静悄悄的女孩儿，但她的眼睛会说话，高兴、不满、生气、疑问、同意……她用眼睛表达得都很到位。地理老师丁强(即后来的

金陵中学校长)对卜一这个名字很好奇，问她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卜一说，父母是为了让她考试时，用最少的时间在试卷上写名字，这样可以迅速进入答题状态。丁强后来给他女儿起名丁一。

## 六

当时的附中，有一个非常棒的制度，下午两节课后，是雷打不动的课后运动时间，在北操场可以借各种运动器材，满操场是运动的人。男生首选足球，大操场人多踢不开，就在篮球场踢小场子。我记忆中朱文革“铲子”的外号与铲球无关，而是因为积极招呼“踢小场子”，被戏称为“小场子”，谐音成“小铲子”，省称“铲子”。夏天还好，冬天，想不起来脱衣服，一场球踢下来，全身湿透，就这么焐到家，居然焐干了。只能说是年轻，什么都无所谓。今天想到当时把汗焐干的情形，全身起鸡皮疙瘩。

附中有长途徒步的传统，是为了纪念抗战时附中西迁那一段经历。每年的清明节，全校师生都会排着队，徒步去雨花台。附中应该是南京最早有校服的，男生土黄色，女生湖蓝色，虽今天看来，款式色调都极土，但在当时是时髦的，穿着校服走在街上，南京市民争相观看，自豪感是不用说的。

## 七

最不该忘记的，是课间食堂为我们补餐的菜包子，五分钱一个，青菜、粉丝、木耳、香干馅。那是我此生吃的最香的菜包子。

清 浅 本名余立新，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

## 倦鸟之城

|| 刘 流

### 黄寺大街

西至德胜门外大街，东至中轴路。1780年六世班禅为乾隆帝祝寿，清廷特建仿扎布伦寺须弥之庙接待，活佛后因感染天花病死于此。黄寺大街因庙而名。

当我一下飞机，踏上首都的土地，出租车飞快地在有着国门第一路之称的机场快速上疾驰，两旁的路灯杆上庆祝1990年亚运会的旗帜仍在飘扬，旗面开着多个圆圆的小孔，北方的大风正自由穿行；满大街的店铺飘荡着韦唯演唱的主题歌《亚洲雄风》，吉祥物“盼盼”出尽了风头。

沿这条街向东是北广、十月出版社。再向东是总装、总政大院及华北大酒店。中轴路即鼓楼外大街，向南正对着钟鼓楼，至二环边是六铺炕，石油部和工人日报社在那儿办公。如果穿过中轴路向东两站便是和平里，那里是人事部、煤炭部、劳动部、化工部、林业部等部委成堆的地界。从黄寺大街向西当年尚未打通，只有一小胡同，北京拖拉机厂就藏在这胡同里。

1992年，改革开放已有些年头，我作为外省企业进京的试水人员，力排众议，决心从企业和

企业产品出发，以我之长剑搏击市场。僵局很快被打开，第一笔业务来自河北省会石家庄。至今依然记起我拎着行囊，毅然决然地跨上西行列车时的悲壮背影。

我们租住的大楼太大了：主楼3层3500平方米，附楼1500平方米。老板巴望着在京设立据点，用于综合经营，可惜又派不出这方面的人才。很快只好将它转租给一家刚创业但起步较高的房地产公司，只留下数间用于办公住宿之用。

初次进京我们团队只有三人：老卜、小杜和我。他俩比我早一个月进京，后来真正留下来而且一留就是三十多年的却是我。老卜回集团任书记兼副总。小杜在总部干了几年又重新返京子承父业，在建筑业干得风声水起，多年前已成亿万富翁。

### 花市上三条 88 号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门牌，是个小院，普通市民家的那种。沿街后盖了一幢二层小楼。一扇铁门进去，下两级台阶便是正房。正房开间不大，分隔为二，进深倒不浅，两边可通达3个房



间。小楼与正房之间东侧是小间，用作茶水、小炊之用。西侧种一石榴树，开花结果时都特精神。

主人姓柴，老家沧州。祖上闯京城，在花市做小买卖所得购了此院，并由此开花散叶。传到这一代为哥仨，个头都不高，一米六五以下。老大憨厚，老三就一毛孩，唯老二略周正，老二当家。住进此院未见他们的父母，也不便问，遂成谜。哥仨注册一公司，专业代理飞利浦照明产品，也就是各式灯泡。牌子是大牌子，又是北京的总代，生意很红火。除了进货，就是忙着往北京各大商城送货。那时还没有超市这个业态，当年的蓝鸟、赛特、贵友，友谊、王府井等著名商场都卖他家的产品。

古代京城做买卖的都在南城，崇文、宣武一带。卖珠宝的叫珠市口，卖瓷器的叫磁器口，卖菜的叫菜市口(后来成了紫禁城外秋斩的地方)，卖骡马的叫骡马寺大街，花市大街过去是卖花

的，当然不是鲜花，而是绒花，有点岁数的人都见过。原就一条街，后来衍生出一大片街区。街区内也要行车、走路，就又开出头条二条三条，各条越延越长，又分成上中下三段。上三条88号，即在三条上段路北，隔着三四户是个公家院：崇文门派出所。

西行百米便是崇文门，即当年和珅收关税银两所在，城门已在修地铁时拆了。路口最有名的当数便宜房烤鸭店，京城焖煮烤鸭的代表(另一名号全聚德则是挂炉烤鸭的鼻祖)，全程暗火烘烤，鸭皮零杂实并保留更多汁水，价格自然也不菲，只有贵宾光临我才舍得在此请客。路口东南西北各有四个酒店，分别为京朗、哈利门、崇文门、华侨，二至四星都有。西南角沿街是著名的马克西姆西餐厅，门口长年停一老爷车，每回路过门前，隔着玻璃窗和旋转门，总让人想象着门内另一个世界的神秘。

## 团结湖

北行途经同仁医院，京城名院，以“耳鼻喉眼”专科而名世。行至东单路口，西侧就是东单公园，一市民公园，不大，我坐车常打门前经过，晚饭后偶尔散步走过去约摸也就二十分钟。

花市主街历经数百年沧桑，沿街有银行、邮局、酒店、饭馆、杂货铺、新华书店、电影院、宾馆等，街口又新建了一个不小的百货商场，妥妥的崇文门一带的商业中心了。记忆最深的要数新华书店与花市大酒店。前者据我当年所知，可能是四九城为数不多仅次于王府井新华书店规模的综合书店。这对爱书的我无疑是天大喜事。每当奔波四方的我站在书店高大的书架前，阅读那些刚上架的新书时，一周的疲倦便一扫而去。当然彼时我也基本不写东西了，正如我在诗集《时间与幻象》所言，“保持第一流的阅读与交往，保持物欲横流中的灵魂警觉”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因此地距北京站(那时尚无西站和新南站)仅一两公里，业务客户经过时总愿喝杯酒再继续下一段行程。也有一些文友在京城借用或过境来混上几次，我只有尽己所能相助了。花市大酒店便是我经常安排住宿之所。名为大酒店，其实是一幢老建筑改建而成。大酒店的西侧有小教堂，不知建于何年何月，不大但规范。作为尾声，后来被我写进那些年为数不多的诗歌《一个小旅馆的夜晚》中。

故乡河水中那些隐秘的暗流  
正在回忆中自然汇合  
旧时的诗稿  
茫然地铺在木桌上  
于阴晦的天色下无人问津  
转过身去  
晚钟已经轻轻敲响  
窗外那座尖顶的教堂  
缓缓陷入夜晚的潮汐

1994年，我搬到团结湖，这是我在京的第三个借居之所，在亚运会举重比赛的朝阳体育馆的姚家园路附近，距团结湖公园也就两三公里。三环上靠得最近的是兆龙桥，因船王包玉刚先生为纪念其父包兆龙投资的兆龙饭店而命名。农业部、中国文联大楼在桥东。如果沿三环路向北，一箭之遥，便是农展馆、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中国文联大厦里有出版社、杂志社等文化机构。附楼是文联招待所，来京办事的外地文人常宿之地。其时《诗刊》等名报名刊都在里面办公。

团结湖公园门口有一冒牌的中澳合资酒店，酒店门口矗立着两国和公司旗帜。那年头，人们见得少，甚觉庄重，与京城气质契合。菜品以创新菜为主，价格中高档。在一群成名或未成名的诗人们中，我算稍具接待能力。

业务和日子都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我的生活似乎多了些颜色。在团结湖公园内有一园中园，叫五月花园。出道多年的诗歌翻译家马高明夫妇在此打理着一家紫砂店。展架合围的空白处，每月都会有一场小型沙龙。如果碰巧有外地诗人来京，也被延引至此。

后来这个沙龙移至红庙人民日报社附近的朝阳文化馆，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我不是每次都去。记得那年年末的一次活动，是食指《相信未来》诗歌朗诵演唱会，我带着还在读初中的女儿去参加了。那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

喻静是那段时间认识的北大才女，当年浙江某市高考的文科状元，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艺术报》编副刊。她在《中国艺术报》副刊、出版社、研究院文化所的不同时期，以文化学者的身份采访编发过许多文化名宿。现在她已是中国艺术

研究院副院长兼文化所所长了。

陈剑澜先生从北大硕士毕业后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老牌刊物《文艺研究》工作，两年后又考入北大哲学系，读完叶朗教授的博士生返岗，后在副社长岗位上干了多年。他那时工作生活都在恭王府。办公室和宿舍都是木结构、国家级文物，严禁明火。推开后窗便是现在的5A级景区恭王府后花园了。剑澜编刊之余，还常主持策划一些文化活动。几年前，他加盟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了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电话中，他的声音依旧是那么谦和、简洁欢快，这是涵养半生从骨子里发出的声音了。

因了这些工作之外的人际交往，我那阵子除了在《诗刊》《诗神》《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点诗文旧作之外，还写了一个小中篇《隐痛》，用了“朴农”的笔名，在河北文联主办的双月刊《长城》杂志发表。京城文艺气氛浓郁，常有机会在音乐厅、小剧场听音乐看话剧（当然，门票都拜我各报的娱记好友所赠）。记得去人艺小剧场看了一场先锋话剧叫《屋顶》，那是后来成了大明星的陈好的首秀，表现的是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扭曲与伤害。《隐痛》的创意一定程度受到此剧的影响。

## 乔 庄

乔庄地处通州区，定居于此宣告在京城迁徙之旅的彻底结束。虽然仍非京籍，但也不能算暂住者了。当年选择定居于此，其实出于一种巧合。2003年，一日我与乡党全君转至京东通州城区，无意看到一楼盘门前的广告牌上夺目的三个大字：“白居易”，仔细再看，在“白”与“居”之间藏着个小号的“领”字，原来是“白领居易”。这一文案策划显然十分成功，长安米贵，“居京城，大不易”，对于一个在京漂泊十多年的异乡人来

讲，居而有定所，可谓是一大梦想。一打听楼盘的运作也确如其氛，低至两万的低门槛首付款让我俩当场交了定金，分别订下位于联排户型首尾的东西两户。

乔庄地处通州京杭大运河西侧，当年购房时算北京近郊区，虽有京通快速路和地铁八通线加持仍为偏僻之地。未曾想前些年为疏解首都功能，中央决定将北京市行政中心全盘东移，新的政府大楼与乔庄隔河相望，乔庄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市的中心区域。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恢复了碧波万顷的旧颜，遥想当年皇帝下江南便是自此登舟，扬帆起航。但对我而言，这条河流已经足以慰藉一个游子的思乡怀旧之心了。

有一天，留学归来的女儿不经意地给我发了一张北京市居民身份证照片，我的心竟遭深深一击：一个年代结束了，女儿再也不用过父辈那种辗转奔波的生活了。这么想来，当年选择白领居易定居也许是冥冥之中神的安排。

那天又做一梦，我在奥体森林的树上搭了一个巨大的鸟巢，一只只倦鸟敛起羽翼，安静地栖落其间。他们间或啾鸣，间或跳跃，自由自在的样子，就像回到了各自的故乡。

刘 流 作家、诗人。

## 城南旧事老村庄

III 张其全

—

小镇背后横躺着一条曲里拐弯的街道，应该叫“后街”，但当地人都叫“街(音‘该’)后”。这个四面环水、状若葫芦的闭塞小镇似乎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比方把“爸”唤作“爷”，管“爷爷”叫“爹爹”。

但我的幼儿园老师钱知青毕竟不是当地人，若干年后，我看到他在一篇怀旧博文中，还是把“街后”写成了“后街”，他怀想小镇“街后的那口老井”成了“后街上的那口老井”。

几十年前，他还是个大男孩，某年初冬的一天，从插队的生产队到镇上赶集，曾热血沸腾地跳到那口井里去救一个据说是落水的“伢子”。结果折腾了半天，才得知那个“伢子”根本就没掉井里——在草垛后躲猫猫呢。

钱知青当年刚到我们生产队时，年轻，力气小，个子高，走路晃荡，“一叉一叉的”。有过农活体验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人如果与之协同抬担子，对同伴来说，无疑就是一场灾难。钱知青当然不可能是“基干兵”了，只能派到妇女组搭把手。

钱知青后来连妇女组也待不下去了。刚好生产队组建“幼儿园”——我家的西厢房内、门前大槐树下，十来个“小伢子”，他当仁不让当老师来了。说白了，因为做不了农事，队里只好因人设岗，给他派了一个带孩子的婆妈活。

感谢钱知青的“不能干”，才让我幸运地比邻村孩童多了一份幼儿园生活体验。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是直接上一年级的。我的幼儿园生活尽管不过三个月时间，只有一个小皮球可供拍打玩耍，只被教会一首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但，直到现在，有机会去K歌时，《红星照我去战斗》仍然是我的保留曲目之一。

我对大男孩时的钱知青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只模模糊糊记得他穿一条挺括的草绿色灯芯绒裤子。但这个模糊印象却钉子一样楔入我的潜意识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区分城里人和农村人的标志物就是看是否穿了灯芯绒面料。

钱老师后来回城当了工人。让人预料不到的是，钱知青们历经千辛万苦以为终于登上时代列车了，哪知还没经过几站地，很多人却又被挤到站台上，成了20世纪末城市职工下岗潮的首当其冲者。

## 二

小学时，我每天必经一段渠堤，堤下面是清冽冽的一面水塘，水塘边长满了芦苇、蒲草。夏天的傍晚，芦苇上会落下直升机般俊朗的绿眼蜻蜓，秋霜深处的蒲棒则摇曳如风中红蜡烛……

记忆中的场景总会让我想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婉约画面。我的小学老师，吴知青就住在水塘旁边的茅屋里。吴知青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们村的知青，1980年春天才返城，整整在乡下十年。

她与我家相处极好，在村上十年，好几个春节都在我家过的。1990年代初，我考到南京上学，吴知青不知从何渠道得知，数次去学校找我未果。有一次竟站在校门口一整天，一个个查看，终不得见。后来才晓得，我是在江南的空军气象学院，而她却去了江北的南京气象学院……

至今想来，吴知青到底教给我什么？实在记不清了。我那时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她提前带我在一年级“混混”。既然是“混混”，估计也就没具体教给多少东西，但我知道，我对城市最初的、懵懂的印象、向往，源于吴知青茅屋夜读时射出的微弱灯光。尽管不是足够的亮，但毕竟映照出水塘的一片，并种子一样发芽生长于一个农村孩子幼小的心田里。

那些年春节，她一来，我奶奶都会为她盛上为数不多的肉馅饺子，并随时准备用筷子敲打我过于频繁伸向菜碗的手。奶奶会不厌其烦私下告诫我们，她是城里伢子，是客人，要把好东西留给客人吃。

奶奶哪里能想得到，回城之后的吴知青，对于村庄的记忆与深情，相较像我这样早早考学离家的乡下孩子来说，倒是反客为主的。吴知青至今能说一口纯正的我的家乡话，她对插队村庄风

土人情的无死角把握，以及方言俚语的精准说道，常常让我这个生怕说家乡话露怯的土著汗颜。

吴知青曾坦言：我也曾抱怨过那段经历！但当我插队十年后回城的那天，一个村子的父老乡亲全部走出家门含泪相送时，我知道这里的老百姓并不亏欠我，相反，他们在苦难年代无私给予我的真情，是我一辈子也还不完的。

南京老城南，吴知青家里，玻璃台板下面的诸多黑白老照片，几乎完美展示了1970年代我老家的各种风貌，草房子、破桌子、野孩子，最多的还是一期期的小学毕业情形。

照片中，年轻的吴老师白衣黑裙，拖着一条油黑的大辫子，眼眸温润，安静地站在一群破衣烂衫的孩子间。

## 三

上中学后，我们学校从校领导到任课教师，有好几位知青。

知青胡老师，“文革”后考的师专，教我们数学兼音乐。她多少年如一日顽强地说着南京话，尤其是南京口头禅“呃是啊”从不离口。她每次上课后，总会激起一帮男孩跟着学说“呃是啊”，大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势。胡知青于1980年代末调回南京，不知在哪所中学。

教语文的俞知青，是我们那所农村中学少数几个能把普通话说得不“普通”的——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俞知青长身玉立，浓眉大眼，爱穿一件米黄风衣，课讲得极有魅力，字写得也潇洒大方。不过，他最“网红”吸睛的事还是当众点亮汽油灯。

1980年代，在苏北农村，那些急于跳龙门，两眼通红熬夜看书的学生，对“电”总是心情复

杂：“通电”是大事，“停电”是大概率的事，“来电”似乎是件不太正常的事。一到晚上，“来电喽”的意外和兴奋，会在不确定时段瞬间爆棚。

所以，汽油灯是各个班级必备利器，文艺一点的说辞是：汽油灯点亮了我们那帮穷孩子的心中灯，照亮了前行的路。

何为汽油灯？上部为灯顶，下部为灯座，内装煤油，中间是石棉网纱罩。灯座上有打气管子，打进空气后把煤油从一组小孔中压出，喷成雾状小滴，化为蒸汽，跟空气均匀混合后燃烧，使纱罩发出炽热光亮……

复杂吧，不光物理要好，化学也起码及格以上！因此，点汽油灯就是一件颇见技术功底的理工男活儿了。按理说，这活儿最适宜人选应该非物理、化学老师莫属，但偏偏是教语文的俞知青。

经典画面如此这般：米黄风衣在身的俞知青弯下腰，提灯、倒油、拧开关，吭哧吭哧打气，整个动作要领一气呵成，优雅迷人。俞知青练得好说得更好，他点汽油灯之时，就是向我们传道授业物理、化学知识之机，娓娓道来，丝丝入扣。

至今想来，俞知青点汽油灯的场景，更像是处在一个温热的、躁动不安的炕房里。冬天的夜

晚，光影极晕黄暗红，围着俞知青的，是一帮啄壳刚出的小鸡仔，叽叽喳喳之声不断。这样的画风，为我们那个物质贫乏的初中年代，平添了无垠春草般的生机。汽油灯点亮后，俞知青通常是站起来先掬一把头发，然后亮起他的“好声音”，大声说，好了，好了，上自习了，上自习了……带着一身汽油味而去。

俞老师点汽油灯这事对我有两点启示，一是他深得学生极度尊重，甚至最终俘获师娘之心的，极有可能就是一身攻势凌厉的汽油味；二是我的物理、化学知识，大部分确实是语文老师教的。

如果说当年农村是一方寂寞无声的湖面，那他们就是激起层层涟漪的石子，虽然不可能击穿到湖底，改变整个湖水走向，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知青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才使得湖水里众多小鱼儿学着去推开通向湖外世界的窗。

张其全 南京市江宁区纪委工作，著有散文集《赤脚奔跑》。

## 狗缘

III 陈友锋

狗是如何判断人类，如何与人建立信任感的？一直都是一个谜。读不懂，猜不透。

楼下阿姨家收留了一只瘦骨嶙峋的卷毛流浪狗，而且是病的，就像人的气管被灌入了风，流浪的小母狗一直哞，看着就让人难受。它在楼群四周翻检垃圾桶里的残羹冷炙，偶尔有好心人把吃剩的骨头放在它的必经之路，它也可以偶尔坐享其成，打打牙祭。

被收留的流浪狗从此不再颠沛流离，阿姨在她家车库旁搭一个简易的狗窝，就是一个架子，一块苫布围起来的，铺一条用不上的被子，虽算不上奢华，但足够遮风挡雨，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最初的最初，这只灰色的小狗因为有病，因为被收留，好像天然就怯懦，平日里除了追着女主人，撒娇一般撕咬女主人的裤脚，显出一点儿“狗”的野性来。而面对来来往往的路人，几乎缺乏直视的胆量，远远地躲在角落里，也斜着路人走远，才慢吞吞地出来闲逛，等人走近，它又灰溜溜地跑到墙角，蜷缩在那里，可怜的爱气小媳妇一般，惹人疼惜。

年初，这只小狗做了妈妈，生了五只宝宝。“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好像说的不仅仅是人，狗亦如此。路人经过它的窝去开车或者回家，毫无

恶意，甚至可能因为匆忙都没有在车群中“多看它一眼”，它也非常警惕地盯着路人，站起身来狂吠，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唯恐路人伤害它的狗宝，即便是每每招来女主人的呵斥，依旧张嘴龇牙盯着路人的一举一动，时刻准备撕咬的架势。

不知道为什么，这只小母狗对我却丝毫没有敌意。妻子调侃我，你不仅有小孩子缘，还有狗缘。早春时节，我拿着相机拍它的宝宝，它只是趴在那里望着脚步不稳、趑趄趑趑还喜欢到处猎奇的小奶狗，偶尔站起来张望一下，继续放松着紧张着。因为喜欢拍奶狗，萌萌的样子，想着不能白让它们做模特，所以，每次下来，我都会带一根火腿肠，分成一截一截的，引逗着奶狗离开妈妈，到草丛里，到蜀葵边。

小奶狗一天天硬实起来，脚步也变得轻盈欢快。离开妈妈的奶狗撒开了欢儿，叼着抢到的火腿肠远远地跑开，发出呜呜的声音，警告同伴和路人。小母狗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偶尔，抬眼看看，也不吠叫。我拍几只奶狗抢一块骨头，拍它们在开满蓝色地丁花的草坪上追逐嬉戏，拍它们撕咬蜀葵去年留下的枯枝……最初，我也是路人，和它并无交道，也没有想要亲近的念头。只是今年喜欢它的几个奶狗，拍几次照，给几根

火腿肠，它竟然丝毫没有戒备之心和防备之行。

不明白它的直感何来？怎么就判断我是无害的。尤其是它的几个狗宝，只要我下楼，它们就乐颠颠地疾跑过来，哪怕我手里没有食物，信任就像它从小就是我的家族成员，抑或我是它们的家族一员。在某一个黄昏的温馨时刻，我生出强烈的愿望，领养那只纯黑的小狗，每天给它瘙痒，摩挲腮骨，让它躺在脚边，感受绒般丝滑的质感。可是，妻子却讨厌到处飞的狗毛和浓郁得仿佛永远消除不掉的狗味。

所以，这种想法常常被扼杀在摇篮里。但我依旧喜欢猫猫狗狗，尤其是小型的宠物。

朋友家的一只宠物狗璐璐，马璐璐，朋友给小狗起了个“宝贵”而可爱的名字，并且把自己的姓氏也给了它，让它变成了家庭中的第四人。

看过的一部电影《向日葵和幼犬的七天》，面对即将被“处理掉”的流浪狗，即便只负责七天的神崎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母狗和小狗，里美给母狗起了一个向日葵的名字，“既然我都给它取了名字，它就是我们的家人了，既然是我们的家人，就不要说不救的话。”给它一个名字，让它从此不再是无名无姓无家的流浪狗，而是带着“我”的印记“人”。“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起一个温暖的名字”，那山，那河，便不再颠沛流离，因为它们带着一个温暖的名字和背后的目光在时间的横轴与纵轴里前瞻与回望。

一条狗如此，一座山如此，一朵玫瑰花也是如此。

“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她和你们一样。可是，她单独一朵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她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之外)

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因为她是我的玫瑰。”小王子的玫瑰花是整个玫瑰园之外的唯一存在，就是因为那一朵是独“我的玫瑰”，我的目光和爱浇灌出的花朵。

给予了它的名字，便与它有了联结的情感纽带，就像赋予它生命滋养的脐带。

所以，我们目之所及，只要是宠物，好像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名字，朋友家的土狗黄灿灿，两只英短核桃和闹闹，曾经养过的玄凤鹦鹉小猪……不仅有名有姓，而且似乎都被主人训练或者培养出了与众不同的“特长”。

璐璐是被朋友养得精致的宠物，只要你把鞋子伸到它面前，它就用脖颈的毛发蹭来蹭去，给你擦鞋子。那次去朋友家里做客，陌生人的闯入，它狂吠不止，被一顿呵斥后依旧不安分。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它坐在我们中间，我用手去摩挲它的腮骨，它十分享受的样子。当我停下来，它的一只手就搭在我的手上，仿佛发出无声的热情邀请，我继续摩挲，停下，它的手又搭上来，反反复复，就像游戏一般，你来我往，我离开，它邀请。

驯养一只宠物，享受与宠物在一起的时光，抑或分别后甜蜜的挂牵。如果你想，就去和一只狗结缘，或者猫也可，鸟也可，甚至仓鼠……她们带给我们精神的抚慰与滋养。

我想给楼下的五只奶狗起一个别样的名字，可是，有一天，楼下的狗窝安静了。女主人说，太多了，喂不起，就都送人了。我想，它们一定会遇到有缘人，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名字，然后，铺展开一段更活泼泼、鲜亮亮的生活。

陈友锋 江苏省张家港市张家港高级中学教师。

## 加拿大散记（二）

III 郑亚楠



魁北克市

### 拥有古老城墙的城市——魁北克市

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的法定假日。隔天，我们全家去魁北克市游玩，魁北克市(又称魁城)，这个魁北克省的省会，不仅是加拿大东部的重要港口，还是北美洲至今唯一拥有古老城墙的城市。

车子开进市区，浓郁的法兰西风情迎面扑来，古老的城门、厚实的城墙。我们将车停妥，走出停车场，爬上古城墙，魁北克市全景尽收眼底。远处群山连绵青黛，居高临下，老城内各处法式建筑、城门、老街、兵营，载有游客的马车，17世纪的古老教堂和城堡，均显示出这座古老城市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历史沧桑。马蹄的得得声回响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我们兴致盎然来到兵器广场，一排排兵营，一尊尊火炮，令人想起17世纪，英法两国为了争夺这块土地，先后发动了数场战争。1690年，总督芳提纳客(Comte de Frontenac)击退来犯的英军，保住了魁北克市。

然而，1759年，亚伯拉罕平原之战后，魁城又落入英国人手中。此后，在英国统治下，魁城加强防御工事，建成以城墙围绕的坚固堡垒，城墙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城墙的防御工事，曾经有三扇门，是由法国工程师Lery于1745年建造，开始建造时用泥土和砖石砌成，一系列的堡垒和窗口，结合地形匹配完美。以后进行改建，扩充了套件以及到城市的其他战线。19世纪下半叶，防御工事因生活太平而显得过时，一时被人们视为商业经济发展的障碍，将之废弃并要拆除。总督达菲林勋爵获知消息后，前往阻止拆除时，三扇门已经不见了。1874年，总督和民众围绕城市的美化和发展，制定完善的计划，在城墙防御工事的旧围栏和新门外，建造了一条步道，确保了街道的延展连续性。多亏了总督，魁北克市保留下4.6公里的防御工事。1985年，老魁北克历史街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魁市下属八个区，这座魁北克省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蒙特利尔），由于国家机构很多，所以政府公务员大都集中于此。全市有二十多个博物馆，有许多视觉艺术方面的艺术家，从事绘画、雕塑、铜版画、摄影、动画和演出活动。每年有超过400万游客来此旅游度假。夏天温度适宜（摄氏10度至30度），是魁城的旅游旺季，四面八方到此度假的人们，徜徉在节日氛围之中，圣路易区街道两边的咖啡馆、酒吧间，到处是为美食、咖啡、啤酒而踊跃排队的游客。各种肤色的人群，花团锦簇装点门面的店家，吸引人们欣赏异域风光和法式小吃。

饭后，我们前往在网上预订的旅馆，旅馆门牌60号，有两道门，大门推开后，第二道门需按密码，方能进入，不见服务员，柜台上印有住宿人名的信封，旅客启封后即可取得房卡（有单子需要填写），知道了房间号，我们直接上楼，进入房间休息，整洁明亮的朝南房间布置温馨，大概以前是私人住宅，楼上楼下，设施一应俱全。房间窗户上的彩色玻璃图案令人瞩目。

休息片刻后，我们下楼，径直去费尔蒙芳堤娜城堡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有旅游大巴停在广场一角，定睛一看，车上英文SAFEWAY TOURS旁赫然四个汉字“泰安旅游”，也许是华人办的旅游公司广告吧，万里之外看到中文，不禁多看两眼。街边的石墙上挂有各种材质的法文记事牌，我驻足拍摄、查看翻译，内容不一：有块牌子记录了石墙后的一家埃斯图克剧院（1959—1968），剧院以前是个旧马厩，最初由三位年轻爱好者于1957年创立，马厩被改造成80个座位的展厅。到60年代，魁北克戏剧活动的主管者埃斯图克将剧院发展成120个座位。此后，剧院活动迅速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必需，在各种节目中树立了自己的名声，经典与当代、传统与

前卫的作品吸引观众络绎不绝。埃斯图克还与该领域的利益相关者，一起为三叉戟剧院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有块漂亮的铜牌，记录了首次获得加拿大发明专利的人Noah Cushing，他的发明是由加拿大爱德华省在此处的议会大厅里颁布的。1824年6月，发明者收获了一台洗衣机。还有块牌子记录了该处房子主人为保皇党人托马斯·阿斯顿·科林，房子于1795年建造，1816年，房子成为法官托马斯·杜姆的财产。1840年至1896年间，魁北克市的第一个永久性市政厅位于此处……热闹的圣路易街石墙上各种纪实文字的介绍，为魁城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光彩，也引起了游客的关注。

往前不远，芳堤娜广场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时不时爆发出哄笑声，在“新法兰西之父”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的雕像下，几个玩杂耍的艺人，正做出各种惊悚而滑稽的动作，逗得观众哈哈大笑。1608年6月3日，法国人萨缪尔·德·尚普兰第一个发现了这片土地，为其命名“魁北克”，意为“河流变窄的地方”，并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开启了法国在加拿大地区的殖民统治（称为“新法兰西”）。

广场上最令人瞩目的是芳堤娜城堡，城堡占地面积135公顷，非常壮观，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建于19世纪末的一系列古堡大饭店之一，它落成于1893年。城堡之名源于总督芳堤娜伯爵，作为对总督的纪念，更是对历史的致敬。城堡酒店装修风格典雅而豪华，旋转门、复古吊灯、精致的相框，每个细节都透出历史的韵味。酒店拥有640间客房，被誉为全球“最上镜的酒店”，青铜色屋顶、古朴的红色砖墙，充满高雅的法国古堡气派，它矗立在峭壁之上俯瞰广场旁的圣劳伦斯河，不仅是魁城的地标性建筑，更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芳堤娜城堡

魁城坐落于圣劳伦斯河北岸，控制新法兰西水路入口，因而有“美洲的直布罗陀”之称。城市位于圣劳伦斯河与圣查尔斯河的汇合处，依地势分为上城和下城两部分。上城建在河岸边的悬崖戴蒙岬角上，魁北克市高达十多米的城墙建在上城；下城临河，建于岬角峭壁下的下城，是魁北克最早发展商业的地区，街头狭窄，房子密集，有许多具有特色的法式酒吧、咖啡馆和餐厅，上、下城之间有道路、电梯和缆索铁路。

绕过老城墙，我们来到下城区的小尚普兰街（也称小香普兰街），这里是尚普兰最先兴建的住家之地，也是北美法国文化的发源地。小尚普兰街，商业活动很早就开始，有钱的商人在此开埠、建造。街路上上下下，坡度变化甚大，有缆车可以直上高处。但便捷通达的同时，会失去游走的乐趣，我们还是选择步行。漫步于“北美最古老繁华的商业街”，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大量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法兰西时期的建筑，特色浓郁的店

铺，充满浪漫的法式风情，年轻的姑娘与男友在街头拥吻，毫无顾忌。路旁分布着各式美轮美奂的精品店、艺术画廊、餐厅和咖啡馆，许多房屋装饰着铁艺阳台和彩色的百叶窗，犹如置身于法国城镇，弹着巴拉圭竖琴的白发老人，悠扬的歌声飘至不远处的皇家广场上，那里，游客和儿童或站立或就地围坐，津津有味地观看艺人的杂耍表演。广场中央有路易十四的半身铜像。四周均为当年富商们的房子。每年夏天，广场都举办音乐会和艺人表演，非常热闹。这里80%的人为法国后裔，95%的人说法语，法语是魁省官方语言。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游览加拿大第三大瀑布——蒙特摩伦西瀑布。天气很好，阳光充足，显得天空格外明亮。我们沿着搭上木板的栈道前行，山上的树林浓荫蔽日，路旁的树根盘根错节，山石呈片石状层层叠叠。还没走近瀑布，就听到轰隆隆的声响。进大门后见一座靠近瀑布悬挂的悬桥，我站在铁索桥头举目四望，头顶上方，瀑布从峭壁悬崖倾泻而下，声势浩大；脚下，万丈深渊，波涛滚滚，怒吼声响彻山谷间。蒙特摩伦西瀑布高272英尺，高度为尼亚加拉瀑布的1.5倍，桥的两面虽有栅栏，但站在铁索桥板上，我的恐高症发作，两腿发软，实在没有胆量走过去，只得在桥头拍了几张瀑布照片。正踌躇不前，两个看似小学生的女娃拉住溜索的手环从钢绳另一端，飞滑而来，进入我的镜头，女娃的勇敢，令我连连感叹，暗自羞愧。随后，我们选择穿过铁道路轨，走到瀑布脚下驻足，感受扑面而来的水雾，仰看银河落九天。蒙特摩伦西瀑布位于魁北克市以东约9公里处，是蒙特摩伦西河注入圣劳伦斯河时形成的。走近瀑布下方，隆隆声响如万壑奔雷，道道水花溅起的水珠迎面扑来，烈日下，给游人增添了欢乐的笑声和美妙的感受。蒙特摩伦西瀑布又被人们称为“水晶”瀑布，特别

是在冬季，当瀑布被冰冻后，就像一块巨大的水晶嵌在山壁，成为攀冰爱好者的圣地。

### 首都渥太华市

8月10日，我们全家去渥太华玩。“渥太华”名称来自亚冈昆语，意为“贸易”，华人常简称为渥京。渥太华是加拿大的首都，也是该国第四大城市，人口约为132.4万，面积4715平方公里。渥太华大学、卡尔顿大学是该市主要高等学府，人口受教育程度居全国首位，其博士生密集度与美国波士顿持平。

城市位于渥太华河南岸，多伦多以东400公里，蒙特利尔以西190公里。由于距离较近，我们此行当天来回。上午十点出发，阳光明媚，天空澄澈，满眼绿野芳草，两个多小时后到达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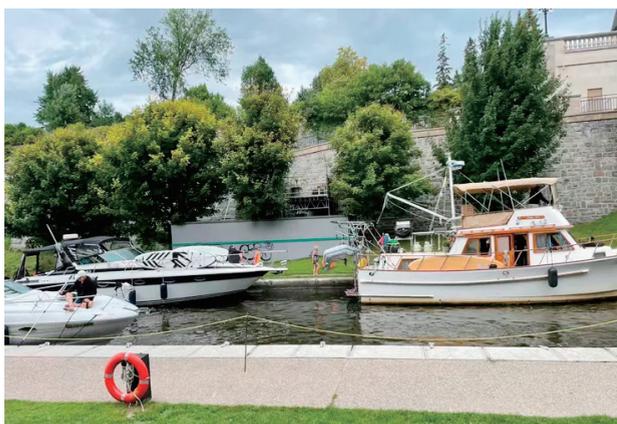
渥太华的地理特征包括许多小山丘和河谷平原，平均海拔约109米。市区内，渥太华河由西向东湍流而过，将整个城市南北分开；里多运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注入城北的渥太华河。渥太华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水、陆、空交通枢纽，周围被加拿大地盾的岩石群所包围。一路上只见大道两旁的山坡留下开山劈路的凿痕，磊磊山石截成宽阔大道，蔚为壮观。

下车后，我们来到渥太华市区，令人瞩目的唐人街牌楼非常华丽，画梁雕栋，大大小小的琉璃瓦顶有九层重檐。我们在一家名为“小黔院”的饭店用午餐，饭后，我们一起来到首都国会山。

走进上议院、下议院的入口处，只见宽阔的广场上耸立着哥特式建筑群国会大厦，大片建筑初建于1859年，1865年完工，1916年毁于一场大火，之后按原样重建，于1922年完工。国会山由三个区中央区、东区和西区组成，是目前加拿大政府，以及参、众议院的所在地，庄严肃穆的

圆形大厅里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大理石雕像。在国会大厦前，有一尊雕像醒目伫立，雕像底座题为Borden(1854—1937)，他就是罗伯特·莱尔德·博登，一战中的加拿大第九任总理，身为律师、历史学家及教育家，1901年成为保守党领袖，致力于公务制度改革，电话、电报公有化，特惠贸易等。他反对经济上依赖美国，强调加拿大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性，为加拿大在国际联盟中赢得单独的席位。其肖像印于100加元的纸币。广场中心还有为纪念加拿大建国百年而建的长明火台，火台之火点燃于1967年的除夕夜，四周雕刻有加拿大各省的徽章，并记载着各省加入联邦的日期。中央矗立有著名的和平塔(Peace Tower)，高达90米，被誉为世界上最精致的哥特式建筑，和平塔包括一座4.88米的四面钟，以及53个铃铛组成的定期演奏的钟琴。钟楼上飘扬着枫树叶国旗，渥太华河畔一系列石砌铜顶的哥特式建筑物巍然耸立，象征着加拿大民族刚毅不屈的精神。在国会山所有建筑中，东区最接近其原始设计，是世界上维多利亚时代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最美典范之一，其尊严和高贵的气质，源自建筑师受到哥特式装饰和浪漫主义的启发，以自然和历史为灵感，在这里能找到皇家纹章独角兽的代表。我们到国会山的时间不巧，上议院的脚手架还没拆除，不能进入内部参观。一个多世纪以来，恶劣的天气、水分、霜冻和解冻，导致大厦的结构被严重损坏，专家和工程团队正在从事稳定结构、恢复石砌体、更换部分铜屋顶，并保护装饰性屋顶。工人们风化了的石头、雕塑和铜顶进行修复时，仍然使用传统的工具手工完成，令人由衷地赞叹其对建筑保护和热爱的精神。

离开国会山，我们来到里多运河旁的一家咖啡店休息，走出咖啡店，耳边传来一阵嘈杂声，只见不少游客站在里多河岸的高处，向河面观



里多运河的游船在等待开闸



闸站高处两个男子奋臂摇动绞轮，船只开过后，闸门关闭，这种手工操作方式再现了19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

看，原来人们正在观赏运河开闸。

此时，河道内多艘游船在调整航向，等待水位抬高到适航深度。每当它们行驶到一段河面，船后的闸门便徐徐关闭，真是各地有各地独特的风景，我兴奋地跟随拍摄“一闸放开一闸拦”的

画面，不禁想起我的故乡长江口进入市区的水闸，那里，北大街的定波闸为著名的风景点——“桥上桥、庙上庙”，闸门随着江水的潮汐起落而开闭。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兴修水利和驳岸，抽干河水，定波闸裸露出全貌，我和母亲、姐姐在河床上留下了珍贵的摄影照片……猛然间，一阵说笑声使我回过神来，只见里多河面多艘游船紧挨一起，有两个戴着太阳帽的撑篙姑娘，站立船头，热情地与岸上的游客交谈，闸站高处两个男子正在奋臂摇动绞轮，前面的两扇闸门渐渐稀开一条缝隙，上游的河水哗哗地从缝隙中倾泻而下，水位越来越高，直到闸门全部打开，姑娘们的游船很快上升到与上游水位持平，游船开至上方水段后，这一闸门又徐徐关闭，就这样，船只一路从下游到上游，顺流而上，“水往高处流”，应了孟子之语“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里多运河(Rideau Canal)是19世纪建于北美，至今仍在继续营运的最古老、最庞大的运河系统。它全长202公里，竣工于1832年，最早为行驶蒸汽船而设计，它包括47个石建水闸、53个水坝、6座碉堡和1座要塞，后在多个闸站又增建了防御性闸门，1846年至1848年间，为了加固金斯顿港口的防御工事，又建造了4个圆形石堡。里多运河建筑见证了最初旨在保卫加拿大，为控制北美大陆发起战争，而成为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后，很快成为当地贸易和豪华蒸汽船的运河。由于在土木工程、建筑、防御工事结构中，体现了纯正的手工艺，彰显了19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因其非凡的历史价值而获得了世界历史遗产的称号。这条世界上最杰出的平流运河，它的船闸具有独特功能，能将船只从渥太华河83米高处调到纽伯勒高地，然后平稳降行在安大略湖上。如今，19世纪的木筏和蒸汽船已让位于游船，但是，船闸、旋转桥和用翻转锁开启、关闭

锁的传统工艺，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运河穿过一连串的湖泊、河流，将首都渥太华与安大略湖畔历史悠久的金斯顿市连结起来。沿着里多运河水道散步，不仅可以游览到岸上的野生动物、农村风光和城市环境，还可欣赏到过去与现在、自然与文化互为交融的特色，来一次穿越历史的旅程。里多运河的历史遗产，充分显示了当地良好的环境管理和智慧管理，其独特资源的完整性，得到了妥善的保障。

看完里多河闸，我们来到圣母大教堂，此时已近下午五点，五点至六点，教堂要做弥撒，六点后才可开放参观，鉴于只能有十分钟停留的时间，我们迅速观赏了教堂内华丽的设施，以及庄严的仪式后，匆匆离开。

年轻人开车直驱渥太华河边。到达时，夕阳偏西，河面波光粼粼，闪闪烁烁，如同铺满了碎银，蓝天白云下绿树与草地交相辉映，五颜六色的座椅散落在大树下，游人沐浴着斜阳，有的在喝饮料，有的在聚谈，有的在河边收网，言笑晏晏，他们并不在意有没有网到鱼虾，只是来消遣周末时光，一切显得那么随意、那么散淡，那么心旷神怡。

一旁的小木屋墙上，贴有“安大略省活着的遗产”的图片。图片介绍：“我们享受的广阔的荒野、壮观的自然景观、丰富而干净的湖泊和蜿蜒的河流，这里有数百个新的公园和保护区，人们可以划独木舟、露营、钓鱼、狩猎和徒步旅行，鱼类和未被污染的栖息地，为面临风险的物种提供更多的希望。为保护公共用途的土地、为社群和以资源为导向的行业提供更大的安全，为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工作伙伴关系，保护自然遗产，对旅游业提供重要推动，对年轻人、社群和环境长期投资，这是安大略省活生生的遗产。”这段话充分显示了加拿大对环境与人的保护和重视，由

此也提高了个人对环保的自觉意识。

河边竖立着一块蓝底金字的法语金属牌，翻译得知：1796年，朗格尔的领地落入名为纳撒尼尔·特蕾德维特·塞德米尔的美国人手中。1803年，他将此处土地和两个岛屿割让给另一位美国人托马斯·米尔斯——第一家造纸厂的所有者，米尔斯和两个同事在此修建了一座水坝，穿过海峡到西霍克斯伯里，利用水电大坝的驱动能量，他们建造了锯木厂和一家小麦加工厂，还买下了1000英亩土地。1808年，加拿大收购了米尔斯公司。1810年，这些资产的一半被以汉密尔顿兄弟的名义抵押，兄弟俩成为唯一的所有者，继而扩大了锯木厂，成为全省生产力最高的锯木厂之一，向英国出口了大量军用的厚橡木板。1871年，拥有千名工人的汉密尔顿锯木厂，生产红松、白松的木板量高达7万英尺。1889年之前，锯木厂和磨坊属于汉密尔顿家族，他们将对面的小村庄与邻近的社群合并，组成了霍克斯伯里村。这块金属牌记录了渥太华河边一个乡村的工业发展史。

晚霞映照，和风习习，坐在河边的座椅上，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返程途中，汽车行进在原野上，突然，乌云笼罩，豆大的雨点洒下。少顷，雨停，云层中透露出一丝霞光，很快出现了硕大的彩虹，紧接着，双道彩虹挂在西天，我们的座驾在双彩虹的半圆映照下，穿越前行，气象壮观，难得一见。渥太华夏季湿润温暖的气候，让我们领受了奇特的美感。一天的旅行生活载满游览的快乐轻松而归，晕车的不适被一扫而光。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郑亚楠 副研究员，曾供职于苏州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出版社。

# 我的记者生涯

## III 董端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1981年的春天开始的。

三月的某一天，我走进了中报有限公司大厦。几个月前，我写了三篇短文投稿，文章没刊登，公司电话通知，说有一个编辑位空缺，可来面试。

对于面试编辑职位，我有百分百失败的把握。1966年高中毕业，去了农村，回城后在羊毛衫厂当工人，这样的履历，和编辑那个闪闪发光的位置，实在相隔着千山万水。我来此面试，另有目的，争取一个撰稿人的机会。

面试官是老板傅先生，他没有叫我填写履历表，也不问我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反而和我天南地北地闲谈了起来。我最没底气的是学历，见老板不问，原本紧张的情绪慢慢放松下来，肆无忌惮吹嘘：“很小的时候，会背唐诗宋词；十几岁开始读通《资治通鉴》；我出身报业世家，叔祖父是上海新闻报主编，祖父办《武进商报》……”老板显然觉得我的自我推销偏了题，突然问：“你以前做过编辑吗？”这是即死题，我若答：“没有”，立马走人；没有选择，只能答：“有”。心跳有些加速，面也不自觉红了起来，我想，老板是何等精明之人，一定知我在撒谎，趁老板还没开口赶我走，抢着说：“傅老板，我知编辑这个位置比我更适合的人很多，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机会我

写稿。”老板没有立即表态，翻看着我投的三篇文章。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老板看向我，说：“下星期一，来上班吧！”太意外了，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呆呆地问：“做什么呀？”“去《中报月刊》做编辑兼记者。”老板说完，见我傻傻地笑，一言不发，又加了句：“两份工，一份工资，三个月试用期。”回家的路上，一浪一浪的惊喜在心中卷过，突然想起，我应该说一串感谢词，忘了。

香港中报有两大部门，《中报》和《中报月刊》，在同一座大厦中。日报是铅字排印的，月刊则是打字排版的。我这个月刊编辑上面还有一位执行编辑，一切权力不归我。我的主要工作是校对，若发现有错别字，就用小刀在纸上挖一个洞，把错字挖去，补贴上一个正确的字，再就是打电话约稿、追稿，和作者沟通等。这个工作没有难度，我第一天上上班已经胜任有余。为了学些真本事，凡有空余时间，就溜去《中报》楼层，很快和报纸编辑部的人混熟了，也学了很多做编辑的技术。

上班一个星期后，上司通知我，三天后白先勇先生来港，会安排时间见记者，若我约到白先生做专访，下一期月刊可以给我版面出一篇采访记。这是我的首秀，特别紧张。下班后，立即去买了部专业相机，花去了一个多月工资，又浪费

了两卷胶卷，熟悉相机的功能；看看还有时间，赶去图书馆把所有白先生著作借回家，通宵阅读，列出了二十几条问题，工工整整写在纸上，令我沮丧的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确实不在一个水平上，我的问题，太淡而无味了。白先勇记者招待会参加的人很多，除了记者，还有特约代表，是他的粉丝，我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塞了名片和那张写着问题的字条给举办方工作人员，表明我想另外做专访的意愿，没有得到回应；记者会上，我举了几次手，也没得到提问的机会。我的第一次采访，失败透顶。稍感安慰的是，拍的几张照片，在日报出新闻稿时，刊用了一张。

我第二次的采访对象，仍然是学者，台湾李敖。李敖在香港名气很大，李敖的发言几乎每分钟都有高潮，引得会场中掌声及欢笑声不断，他的博古通今，他的狂放不羁，他的人格魅力，令在座所有人折服，若我是一位高级记者，一定把李敖发言一字不漏写成采访文章，可惜我没有。

两次失败，令我痛下决心，以后的两年中，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上课，学习英文会话、速记、记者守则、新闻写作、版面设计等，为自己增值。

一年后，调职日报，任《中报》的《海峡两岸版》编辑。离开月刊那天，傅老板对我说：“你要独当一面了，好自为之吧，若出差错，我也保不住你。”工作开始忙碌，策划内容、外出采访、选用头条稿件、起醒目的标题、画不同的版面、认真校对……经常和研究两岸问题的学者和作者聚会，听他们闲谈一些大风向和小道消息。从此，我真正成为一行内人了。

在香港，每个坐上编辑位置的人都会争取写专栏，即是在日报副刊上抢一块自留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一篇稿填进去，一为扬名，二为挣钱。我每天写两个专栏，每天从报纸上剪

下，贴在白纸上，一大叠一大叠放在书柜中。新鲜感过去后，压力也接踵而至，为了一天两篇的内容绞尽脑汁。以后的三十几年，我多次跳槽，先后任职《新报》《东方日报》《香港商报》等，但无论去到哪里，每天写专栏，从未停止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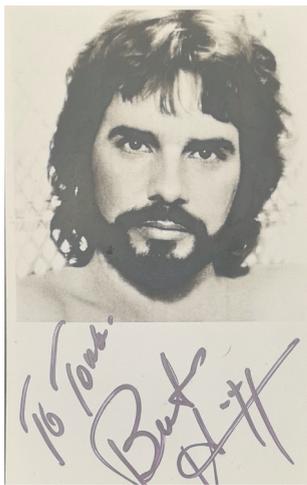
1984年，香港电视进入最高峰时期，《射雕英雄传》《鹿鼎记》《武则天》等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将人们每晚留在电视机前，一向热闹的大街亦变得冷清。天风图书公司的老板抓住商机，决定出一本《彩视画报》，专门报道电视界动态，号称东南亚唯一电视画报，请我兼职当编辑。20世纪80年代，全香港报章杂志都是黑白版，做彩色画报，这机会非常难得，我一口答应，立即走马上任。《中报》的上班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十二点，每天早上九时至中午一时，去天风做画报。

我在《彩视画报》虽是兼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少，因为老板没有请记者，我只有自己顶上去，每天和明星面对面做问答题。那年头，香港电视演员个个是超人，日也拍戏夜也拍戏，没有正常睡觉时间。我要写专访，只能去电视台或外境地点抓人，等他们拍完一个镜头休息时，快速问一些问题，拍几张照片。一期杂志要采访十几个明星，而且必须最当红的，难度不是一点点大，幸而彩色两个字对明星们有些吸引力，终究七彩缤纷的图片比黑白照片亮丽得多。美术编辑是从电影月刊《南国》挖角过来的，非常有经验，我诚心诚意拜师父，从头学起，彩色版可以施展的空间与黑白版完全不同，这种对颜色的自由发挥，令我非常着迷。因此，即使要陪着笑脸和明星们周旋，每天三更半夜写专访稿，还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干劲十足。

在《彩视画报》的两年中，见的明星很多，做朋友的一个也没有，但也有一些人、一些事留在我记忆中。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杨紫琼，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刚拿下了马来西亚小姐头衔，准备来香港发展。我们约在九龙公园见面，她乌黑发亮的长发随风飘动着，精致秀丽的脸上未施脂粉，她是我唯一见到过真面目的明星。杨紫琼有贵族气质，但不冷傲，特别喜欢说话，她的话匣子一开，谁也插不进嘴，那天我们讲得特别投缘。几天后，我去探班，她正在高街一座古老大屋中拍《猫头鹰与小飞象》，洪金宝导演要求高，一直NG，我怕她难堪，想溜，她反而走过来笑嘻嘻地说：“等我，最后一个镜头，很快收工了。”

我采访的唯一一位外国歌星，是贝蒂·希金斯(Bertie Higgins)，当时，一首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大火，他在世界巡回演出时来到香港。我是第一次单独面对国际巨星，一星期前开始准备，为了做好这次专访，我买了CD唱片，反复听卡萨布兰卡这首歌，自己也学会了唱。刚见贝蒂时，他独有的阳刚外形和巨星气场，令我有些胆怯，我谨慎地提问题，他亦很官方地回答着，气氛越来越沉闷。突然，他问：“你结婚了吗？”我愕然，答：“我女儿三岁了。”他又问：“怎么不戴着结婚戒指？”我刹那间放松了下来，答：“我们做记者的，随时要快跑、爬高、手推、脚踩，怕戒指掉了，不吉利。”他哈哈大笑，伸伸带着戒指的手指，说：“我的戒指从不脱下。”接着开始讲自己的恋爱史，他说他第一次见到比莉就开始追她，自从看了《北非谍影》后，脑中常常会把比莉和英格丽·褒曼两个人重叠在一起，于是创作了《卡萨布兰卡》这首歌，向她公开求婚，他自己也没料想到，这首歌不仅感动了女朋友，更是感动了全世界的歌迷。他又问：“你喜欢这首歌吗？”我答：“当然，我还会唱。”立即用英文唱了句“我的世界迷失在卡萨布兰卡”，他竖起大拇指。他又讲起他学生时代如何迷倒学校的女生等等，又



贝蒂·希金斯送作者的签名相片

问我，有没有听过他的《Key Largo》？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略带沙哑，和歌声一样令人陶醉。最后他请助手和我们合影，还送了我一张他的明星相片，签名时，我说了自己的英文名，他说：“中国人重姓氏，写你的姓吧。”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贝蒂·希金斯在美国圣彼得堡学院学过新闻学，难怪我和他，角色互调了。

在《彩视画报》两年，我学会了彩色版面的图文搭配，对颜色运用也颇有心得，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1986年2月，以著名老作家艾芜为团长的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应霍英东先生邀请，来香港进行访问。消息传来，各传媒都配备力量，为采访作准备。我也进入高度兴奋状态，这些作家的著作，我很多都看过，他们本是高高在上、离我很远很远的人，从没想过，我可以和他们近距离接触，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一起合影。在那一刻，我特别感谢我的老板，是他带我入了这一行，为我创造了许多梦寐以求的机会。访港的十几位作家，都是偶像级人物，我真想每一个都采访到，但主办方只给记者三个小时，会议开始后，先是各方代表发言，再而集体提问，剩下

的自由采访时间已不多。这时,《大报》、《左报》、电视台等派出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人强马壮,分别把每一个作家团团围住做独家访问。记者这份工,本是个体力活,我虽势孤力薄,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往大作家们身前靠近,成功地为艾芜、黄裳、高晓声、戴厚英等做了简短访问,合影当然是不可能的了。1996年,当戴厚英女士遇害的消息传来,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她的形象,身材瘦削、戴着眼镜、一头直梳短发,以及她在回答问题时的泰然自若及炯炯眼神。

1987年,《中报》撤离香港市场。离开那一天,我终于问出了在心中已徘徊八年的问题:“当年为何选择了我?”傅老板没料到竟然还在纠结这个问题,笑着说:“做新闻这一行,学历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心中有团火,身上有股劲。”傅老板,是我生命中的伯乐、导师,亦是令我刻骨铭心、一辈子都感恩的人。

离开《中报》后,入《新报》,任副刊编辑。那时,杂志已进入彩色时代,但报纸仍以黑白为主,《新报》决定将副刊先行改革,做彩色版。我做了彩色画报的领头羊,又做彩版日报的垦荒牛,觉得与有荣焉。

进《新报》后,工作量非常大,每天头条是名人专访,其他内容包括时装、饮食、旅游等,没有记者,没有美工,从采访加摄影,再到写稿、校对、编排版面都是一个人完成。董事长是个体贴下属、平易近人的好老板,对我更重点培养,经常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出我版面及颜色上的问题,偶尔也会带我出席名人界的聚会,为我的专访增加人脉。最令我感动的是,为了指导我写小说,老板去台湾开会时,亲自买了几本小说送给我,希望我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可惜,我在写小说方面缺乏天分,努力过,失败了,最终也是辜负了殷殷期望。

1988年2月,亚洲美容美发协会组织了表演团赴四川成都,我是随团记者。这次去成都,除了交流美容美发的心得,另准备了一场时装表演,是香港设计的时装,由四川模特儿走天桥。当时,这种表演形式在国内还很少见,成都市委书记出席观看,央视还特地派了记者来拍摄,并在第二天晚上的中央一台新闻时段,作了三分钟报道。受到央视重视,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趁热打铁,提出去自贡灯会参观,这本是我早就想做的采访之一,当年大规模的灯会,中外罕见。

回到成都,市委宣传部通知记者,四川名画家周仁辉先生将会和记者举行一次见面会。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想到了缘分这两个字。一年前,周仁辉先生父亲周北溪先生在深圳开画展,周北溪先生曾受到邓小平接见,特别有新闻价值,我和公司摄影师一起,想和这位七十六岁的名画家



周仁辉画的松鼠图,图中照片为作者和周仁辉

做专访，可惜缘悭一面，看来和我结缘的是下一代的继承人。周仁辉先生笔下的动物，熊猫、松鼠、猴子等，特别活泼、灵动，而周先生本人却朴实、稳重，不善言谈，只在问到他画画时，稍微多说两句。周先生一生致力于书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他的活力和激情全部贡献给了他的作品。见面会结束时，周仁辉先生特别送给我一幅画，是两只活泼可爱的小松鼠，在一棵枯树上玩耍，每次我看着这幅画，就会联想到宇宙的亘古和生命的轮回，可能这就是周仁辉先生心中的岁月吧。

1991年，我进入香港销量第一的《东方日报》，同样是副刊编辑，工作环境完全不同，这里的分工细致而明确，各司其职，不能踩过界。我仅仅是负责一个版面的编辑，却配备有记者、美工、助理编辑。从此，我结束了每天睡四五个小时的日子，也暂停了我的记者生涯。

2005年，我进入《香港商报》，十几年后，重操旧业。查资料不必去图书馆，打开百度搜一搜，采访名人则由狗仔队担纲，我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不断尝试新菜式，新红酒；经常参加国际大名牌的发布会；为博物馆、艺术馆、画展等开幕式发新闻；我和泰国、韩国旅游局关系热络，经常去游玩新景点，若有天灾时，也会第一时间去感同身受，当泰国海啸肆虐时，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及支持者齐齐睡在海边的潮湿木板上；最悠闲是受邮轮公司邀请，参加首航礼，最远去阿拉斯加。

2006年，西安市为宣传经济开放、吸引外资及发展旅游业，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发布会，邀请了中外记者几十人，港澳电视台及各大报章都派记者出席，凤凰卫视更派出王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前往，我代表《香港商报》去了五天，大会招待我们游览了大雁塔、兵马俑、华清池等。这令我想起1988年参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情景，已不可同日而语。大会送了我们两本书，一本是

用金箔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一本是镶着中国历代古钱币的纪念册。这套珍贵的礼品，采集的是埋葬了几千年的地下宝藏，彰显的是十三朝古都的文明史诗。在告别宴会上，西安市市长说：“为了这次会议，我们用了十年时间做准备。”他讲得心平气和，听在我们心中，这是改天换地的动员令，令我们感受到千军万马蓄势待发的爆发力。十年后，我又去了一次，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有强大科技实力、成熟民生服务的盛世西安。

2024年，我以资深传媒人身份，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海军基地。我在中国海军建设速度方面下重笔，完成我的采访实录。我亦借此为我的记者生涯画上休止符。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董 端 香港媒体记者。

### 封三作品赏析

汤永炎

张正吟(1912—1995)，原名镇瀛，号志熙，自幼研习书画，曾受教于张二树、汪采白等先生。1937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张书旗、吕凤子、高剑父诸家，奠定了扎实的笔墨与造型根基。

他擅绘花鸟草虫，坚持写生，观察精微。其作品形神兼备，笔墨轻健，设色清雅，出枝布叶皆见巧思，尤其善于以简驭繁，以淡致厚。作于1993年的四尺整张《十分春色》，是先生八十一岁时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所绘。全画以极简之线、极淡之墨，构架八平尺画面，空灵而不空虚；行笔舒缓却气韵流畅，造型概括而意蕴丰富。整幅清俊秀逸，平和中见功力，静谧中蕴祥和，堪称晚年力作。

汤永炎，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原江苏省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部主任，国家科研课题“江苏美术史研究”主持人、《江苏美术家人名辞典》主编。

## 编辑人语

乙巳岁杪，新一期《雅集》和大家见面了。2025年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逝世25周年，《雅集》刊登《赵朴初与江苏宗教》，表达对赵朴初先生的深切怀念。

回望这个夏天，“苏超”火了。赛事中，一个亮眼的创新点引起了众多关注——将非遗与体育赛事巧妙结合。从“苏超”冠军奖杯所用的非遗金箔技艺到为家乡球队倾情“打call”的南通“蓝白相印”主题应援帆布包，传统的非遗技艺与现代体育的澎湃激情碰撞，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期《雅集》带领大家走近非遗传承人王振兴，领略国家级非遗南通蓝印花布之美。作者数次登门拜访王振兴老先生，记录了六十载春秋的匠心、三代人的传承。一个个日夜、一次次的尝试，这背后，是非遗传承人“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与坚守，真实动人。同样为了理想而坚守的欧阳平凯院士，从青丝到白发，他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曾经焚烧在田间的秸秆，变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源，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长卷上镌刻下一组独特的精神基因。

岁月流沙，逝者如斯，打捞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记忆碎片，展现匠心情怀，守护文化印记，成为一代文化人的责任和担当。《墨痕寄沧海 片纸映晚清》向大家推介了《片墨寄沧海：晚清明信片绘事》（宋琛、宋欣樾编著，古吴轩出版社）这本专著。在晚清西风东渐的时代语境中，明信片的发行启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晚清社会的独特窗口。作者从时代背景、文化传承、艺术价值、学术担当等方面介绍了这本专著，挖掘晚清手绘明信片的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介绍了书中晚清明

信片的题材内容、创作风格、作者背景，为读者饶有兴趣地打开这本书提供了指南。这本书让读者欣赏别样的晚清社会风情画卷，感受明信片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象征的艺术魅力，这也是文化世家对这份文化遗产的坚守担当。

文化坚守前行的路上，有前辈的鼓励让人心生力量。《客之道》中作者在杨苾先生家中做客，“杨苾先生夫妇，不仅可爱，而且可敬、可亲。”“我在他们家身心放松”。《在蒲黄榆见汪曾祺先生》，“先生那善良平和的注目与微笑，让我心中顿生安慰。”文学大家对后辈的关心指点、和蔼可亲跃然纸上。作者重温那段时间的记忆和情感，心生暖意。

在前行的路上，艺术与我们相伴。《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自己的生命》是作者创作《观演记》的感受，是与舞台上人物一同悲一同喜的见证。《江上往来人》中的画作让观者落泪，《为了告别的聚会》中高欢特别的告别仪式使人动容……艺术让我们相遇，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我们感动……

正值冬日，阳光和煦，温暖可亲。《阳光普照》中作者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弟成长的关注，像冬日暖阳，照耀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人间大爱。同样，《逝者三题》中的母亲在张纲中学任教时对学生的教诲，《我世界里的第一位“大女主”》中的母亲对弱势群体的照拂，《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之路》《母亲的纪念章》中展现的女性在抗战烽火中英勇不屈的精神，都令我们感佩。

过去的一年，我们一起相伴，与《雅集》共同前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此，向各位读者说一声：“新年快乐！”